

东欧文学简史（上）

波兰文学

波兰文学是东欧各国的文学中最发达的一支，它自波兰公元十世纪建国以来就已产生，至今延续和发展一千多年了。在波兰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不仅流派纷呈，各放异彩，宛如天河闪烁的繁星，而且造就出了像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等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和作家，这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引以自豪的高度文明的表现。波兰文学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

公元一至二世纪，在奥德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居住着凡涅特人，他们是古代波兰人的祖先。到公元十世纪，在这块土地上，封建经济已经形成和发展，但它处在一些别的欧洲国家的包围中。为了防备外来的侵略，波兰各部落要求统一，王公梅什科一世（约 960 - 992）所在的格涅兹洛城堡有坚固的设防，经过他和他儿子波利斯瓦夫·赫罗布内（992—1025）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波兰国家的统一大业。公元 966 年，梅什科一世为了提高波兰的国际地位，接受了罗马基督教。基督教传入波兰后，促成了波兰封建制度的完善和巩固。但因为教会一开始就掌握国家的文教大权，视波兰古代的语言和文化为异端，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摧残，这就大大地阻碍了波兰古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波兰古代产生过许多民歌和民间故事，但因教会的查禁，大部分都失传了，只有少数在民间的口头文学中或者在一些经史的记载中，保存和流传了下来。在口头文学中，有关于比亚斯特和波皮耶尔或克拉克和万达的故事，说的是暴君被老鼠咬死，英雄战胜了恶龙，但又死于自己仆人之手的悲剧。还有农民在收割和举行婚丧礼仪时唱的歌，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十二世纪加尔撰写的《历史记事》中提到，国王波列斯瓦夫·赫罗布内和波利斯瓦夫·希米亚韦（1058 - 1079）死后，人们高歌，赞扬他们为波兰国家的统一建立的功勋。十五世纪历史学家杨·德乌果什（1415 - 1480）在他的《波兰史》中，还提到 1208 年，波兰人民在扎维霍斯特取得一场反侵略战争胜利后唱的一首歌。这些诗歌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它们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

加尔的《历史记事》是波兰最早出现的一部编年史，用拉丁文写的。据书巾的揭示，作者是一个法国神父，从匈牙利来到波兰，在波利斯瓦夫·克日沃乌斯迪（1085 - 1138）国王的朝廷里担任过教职。他的这部著作以记事体形式记载了从波兰建国到克日沃乌斯迪国王为抵御外敌和增强国力所建立的功绩，其中一些章节以诗体写成，富于文采，它既是一部历史典籍，也是一部英雄史诗。

基督教传入波兰后，教会为了反对“异端邪说”，最初规定在宗教仪典和学校里的宗教课中一律使用拉丁语，对波兰语十分歧视，后来他们看到这些方面如果不用波兰语，宗教在波兰就难以普及，因此到十三和十四世纪，他们便开始将一些拉丁兰文的宗教诗文翻译成波兰文，如《圣十字祷文集》和《格涅兹诺祷文集》，这是用波兰文书写的最早的宗教文献，也是见之于波兰文的最早的文献。《格涅兹诺祷文集》中的文字更接近口语，而且虚构了许多基督年少时生活中的故事，后来成了波兰民间文学的素材。《圣母颂》是第一首用波兰文写成的宗教诗歌，产生于十三世纪，它赞颂了圣母和耶稣的光荣和伟大。从形式上看，这首诗是模仿佛古希腊和拜占庭的颂歌写成的，全诗每段前两名是长句，格律严谨，第三句重叠着一个古词，意思是“主啊，怜惜吧！”这是一首精美的诗，由于在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早已超出宗教的含义，而成为民族的颂歌，国王雅盖沃率军于 1410 年在格隆瓦尔德打败北方入侵的日耳曼骑士团时，参加战争的波兰骑士就曾高唱这首颂歌，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随着波兰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波兰的封建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历代王朝便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因此在十四世纪，除了至今

统治的宗教文化之外，又兴起了反映骑士和贵族生活的市俗文化。反映市俗文化的作品当时是用拉丁文和波兰文两种文字写的，前者如载于十世纪的《大波兰纪事》中的一个叫《瓦尔采日·弗达韦的故事》，写瓦尔采日·弗达韦的妻子和一个男人私通，弗达韦发现后，在奸夫的妹妹支持下，把两个通奸者全都杀死。后者如斯沃达写的《关于宴会的礼节》，它产生于十五世纪，指出了人们在参加宴会时几种不合礼数的行为，说明在这种场合应该尊敬女人。波兰中世纪骑士文化的产生，旨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社交水平，它曾受到西方骑士文化的影响。

可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巩固，骑士阶层也越来越多地建立了封建所有制经济，于是转化成了新的贵族，社会上的阶级矛盾，特别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便日益走向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反映阶级矛盾的作品，产生于十五世纪的《英德热伊·邓钦斯基被杀之歌》和《对懒惰农民的讽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前者根据真人真事写成：1461年，克拉科夫贵族邓钦斯基无故鞭打给他修理兵器的兵器匠克刊门斯，激起了克拉科夫市民的愤慨，他们便将这个贵族杀死，结果他们中的六个肇事者被贵族的议会和法庭判处了死刑。后者显然是一个贵族写的，他借讽刺懒惰的农民，以表示对农民阶级的轻蔑和仇恨。

基督教在波兰经过数世纪的传播，它的教会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它不仅拥有巨额的财产，而且掌握国家许多方面的大权，成为波兰最大的封建统治者之一，这便使它和人民群众甚至贵族处于对立的地位。在捷克当时发生的胡斯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波兰城乡也出现了要求改革宗教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学中也有反映，如英德热伊·加尔卡的《维克列夫之歌》，它的作者受十四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维克列夫的思想影响，要求波兰教会舍弃它的权势和财产，恢复数世纪来被他们歪曲的基督教的教义，结果遭到克拉科夫主教的反对。加尔卡于是上诉于法庭，《维克列夫之歌》就是他在他的起诉书中附加的一首诗，诗中以强烈的言词指责罗马教会歪曲了基督的教义，欺骗了人民，号召人民反对他们。

十五世纪末，波兰国家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569年，它和立陶宛合并后，由于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便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这里也传入了人文主义思想，波兰进入了它的兴盛的时代。

波兰文艺复兴运动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性质，代表中小贵族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是新教徒，他们反对禁欲主义，反对罗马教会干涉波兰事务，要求宗教自治和限制教会拥有的财产，并提出让中小贵族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大都用波兰文写作，只有少数用拉丁文写作。在用拉丁文写作的诗人中，最有成就的是克刊门斯·杨尼茨基（1516 - 1543），他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在教会中学里读书时，就打下了良好的拉丁文基础，后去意大利留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的诗揭露了大贵族的自私和虚伪，反映了“人群正义的控诉”和“人民的呻吟”，歌颂了大自然的美。在《波兰国王的生平》一首中，他还指出了波兰历代国王都出身平民。他的作品民主倾向和他的农民出身有密切的关系。

米科瓦伊·雷伊（1505 - 1569）是文艺复兴早期的诗人。出身贵族，年轻时曾客居于一些拥护宗教改革的官员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热衷于参与政

事，后被选为议员，在议会上提出过贵族改革的纲领。他用波兰文写作，前期最重要的作品是《地主、神父和村长三人之间的小争论》（1543），这是三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们在对话中互相揭露，道出了教会对财产贪得无厌，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大贵族享乐腐化和对农民作威作福，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后期作品主要的有《动物园》（1562），它概括地介绍了波兰古代最著名的国王、大封建家族和其它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作者在赞扬国王和爱国贵族在促使国家统一和富强上作出了贡献的同时，对教会僧侣的贪赃枉法和议会中的无政府主义作了无情的揭露，对于“任人宰割”的贫苦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镜子》（1568）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一个正直的人的一生》要说明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但要保持纯洁的良心。其他两部分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批判，但表现了悲观思想。雷伊的作品有散文体，也有诗体，他很讲究波兰语的运用，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波兰人不是鹅，有自己的语言。”这说明在拉丁语作为书面语言统治波兰的时代，他要在人民中普及祖国的语言——波兰语，他的作品对波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波兰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杨·科哈诺夫斯基（1530 - 1584）。他出身于贵族家庭，1552年曾去意大利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也熟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艺术。1559年回国后，他住在克拉科夫，这里作为波兰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教会和代表新兴社会阶级的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激烈。科哈诺夫斯基和统治阶级的各种人都有接触，曾经拥护和支持改革派，但他晚年离开了克拉科夫，定居于他家乡黑林村的领地。科哈诺夫斯基一生发表的作品主要的有长诗《萨尔梯，又名野蛮的丈夫》（1564）《团结一致》（1564）、《旌旗招展，又名普鲁士进贡》（1569）、《圣约翰节前夕之歌》、《挽歌》（1580），诗集《哀诗》和诗剧《拒绝希腊使者》（1428）等。这些作品从题材看，可以分为下面三类：

第一类作品主要反映社会中的阶级矛盾。诗人把矛头指向了教会，对那不勒斯教皇、波兰教会僧侣们的伪善、贪财、堕落腐化作了无情的揭露。在诗剧《拒绝希腊使者》中，他借一个人物的独白，抨击了当时波兰政府和议会中许多弊端：“王国内部一片混乱，它的末日就要降临，这里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这里的一切，都靠金钱收买。”

第二类作品描写波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祖国的自然风光。如《圣约翰节前夕之歌》写的是：在圣约翰节前夕，照例有十二个姑娘手牵手地围在篝火旁跳舞唱歌，气氛热烈，歌词内容大都反映农民丰收的喜悦和他们生活中的趣事。科哈诺夫斯基在波兰文学史上首次将这种富于诗意的民间风习写进作品，表明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关心。

第三类作品主要反映诗人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其中以他在他刚满“三十个月”的女儿乌尔舒拉死后写的长诗《挽歌》最著名。这首诗分十九段，写得缠绵悱恻，真实感人，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人和人的思想感情为中心的特点。

科哈诺夫斯基的创作丰富了波兰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他是波兰第一个用十四行诗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人，也是波兰第一个戏剧作家，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标志着波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

西蒙·西莫诺维奇（1558 - 1629）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他出身市民家庭，曾在扎莫伊斯基学院任教。他最初用拉丁文写作，但这大都是一些

应制诗,价值不大,后来他用波兰文写作,才充分表现了他的才能。他于1614年发表的《田园诗集》是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作品,诗集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描写波兰民间的风俗习惯,有的反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在《白面包》一首中,诗人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贵族的婚礼。参加婚礼的人和新郎新娘逗趣,问他们为什么珊珊来迟,新娘此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她爱她的郎君,但又舍不得离开她的母亲,最后她还是跟着新郎进入了她的新房。这种描写常见之于民歌,诗人从中吸取了素材,作了艺术上的加工。《割麦人》这首很著名,它以几个割麦的女农奴的对话和对唱的形式,展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场景:女农奴们在地主的田里割麦,由于饥饿和劳累过度而晕倒在地,可是地主的管家兼监工还用鞭子把她们打得遍体鳞伤,“那鞭子抽着姑娘的头,舔着姑娘的血。”像这种对封建农奴制压迫的真实写照在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实不多见。

十七世纪上半叶,由于城乡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出现了所谓平民文学,它们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有农民、手工业者、商贩、穷苦的学生、教堂执事和行吟诗人等。他们创作的诗歌对教会的专制,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农民遭受的压迫,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有的作品还明确地把村长、磨坊和酒店老板列为农村的统治者,把雇农和贫苦农民列为被统治者。由于它们表现了激进的政治观点,作者们大都不露姓名,但它们依然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查禁和迫害,其中大部分都散失了,至今流传下来的不多。

十七世纪中叶,波兰中央政府议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愈演愈烈。由贵族控制的议会实行所谓“自由否决制”,即对提交议会通过的议案,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它在议会上就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议员们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争吵不休,通不过任何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决议。加之外国统治集团这时插手波兰事务,内外勾结,便形成了几个隶属于外国统治者的党派。此外教会也成立了耶稣会,开始对过去的改革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彻底否定了以往宗教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波兰和当时属于波兰立陶宛国家的乌克兰地区,由于波兰大地主长期实行封建农奴制压迫,也导致了农民起义大规模的爆发。在这先后,瑞典王国和沙皇俄国也相继入侵波兰,使波兰陷入长年的战乱,造成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经济上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它的国力从此大为削弱了。这期间,波兰文化事业也大为衰退,除常见的宗教读物如祈祷书、赞美诗之外,在法国巴洛克文学的影响下,波兰也产生了巴洛克诗歌。这种诗歌讲究华丽的词藻和新奇的形式,但矫揉造作,大都用在对贵族统治者阿谀奉承,适合于宫庭的需要,它的代表诗人是杨·安杰伊·莫尔什亭(1613-1693)。这一时期较有成就的诗人寥寥无几,如瓦茨瓦夫·波托茨基(1625-1696),他出身贵族家庭,曾长期居住在农村。他的长诗《霍齐姆之战》(1670)歌颂了波兰军队1621年在霍奇姆打败土耳其侵略者的一战。诗集《诙谐诗园地》抨击了贵族阶层的自私自利和目无法纪,揭露了波兰政治腐败、国防空虚以及农奴遭受残酷压迫的状况。杨·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约1636-1701)是一位战士兼作家,他参加过反抗瑞典、沙俄和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他的散文作品《回忆录》是对他在1656至1688年参加这些战争和以后一段生活的回忆,书中生动地反映了波兰十七世纪民族解放运动,贵族豪强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对新教徒的迫害和波兰人民的风俗习惯,它既是一部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历史文献。

十八世纪初,由于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教会的专制以及农村残酷的封

建压迫，使波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空前的危机。沙皇俄国在十七世纪中叶乌克兰爆发反抗波兰地主的农民起义的时候，就侵入了乌克兰，后来经过长年的战争，夺取了当时属于波兰的乌克兰部分领土，它现在看到波兰国力已衰，便又开始干涉波兰内政。他们首先收买和扶植波兰统治阶级中的亲俄势力，力图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波兰，以达到并吞整个波兰的目的。十八世纪下半叶，沙俄和普鲁士、奥地利相互勾结，终于在 1772、1793 和 1795 年三次将波兰瓜分亡国。

十八世纪下半叶初，贵族统治集团中又出现了一些改革派，他们要进行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们主张加强王权，消灭贵族豪强各自为政和议会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同时大力发展工商和贸易，变封建农奴制为地租或雇佣劳动制，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推崇理性文化，反对宗教迷信，要求在学校里讲授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新的学科。同时反对文学中的阿谀奉承和轻糜陈腐的情调，倡导古典主义文学，从而使波兰文学进入启蒙运动时期。

波兰启蒙运动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六十年代到 1780 年左右，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到波兰灭亡。第一阶段的作家和诗人都和宫廷有联系，他们拥护王权，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梵第冈教会干涉波兰内政，提倡用波兰文写作。其中代表诗人有亚当·纳鲁谢维奇（1733 - 1796），他出身贵族家庭，曾留学法国和德国。他最初写过颂扬国王的应制诗，后来发表了不少田园诗、抒情诗和讽刺诗，其中以讽刺诗最著名，主要针贬贵族阶层的道德败坏。诗人揭露了这个阶层的挥霍浪费和荒淫无度，指出了他们的所谓“黄金自由”对国家的危害。在《化装舞会》一首中，他描绘了一些“戴丝绸手套的贼”在一次化装舞会上肆无忌惮地赌博和狂饮，表现了他对这些社会蛀虫的厌恶。纳鲁谢维奇的诗在形式上受波兰前一时期的巴洛克诗歌的影响，但它的内容具有锐利的批判锋芒，又迥异于巴洛克诗歌。斯坦尼斯瓦夫·特刊姆贝茨基（1739 - 1812）出身贵族家庭，早年留学法国，结识了狄德罗和卢梭等人，回国时他把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和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其他书籍带回波兰，对波兰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他在国王宫廷里当过侍从。他早期的诗讴歌理性，批判宗教迷信，曾高呼“让聪明才智驱散黑暗”。在长诗《波文斯基》中，他揭露了封建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长诗《波兰卡》写波兰国王的一个侄儿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农奴解放，提倡宗教信仰自由，采取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方式，因而获得了很大的效益，诗人在这里提出了他的农业改革的方案。

波兰启蒙运动最著名的诗人是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1735 - 1801），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大贵族家庭，曾在罗马学过神学，回国后和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交往密切，被任命为宫廷神甫，1766 年又出任瓦尔米亚主教，1795 年被提升为格涅兹诺大主教。克拉西茨基不仅是诗人，他还是波兰第一部小说的作者，他在政治上拥护王权，反对贵族豪强搞分裂，主张改革。他早期的诗歌崇尚理性，抨击封建大贵族的腐朽堕落，反映了他的启蒙思想。波兰第一次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后，他在一首《热爱祖国》（1774）的诗中，号召人民为祖国而牺牲。翌年发表的长诗《群鼠》以古代传说中波利尔国王在位时期一个猫鼠之争的故事，含沙射影地针贬波兰议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嘲笑当时歌功颂德的文风。他的长诗《莫纳霍玛西亚，即修士之战》（1778）通过两个修道院之间的争纷，揭露了天主教僧侣的伪善和挥霍无度。

的寄生生活。

他的《讽刺诗》（1779）和《童话和寓言》（1779）也很有价值。前者对贵族阶层的种种恶习作了无情的批判，如在《摩登太太》一首中，诗人写一些贵夫人极力追求西欧的时髦，致使她们的丈夫遭到破产。《宫廷生活》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许多骗子、浪荡公子和伪善者的嘴脸。对于社会上的赌博、酗酒和怠惰行为，诗人也不容情，他认为这些恶习若不改变，会导致国家灭亡。《童话和寓言》则以比喻方式指出了社会上的不平，如童话《羊和狼》，写的是生存竞争中的弱肉强食。《牛部长》揭示了勤劳和智慧终究要战胜狡诈和愚昧。克拉西茨基的诗歌格律严谨，寓意深刻，富于幽默感，是波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珍品。

克拉西茨基还发表过三部小说，他揭开了波兰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序幕。在这三部作品中，以《米科瓦伊·多希维亚德钦斯基历险记》写得最好。小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主人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见闻和经历，揭露了贵族阶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政府法院里的贪污受贿，第二部分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王国，这里人人自食其力，相亲相爱。第三部分写主人公在经历坎坷之后，回到家乡，从事改革，他要改善农民的处境，反映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理想。

1780年以后，由于城市手工工场的增多，工厂和银行的出现，农村地主愈来愈多地采取租赁土地和雇佣劳动的经营方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从萌芽状态开始发展。一部分小贵族联合市民阶层在促进城市乡村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耶稣会教徒也开始参加市俗性的社会活动。但与此同时，沙俄等侵略者也在加紧策划彻底瓜分波兰的活动，由于波兰统治集团和大贵族有一部分亲俄派作为他们的内应，波兰亡国的危机日益严重。改革派针对这种情况，组织了爱国联盟，并在四年议会（1788-1792）上通过了他们提出的著名的“五三宪法”。这便引起了亲俄派的仇视，他们又针锋相对地组成了塔尔戈维查反动同盟，借助沙俄力量的干预，推翻了四年议会的成果，于是导致波兰第二次被瓜分。这次瓜分后的第二年，爆发了科希丘什科领导的抗俄民族起义，起义失败后，波兰在第三次瓜分中完全丧失了独立。主要活动和创作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有文格爾斯基、扎布沃茨基、聂姆策维奇、博古斯瓦夫斯基、雅辛斯基等，他们对于波兰社会形势的变化，表现了更多的关心，他们的作品突出了爱国主义思想。

托马什·卡耶坦·文格爾斯基（1756 - 1787）的作品虽大都写于七十年代，但因他和贵族宫廷没有什么联系，又更多地接触了平民，还曾长期旅游国外，了解到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他的思想更接近平民。他的诗歌有的将贵族官僚的骄奢安逸、挥霍无度和人民的疾苦加以对照，揭示社会上的阶级对立，有的在抨击民族败类卖国行径的同时，生动地刻划了爱国者的形象。

弗兰齐谢克·扎布沃茨基（1750 - 1821）出身于小贵族家庭。他在四年议会期间拥护爱国联盟，后曾参加科希丘什科领导的民族起义，他的讽刺诗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揭露了那些卖国求荣的大贵族的丑恶面貌。他的戏剧创作也很著名，如《求婚的纨绔子弟》、《迷信者》和《贵族生活方式》都揶揄和嘲讽了贵族阶层的不良习俗：男女调情，好打斗冒险，还自视高贵，认为自己有权随意鞭打农民。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示了贵族日常生活的内容，指出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

尤利杨·乌尔森·聂姆策维奇（1759 - 1841）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他一生曾多次参加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他的诗歌抨击了大贵族的卖国行径，剧作《议员还乡》通过爱国阵容和封建保守派的代表在议会上的争论，指出波兰要加强王权，消来贵族无政府状态，发展城乡经济，解放农奴和保卫祖国。诗作《历史歌》讴歌了波兰历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

沃伊切赫·博古斯瓦夫斯基（1757 - 1829）是波兰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剧作家。他年轻时当过兵，后对戏剧产生兴趣，当过演员、导演，并历任华沙民族剧院的经理，曾多次带领剧团在许多城市巡回演出。通过这些活动，他组织演出和介绍了一系列欧洲古典名剧和波兰剧作，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他的代表剧作《想象的奇迹，又名克拉科夫人和山民》是一出喜歌剧，写的是由于一对青年男女恋爱引起的纠纷，导致了克拉科夫居民和山民之间的一场械斗，最后一个大学生用电的“奇迹”使械斗的双方得以和解，使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剧本富于生活气息，它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了科学进步的成就。它是波兰启蒙运动时期最著名的剧作。

雅库布·雅辛斯基（1761 - 1794）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爱国将领。在 1794 年起义爆发期间，他曾任维尔诺起义军的统帅，后来他在保卫华沙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诗指出教会是封建压迫的工具，他还讴歌法国大革命和它提出的自由平等的口号，号召人民去和沙俄侵略者进行战斗，他认为只有打倒暴君，人民才能获得自由。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波兰虽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但波兰人民并未终止他们为恢复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1896年，流亡国外的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意大利领导成立了“波兰志愿军团”，继续坚持战斗。在这期间，也出现了歌颂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军团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尤泽夫·韦比茨基（1747 - 1822）的《波兰军团之歌》。这首歌由于它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人民恢复祖国独立的信心和决心，对波兰的爱国志士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它在1830年后，还成了波兰的国歌。1807年，拿破仑打败了俄奥联军。曾在波兰建立一个华沙公国（1807 - 1815）。拿破仑失败后，沙俄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波兰议会王国”，简称“波兰王国”，对波兰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波兰人民不堪占领者的压迫，此后曾多次发动起义斗争，如1830年11月在华沙爆发的民族起义，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和1848年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爆发的民族起义都有力地打击了沙俄等占领者在波兰的统治。

十九世纪初，波兰文坛出现了的古典主义流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和十八世纪要求改革，富于爱国精神的古典主义诗人和作家不同，他们较为保守，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封建特权，反对民族起义，对占领者持妥协投降的态度。他们的创作大都美化贵族，在形式上模拟古典主义诗歌，但内容贫乏。他们的代表有卡耶坦·科希米杨（1771 - 1856）和阿洛伊齐·费林斯基（1771 - 1820）等。

除伪古典派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又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还曾遭到伪古典派的攻击，说它破坏了文学创作的原则，因为伪古典派拘泥于古典主义创作形式，认为它不可动摇。可是波兰浪漫主义由于作家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也分消极和积极两派。消极浪漫主义作家主张维护贵族特权，反对革命，对沙俄等占领者妥协投降，它的代表是诗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一开始就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派诗人和作家都是爱国者或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的作品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或者在民族解放斗争的鼓舞下产生的，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又教育和鼓舞着千百万人民去和侵略者进行斗争。

波兰积极浪漫主义者认为，只有诗歌才能充分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具有激动人心的魅力，所以他们特别推崇这种文学创作的形式。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也很重视继承波兰民间文化的优秀遗产，他们不仅大量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也为自己的创作吸取了素材和营养。

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流派最伟大的诗人是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 - 1855），他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参加科希秋什科领导的民族起义，密茨凯维奇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1815年，他在维尔诺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秘密爱国组织爱学社和爱德社，并开始写诗。192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的出版标志着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翌年他又发表了诗剧《先人祭》第二、四部和长诗《格拉席娜》。《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波兰民间超度亡灵的一种祭典，揭露了恶霸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第四部写的是一个青年失恋后的痛苦，和诗人以往的一段经历有关。《格拉席娜》则歌颂了一个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此后不久，爱德社的爱国活动被沙俄当局发现，密茨凯维奇和这个组织其他成员被捕入狱，1824年10月，他又被流放到了俄国。密茨凯维奇在俄国期间，结识了十二月党人

和普希金，1826年，他出版了《十四行诗集》，其中包括《爱情十四行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前者写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后者描绘克里米亚的高山大海，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怀念。1828年，密茨凯维奇发表了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它叙述了十三世纪立陶宛爱国者华伦洛德如何灵活机智地抗击入侵的日耳曼骑士团的故事。

1829年，密茨凯维奇来到罗马。在1830年十一月起义爆发时，他曾整装回国参加起义，但途中被阻在波兹南。起义失败后，他随流亡战士来到了德累斯顿，写出了《先人祭》第三部（1832）。这部作品取材于沙俄政府镇压维尔诺学生运动的政治事件，诗人不仅揭露了占领者屠杀和迫害波兰人民的罪行和波兰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的丑恶面貌，而且颂扬了革命青年团结互助、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1834年，密茨凯维奇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长诗《塔杜施先生》。书中以立陶宛地区两大仇家的争斗与和解以及两家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恋爱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贵族的日常生活，讴歌了波兰爱国志士为祖国复兴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期间，密茨凯维奇来到意大利，组织了波兰志愿军队，反对奥地利占领者。1855年俄土战争爆发后，他又来到土耳其，打算组织军队和沙俄占领者作战，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后来诗人染上了瘟疫，逝世于君士坦丁堡。密茨凯维奇的创作最充分地表现了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他的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战斗激情，有的表现了他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民族英雄由衷的赞美，有的借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抒发他对乡土的热恋，有的通过激进人物的刻画，寄托他对未来的理想。他的剧作采取将现实的梦幻，天上、人间和地狱的场面交织在一起的描写手法，也颇见新意。密茨凯维奇和他的作品对波兰文学和波兰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尤利尤什·斯沃瓦茨基（1809 - 1849）是另一位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酷爱文学，二十岁以后开始发表作品。他的长诗《杨·别刊茨基》（1830）写的是一个贵族由于大贵族的欺凌而遭遇不幸。诗剧《明多维》写十三世纪立陶宛大公明多维在统一立陶宛后和入侵的日耳曼骑士团进行迂回曲折斗争的故事，反映了诗人同情弱小民族，痛恨强暴。诗剧《玛丽·斯图亚特》取材于苏格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平，她勾结博德维尔阴谋篡夺王位，最后遭到失败，剧本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1830年十一月起义爆发期间，斯沃瓦茨基写了《自由颂》、《颂歌》和《立陶宛军团之歌》等战斗诗篇，这些作品当时在群众中流传，成了鼓舞起义战士前进的战歌。

起义失败后，斯沃瓦茨基流亡国外，在1832年至1836年间居住在日内瓦，创作了他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如诗剧《科尔迪杨》、《巴拉丁娜》和《霍尔什丁斯基》等。《科尔迪杨》的主人公是一个贵族子弟，他有爱国心，参加了秘密爱国组织，但他错误地以为他一个人杀了沙皇，就能推翻沙俄在波兰的统治，他的暗杀活动结果遭到失败，被沙皇处死。《巴拉丁娜》写一个农民女儿与贵族骑士结合之后，以阴谋诡计和残酷虐杀的手段当上了女王，可最后遭到了雷殛。《霍尔什丁斯基》写一个爱国者由于不能和她的卖国贼父亲割断感情上的联系，未能投身到革命中去。在1836至1838年间，斯沃瓦茨基曾经游历意大利、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先后创作了长诗《贝尼奥夫斯基》和《里拉·文涅达》等作品。前者以十八世纪贵族巴尔同盟为历

史背景，主要描写主人公贝尼奥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但作者通过诗中的插议，表现了他对母亲和故乡的热爱和怀念。1842年，斯沃瓦茨基曾经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影响，后来在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他又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在1845年写的《对〈未来的礼赞〉的回答》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农民革命才能把波兰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 - 1859）是波兰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在波兰王国的沙俄驻军中任职，受到沙皇的器重。他大学毕业后，在出国深造期间，就先后发表了他的主要作品诗剧《非神的喜剧》（1835）、《伊雷迪翁》（1836）和长诗《黎明之明》（1843）等。

《非神的喜剧》写的是以亨利克伯爵为首的贵族营垒和潘克拉齐所率领的农民、手工业者起义军的一场战争。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正是由于长年的饥饿、贫困和遭受屈辱而起来反抗，他们高喊为了面包和工资，要求自由和解放的口号，说明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但他又把他们写成是一群毫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肆无忌惮地杀人，纯粹是为了个人复仇，他们最后虽然战胜了贵族营垒，但在他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一个耶稣的圣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起义军统帅潘克拉齐见到后立刻死去。这一切都说明了克拉辛斯基清楚地看到了人民革命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他对此又十分仇视。《伊雷迪翁》和《黎明之前》都从宗教仁慈的观点出发，宣扬了对压迫甘心忍受，不予反抗，这对波兰四十年代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四十后代侨居国外的作家除密茨凯维奇、斯沃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诺尔维德、列纳尔托维奇和叶日。崔布里杨·诺尔维德（1821 - 1883）是一位诗人、画家兼雕塑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842年去意大利学习绘画和雕刻。后到过美国，定居在巴黎。诺尔维德同情人民的疾苦，在《肖邦的钢琴》这一首中，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伟大音乐家肖邦的崇敬。他还发表过歌颂波兰革命将领贝姆、科希秋什科和美国革命家约翰·布朗的诗篇。特奥菲尔·列纳尔托维奇（1822 - 1893）四十年代初曾侨居意大利，他的诗集《抒情小诗》和《新抒情小诗》描写了玛佐夫舍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具有民歌风格，但他很少反映人民的疾苦，他的诗都是田园诗，他自称“玛佐夫舍的抒情诗人”。

特奥多尔·叶日（1842 - 1915）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参加过匈牙利1848年革命，曾多年侨居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深入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和习俗，极力支持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1872年，叶日去瑞士，曾在瑞士的波兰侨民组织中工作。他的作品主要的有小说《瓦西尔·霍乌布》（1858）、《桑多尔·科瓦兹》（1861）和《巴比伦河畔》（1888），前者反映农民的痛苦，第二部取材于1848年匈牙利革命，第三部描写波兰侨民的生活状况。

在波兰国内，十一月起义失败后，沙俄占领者对波兰人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民族压迫，经过一段黑暗时期，到三十年代末，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重又兴起，新一代作家成长起来了，他们继承了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等老一辈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传统，如古斯塔夫·艾伦贝尔格（1818 - 1895），他是一位革命诗人，在十一月起义失败后，他就参加了波兰王国的秘密爱国组织，后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曾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诗集《过去时代的声音》（1848）记载了他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经历。在《1831年的贵族》中，他歌颂了参加起义的爱国人民，抨击了

贵族的背叛行为，这首诗经过谱曲，后来成了一首革命歌曲。

四十年代初，在华沙还出现了所谓“波兰茨冈派”。这一派诗人过着茨冈人的流浪生活，他们的行为放荡不羁，以此表示对现实不满和对民族敌人的仇恨。他们常去农村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和农奴制压迫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在他们中有成就的首推弗沃基米耶日·沃尔斯基（1824-1882），他的长诗《哈尔卡》曾被著名音乐家莫纽什科谱上曲谱，成为波兰最著名的歌剧。还有一些青年诗人，他们充满了爱国热情，志在创造一个正义的社会，被称为“热情派”，其中影响较大是女作家纳尔齐扎·兹米霍夫斯卡（1819-1876），她的小说《女异教徒》批判了贵族，表现了民主思想。

在沙俄占领区较有成就的小说家有尤泽夫·科热尼约夫斯基和尤泽夫·伊格纳齐·克拉谢夫斯基。尤泽夫·科热尼约夫斯基（1797-1863）是一位剧作家和小说家，早年发表剧本，有讽刺贵族贪婪的《犹太人》和写农民在奥地利占领者征兵中遭遇不幸的《喀尔巴阡山山民》。后来他创作了小说《投机者》和《分解》，《投机者》刻画一个为了猎取嫁妆而不择手段的投机者的形象。《分解》揭露了在农村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所表现的自私、贪婪和残暴。

尤泽夫·伊格纳齐·克拉谢夫斯基（1872-1887）是十一月起义后最著名的作家，也是波兰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政论等达五百卷，其中以小说为主。他的小说以题材论，大致可分两种，即反映农民生活的“农民小说”和历史小说。前者主要的有《乌兰娜》、《雅雷娜》、《奥斯塔普·蓬达尔楚克》、《村外茅屋》、《叶尔莫瓦》和《篱笆木桩的故事》等，这些作品颂扬了农民勤劳和善良的品德，反映了他们在封建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后者从波兰史前的《古老的传说》开始，一直写到十八世纪中叶，几乎涉及波兰全部历史的内容。克拉谢夫斯基写历史小说的意图是，在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情况下，使人民永远记得波兰数世纪来的光辉历史，以增进他们的爱国思想。

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兹南地区，由于较早地实行了农奴解放，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各阶层社会活动频繁，文化事业也繁荣发展，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占领者当局的控制，这里文坛上的代表是雷沙尔德·贝尔文斯基（1819-1879），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他年轻时就常去乡下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和传说，从中吸取素材，创作了《大波兰小说集》，这部作品写的是波兰古代异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后来他又出版了长诗《波兹南的唐璜》，这是一部带议论的诗作，主要针贬贵族落后和狭隘的思想方法，贝尔文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革命抒情诗集《生与死的书》，这是他1844年和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艾德瓦尔德·邓博夫斯基一起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时写的。在《向未来进军》这一首中，他指出了对被压迫者来说，只有革命才能推翻特权阶级，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

奥地利占领区的情况和其他两个占领区有所不同，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当时忙于他们的内部事务，无暇顾及这里的政局，因而这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恢复较早。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四十年代就出现了两位革命诗人：罗曼诺夫斯基和乌叶伊斯基。密奇斯瓦夫·罗曼诺夫斯基（1834-1863）年轻时就参加了秘密爱国组织，1864年4月牺牲在战场上。他的诗歌继承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大都以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乌

叶伊斯基（1823 - 1879）从四十年代开始写作，他的长诗《马拉松》以古希腊使者从马拉松到雅典报讯的距离比喻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持久性。其他作品再现了 1894 年科希秋什科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1864 年加里西亚爆发的农民起义，但他美化了贵族地主，对农民起义认识不清。

亚力山大·弗雷德罗（1793 - 1876）是波兰著名的喜剧作家，他出身于小波兰地区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1809 年，波兰军队从华沙公国开往加里西亚，弗雷德罗借此机会参了军，1812 年，他参加过拿破仑指挥的对俄战争，1814 年退役后，他住在利沃夫。在 1818 至 1835 年间，他发表了《哥德哈布先生》、《丈夫和妻子》、《外国化》、《约维亚斯基先生》和《终身利益》等剧作，主要讽刺贵族资产阶级崇洋媚外，揭露他们的贪婪、吝啬、虚伪和淫乱的道德面貌和生活方式。《少女的宣誓》和《报复》是弗雷德罗的代表作。前者写两对男女的爱情纠葛，后者揭示两个家庭长期存在矛盾，争吵不休，但他们的后代却相互爱恋，一对情人终成了眷属，两个家庭也得到和解。弗雷德罗喜剧的人物和情节都很生动有趣，深受观众的喜爱。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是波兰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的 1863 年一月起义的爆发，表明了波兰反抗沙俄占领者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了高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了占领者以有力的打击。起义失败后，沙俄当局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他们不仅掌握了波兰王国的军队大权，而且规定在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全部使用俄语，企图从根本上消灭波兰人的民族性。可是由于一月起义的影响，沙皇也不得不于 1864 年 2 月 19 日宣布在波兰王国废除封建农奴制。此后，波兰王国城乡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无产阶级也开始诞生和成长起来，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迅速激化的形势下，八十年代便出现了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在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波兰王国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也出现了各种思想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实证主义建国纲领，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科学民主，为波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主张对沙俄占领者实行妥协。在文学上反对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者所提倡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说明他们在这方面又站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一边。

这一时期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在体裁上则以小说创作为主。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它较之以往时期的文学更广泛和更深刻地揭示了波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不同阶级的典型人物。二、继克拉谢夫斯基后，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作家们大都由于占领者当局对书刊出版的检查和干涉，不能直接揭露社会中的症结，因而不得不借古喻今，用写历史小说来加深读者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三、在艺术形式上，波兰小说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著名的作家善于对社会的全貌作艺术的概括，在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作品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提炼等方面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有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科诺普尼茨卡、热罗姆斯基和莱蒙特。

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 - 1916）出身于卢布林一个租赁地主的家庭，父亲参加过一月起义，因此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爱国主义的教育。七十年代初，他和华沙报刊联系，开始发表小说：《徒劳无益》和《沃尔瓦皮包里的幽默作品》（1872）颂扬了华沙实证主义者的施政纲领。《老仆人》（1875）和《哈妮娅》（1870）反映了一月起义前的贵族生活，但对封建宗法制的奴仆关系作了美化。1876 到 1879 年间，显克维奇以《波兰报》记者身分旅游北美，写了报告文学《旅美书简》。在这部作品中，他广泛地描写了北美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颂扬了美国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也揭露了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压迫和对华人的歧视。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1877）、《音乐迷扬科》（1879）、《一个波兹南家庭教师的回忆》（1879）、《奥尔索》（1879）、《穿过大草原》（1879）、《为了面包》（1880）、《灯塔看守》（1881）、《胜利者巴尔代克》（1882）和《酋长》（1883）等。这些作品有的反映了波兰人民在沙俄、普鲁士占领

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有的描写农民不堪贫苦境遇，流亡北美遭受的苦难，有的揭露了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残酷的压迫。

八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在 1882 至 1888 年间，他发表了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火与剑》以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波兰贵族和乌克兰农民的战争为背景，真实地揭露了乌克兰贵族赫米尔尼茨基为实现他称霸乌克兰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祖国，勾结沙皇和克里米亚鞑靼汗国，并伪装革命，利用乌克兰农民起义，分裂和肢解波兰的罪行，但对乌克兰农民起义作了歪曲事实的描写。《洪流》写的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波兰反抗瑞典侵略的战争。它真实地揭露了瑞典侵略者疯狂掠夺波兰人民的财富，烧毁波兰城市和屠杀波兰人民的滔天罪行，抨击了一部分大贵族卖国投敌的可耻行径，生动地再现了在国王领导下由爱国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的统一战线以人民战争反击和战胜侵略者的全过程。《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以七十年代初波兰反抗土耳其侵略为背景，讴歌了波兰军队 1672 年为保卫卡米涅茨城堡和土耳其侵略军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这套系列作品的发表，大大地激发了波兰人民爱国斗争的精神。

九十年代初，显克维奇发表了两部现实题材的小说：《毫无宗旨》（1891）刻画了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波瓦涅茨基一家》写一个善于经营买卖的资本家，作者指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也揭露了他的投机取巧和损人利己。显克维奇晚年还出版了两部重要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1896）和《十字军骑士》（1900）。前者取材于古罗马尼禄皇帝统治时期，通过尼禄下令焚烧罗马，将基督教徒送竞技场处死以及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罗马统治者对人民野蛮残酷的压迫，颂扬了早期基督教体现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后者反映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波兰北方人民遭受日耳曼骑士团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显克维奇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和三部曲一样，在于激发人民对普鲁士占领者的仇恨，鼓舞他们去反抗压迫。他在说中通过波兰国王领导军民最后在格隆瓦尔德打败十字军骑士团的描写，也表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战争的性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显克维奇是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最深刻地揭露了异族侵略者对波兰的压迫和波兰人民反压迫斗争的正义性。在艺术上，他的小说以虚构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见长，他的历史小说在再现古代社会时，既反映时代的面貌，又很富于生活气息。在描写战争和各种事变的场面时，既展现磅礴的气势，又写得细致入微。在塑造人物上，他善于将他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放在各种激烈的战争场面和戏剧性的冲突中，来表现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才能，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明突出，栩栩如生。显克维奇的文笔优美，他的人物的语言也具口语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高尚和善于克制。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正因为这样，他于 190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波利斯瓦夫·普鲁斯（1847 - 1912）也是一位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十六岁时就参加了一月起义。他最初写小品文和政论，反映了社会中的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八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顶楼上的房客》（1875）、《孤儿的命运》（1876）、《米哈尔科》（1880）、《改邪归正的人》（1881）、《一件背心》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颂扬了他们患难与共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美

德，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贪婪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中篇小说《回浪》（1880）还直接描写了资本家如何压迫工人，工人奋起反抗和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全过程。

普鲁斯从八十年代开始发表长篇小说：《前哨》（1885）写一个波兰农民在德国殖民者的打击和侵犯下陷入种种灾难，深刻揭示了波兰农村的民族矛盾。长篇小说《玩偶》（1887-1889）是普鲁斯的代表作。它的情节围绕暴发户沃库尔斯基追求贵族小姐伊莎贝拉的失败，以及他和华沙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深刻地揭示了一月起义后波兰商业资本主义勾结沙俄外资，在和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条件下发展的状况。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对封建贵族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作了有力的批判。《解放了的女性》（1890 - 1893）通过一个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女性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和小市民的自私狭隘。《法老》（1895）以古埃及拉美西斯王朝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拉美西斯十三世法老和保守的祭师集团之间的斗争，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和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普鲁斯的作品善于高度概括地展示波兰社会的全貌，深刻反映现实中的黑暗，对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艾丽查·奥热什科娃（1841 - 1910）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地主家庭。她在一月起义爆发期间，在起义部队中做过通讯联络、采办粮食、给起义战士缝制衣衫的工作。奥热什科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最初发表短篇小说如《荒年》（1866）、《厄运》（1876）、《尤里扬卡》（1878）、《不愉快的山歌》（1878）等，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自私和冷酷，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社会旧习的不公正。她的长篇小说《马尔达》（1872）写一个妇女由于封建旧习的戕害而遭遇不幸。从六十到八十年代，她还发表了两组小说：第一组总的题目叫《幽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反映了波兰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颂扬了革命者为创造一个美好正义世界而奋斗的理想。另一组包括《底层》（1864）、《久尔济一家》（1885）、《涅曼河畔》（1887）和《乡下佬》（1888）等作品，它们都以立陶宛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在沙俄农奴制长期统治下波兰农村愚昧落后的面貌和贫苦农民在沙俄占领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涅曼河畔》是奥热什科娃的代表作，描写地主别涅迪克特和农民安哲尔姆因他们的哥哥一同参加过一月起义，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十分密切，后来别涅迪克特欺压佃户，企图强占安哲尔姆的土地，使两家产生了矛盾。别涅迪克特后来在儿子劝导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他的族女尤斯迪娜也和安哲尔姆的儿子杨相爱结了婚，两家终于和好。小说宣扬了平等、博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精神。

玛丽娅·科诺普尼茨卡（1842 - 1910）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波兰民族解放斗争革命传统的教育。她的作品一开始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为此遭到了沙俄当局的迫害，她不得不离开波兰，长期流亡国外。在俄国 1905 年革命爆发期间，她一度回到华沙，参加过救援被沙皇囚禁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工作。科诺普尼茨卡一生的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她连续发表了七部诗集，有的以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有的写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在这期间，她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集，如《四个短篇小说》（1888）、《我的相识者们》（1890）、《在路上》（1893）、《短篇小说集》（1897）等。这些作品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和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并对政府法

庭迫害劳动人民的罪恶提出了控诉。在 1902 - 1908 年间，科诺普尼茨卡发表了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它写一群波兰农民漂洋过海，去巴西谋生，可是在那里却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和当地德国殖民者的压迫，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港口，参加了当地工人反对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游行。作品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

斯泰凡·热罗姆斯基（1884 - 1925）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因为参加爱国活动，曾被沙俄当局囚禁。九十年代末，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徒劳无功》（1898）和《无家可归的人们》（1900）。前者写一个沙俄当局控制的学校，当局在这里对波兰学生实行俄罗斯化，爱国学生和他们进行斗争，小说带有自传体性质，后者主人公是个鞋匠出身的医生，他决心改善城乡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但他的努力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阻挠，没有成功。1902 至 1903 年发表的小说《灰烬》以十八世纪末东布罗夫斯基为了祖国的独立，组织“波兰志愿军团”，参加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揭露了拿破仑对异国的侵略，反映了波兰农民遭受封建压迫的痛苦。在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后，热罗姆斯基又创作了剧本《玫瑰》（1909）和小说《罪恶史》（1909），这两部作品讴歌了波兰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祖国的独立，在战斗中建立的功勋，但反映了作者在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情绪。热罗姆斯基的一生和创作表现了他对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革命的同情，但他作品中的激进人物都是一些脱离群众的孤军奋斗者，他们的事业总是失败。

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8 - 1925）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十八岁就出外谋生，因和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对劳动者的生活际遇有深刻的了解，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如《母狗》（1892）《汤美克·巴朗》（1893）、《正义》（1899）等对那些阴险残暴的工头、地主、仗势欺人的管家、虚情假意的村长和神父进行了揭露，并且刻画了敢于坚持正义、反抗黑暗现实和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形象。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1895）和它的续篇《烦恼》（1896）反映了社会下层艺人的不幸。《福地》（1897 - 1898）以当时波兰最大的工业城市罗兹的工业发展状况为背景，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塑造，揭露了这个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面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实质。长篇小说《农民》（1902 - 1908）是莱蒙特的代表作，小说的主要情节通过富裕农民波利那一家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展示了一个农村封建宗教法制家庭的没落和解体。此外，它还在波兰二十世纪初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生动地再现了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歌颂了农民反抗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以及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波兰地主阶级的斗争。莱蒙特正是“由于他那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于 192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除以上作家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迪加辛斯基、奥尔坎、扎波尔斯卡、斯特鲁格和先罗谢夫斯基等。阿多尔夫·迪加辛斯基（1839 - 1902）出身于一个地主管家的家庭。曾参加一月起义。他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在鸟巢里发生了什么》（1883）和长篇小说《兔》（1900）。它们的特点是在描写人的不幸遭遇时，又写动物的遭遇，加以类比，指出弱肉强食既存在于动物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在手法上，有自然主义倾向。弗瓦迪斯瓦夫·奥尔坎（1876 - 1930）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雇农们》和《在岔道上》。前者刻画了一个凶残自私的地主形象，后者写一个农民出身的改革家，他认为小农经济和土地兼并是农村饥饿落后的根源，因此提出了农村

集体化计划，但他脱离群众，孤身奋斗，最后失败。加布列娜·扎波尔斯卡（1857 - 1921）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她出身地主家庭，年轻时就参加波兰各地的戏剧演出活动。她的作品大都揭露波兰市民阶层的虚伪和狡诈，讽刺他们的狭隘和愚昧无知。她最著名的剧本《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写的是一个女房东杜尔斯卡，她讲门第，爱面子，但她的儿子兹贝什科却和厨娘汉卡通奸，引起舆论的指责，她为了维护体面，矢口否认她过去对儿子的放纵，而当儿子提出要和汉卡结婚时，她又嫌她出身低贱，表示不同意，后来她不得不花一千克朗把汉卡辞退，但她最后表示要把这钱“加倍地捞回来”。剧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吝啬、自私而又虚伪的典型性格，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安杰伊·斯特鲁格（1871 - 1937）出身于卢布林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爱国活动，1893年又加入波兰社会党，曾多次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和流放。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地下活动的人们》（1908）、长篇小说《明天》（1908）、《一颗炮弹的历史》（1910）等主要描写波兰社会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他们主要搞暗杀，以为杀死几个沙俄当局的大官，就可以推翻他们在波兰的统治，这些革命党人大都脱离群众，孤军奋战，但他们表现了热爱祖国、不怕牺牲的精神。瓦茨瓦夫·先罗谢夫斯基（1858 - 1845）出身于一个爱国贵族的家庭，早年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曾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长篇小说《林边》（1894）、《陷阱》（1897）等就是描写西伯利亚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被压迫的命运。二十世纪初，先罗谢夫斯基远去亚洲旅行，到过中国、日本，朝鲜和蒙古，写过不少反映他所见到的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如《中国小说集》（1903）、《洋鬼子》（1909）、《越浪》（1910）等都很影响。《洋鬼子》以清末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为题材，作者对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愤怒的谴责，讴歌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还出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要是革命诗歌创作的高潮。早在1879年，革命诗人希文切茨基等在华沙监狱中就创办了手抄刊物《囚徒之声》，发表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此后在八十年代和1905年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革命诗歌集。这些诗歌都是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和敌人作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创作的，它们的题材直接来源于斗争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其中尤以切尔文斯基的《红旗》（1881）、希文奇茨基的《华沙革命歌》（1883）和瓦林斯基的《镣铐歌》最著名，三位作者都是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领导者或参加者。他们的作品充满革命激情，有的揭露了沙皇对波兰的残酷压迫，反映了人民对压迫者的仇恨，有的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要和侵略者战斗到底。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创作出现繁荣景象的时候，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斯瓦夫·普日贝谢夫斯基（1868 - 1927）于1899年提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纲领，认为艺术不来源于生活，不反映社会矛盾，它的目的就是它自己。艺术家是天才，是人民群众无法理解的天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艺术都是等而下之的艺术，只有象征的艺术才是天才的艺术。与此同时，在诗歌和戏剧中也出现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创作流派，其代表作家有泰特马耶尔、卡斯普罗维奇和韦斯比杨斯基等。

卡齐米日·泰特马耶尔（1865 - 1940）的诗歌首先表现了一种怀疑一切的情绪，他对世界、对人类至今创造的一切价值都表示怀疑。他由怀疑便产生痛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高尚的。他的抒情诗和写景诗善于运用光线、色彩和音乐的调配，创造某种气氛，以表现他的思想情绪的变幻，富有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艺术特色，杨·卡斯普罗维奇（1860 - 1926）年轻时参加过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曾被沙俄占领者逮捕入狱。他早期的诗歌描写了波兰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在 1899 年发表的长篇抒情诗《赞歌》中，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面临灾变，但也充满了爱，它可以得救，长诗富于表现主义艺术特色。斯坦尼瓦夫·韦斯比扬斯基（186 - 1907）是著名的象征派剧作家，但他的剧作从题材到构思却有不少现实主义成分，他把象征当成一种表现手段，如《婚礼》（1901）讽刺了加里西亚一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生活和习俗的无知，谴责了他们对农民革命的敌对态度。剧中以草人象征农民起义的失败，反映了作者在波兰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后的悲观情绪。《华沙歌》（1898）和《十一月之夜》（1904）都以 1830 年十一月起义和它的失败为题材，剧作者颂扬了起义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但他又以各种象征的描写，暗示一种超人的力量：灵魂或天神主宰了一切，决定起义的成败，反映了他的宿命论思想。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和奥地利的失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波兰获得了独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民主党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1926年5月，波兰社会党前首领毕苏茨基发动军事政变，在推翻国家民主党的政府后，又成立了他所领导的萨纳奇亚政府。可是在他的政府统治下，波兰国内矛盾更趋尖锐化。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波兰经济危机严重，这个政府开始对左派和民主力量进行镇压。1935年5月，毕苏茨基病逝，但是萨纳奇亚又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的阴谋长期丧失警惕，终于导致波兰于1939年9月被德国法西斯灭亡。波兰人民由于法西斯的侵略和压迫，遭到了空前的灾难，这期间，波兰共产党人和人民坚持抵抗，1942年1月成立了波兰工人党，组织了人民近卫军，和当时一个流亡伦敦的资产阶级政府领导的国家军一起，同希特勒侵略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配合苏联红军于1944年7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建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由于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和复杂。在文学创作领域内，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现实主义流派仍占主导地位，在以独立后波兰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中，不仅从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黑暗，而且广泛地反映了波兰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状况和他的革命斗争。新一代作家东布罗夫斯卡、纳乌科夫斯卡和克鲁奇科夫斯基对波兰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和政治面貌作了广泛的描写，影响最大。

玛丽娅·东布罗夫斯卡（1889 - 1965）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她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曾在洛桑、布鲁塞尔的伦敦等地上大学。她于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如《祖国的孩子们》（1921）、《樱桃枝》（1922）、《童年的微笑》（1923）多以自己童年生活为题材。短篇小说集《从别处来的人们》（1925）取材于1905年前后的农村生活，反映了农民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描写了他们敢于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相信斗争一定取得胜利的乐观精神。长篇小说《黑夜与白昼》（1932 - 1934）是东布罗夫斯卡的代表作。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包古米尔·尼赫奇茨和芭尔芭拉·奥斯特辛斯卡一家三代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深刻反映了1863年一月起义失败后经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几乎半个世纪波兰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波兰城乡的革命活动和波兰人民在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苦难，指出实证主义纲领在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波兰是不能实现的。

卓菲娅·纳乌科夫斯卡（1885-1954）出身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在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参加过波兰进步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的爱国活动，她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发展不平衡，有的受当时象征主义流派的影响，在思想上反映出作者的宿命论观点，有的充分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泰蕾莎·亨涅尔特的浪漫史》（1923）和《界线》（1935）。前者写一个小业主亨涅特因善于和工、商、政界人士拉拢关系，做投机买卖，成了暴发户。作者描写主人公的寄生腐化生活，通过他和上层统治者的复杂关系，反映了萨内齐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界线》写一个杂志编辑在和上层人物的交往中，爬上了市长的地位，可是他当上市长后，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的政策激起了工人的反抗。

利昂·克鲁奇科夫斯基（1900 - 1962）出身于一个装订工人的家庭，他毕业于克拉科夫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曾在东布罗瓦煤矿区的职业学校里任教。他早期写过关于矿工生活的小说。1932年发表的历史小说《科尔迪杨和乡下佬》是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以1830年十一月起义前夕的波兰王国为背景，描写波兰地主勾结沙俄占领者对农奴的残酷压迫，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农民革命者的形象，如主人公德尔卡奇，他受法国大革命和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认为沙皇政府不是农民的，必须废除法律闹革命。这部作品是针对斯沃瓦茨基的诗剧《科尔迪杨》写的，斯沃瓦茨基笔下的贵族主人公虽然孤军奋战，表现软弱，但还是一个革命者，可是克鲁奇科夫斯基对贵族领导的十一月起义却持否定的态度，他把起义的领导者写成是一群事到临头不知所措的盲动主义者，因为他们领导不力，没有提出和解决农奴解放的问题，才导致起义的失败。

1933年，由海仑娜·博西谢夫斯卡（1883 - 1978）等一批作家提议，成立了“城郊文学社”。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但他们的创作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以波兰城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这些作品反映了三十年代城市产业工人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和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反映了农民不堪国内的贫困生活，离乡背井，去国外谋生的情况，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

在诗歌创作中，现实主义也占主导地位。早在1916年，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杜维姆·斯沃尼姆斯基、伊瓦什凯维奇和老诗人斯达夫等一起创办了一个大学生杂志《为了艺术》，后来他们又办月刊《斯卡曼德尔》，并以“斯卡曼德尔”为名结成诗社。这个诗社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他们早期的作品单纯追求形式，有唯美主义特征，后来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莱奥波尔德·斯达夫（1878 - 1957）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创作，他这时期的诗歌虽然没有更多地接触现实，但歌颂了人的智慧和劳动以及仁爱无私的美德，表现了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1884 - 1980）这时期的作品热衷于写孤独的个人，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尤利杨·杜维姆（1894 - 1953）是这时期的著名诗人，出身于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窥伺上帝》（1918）、《跳舞的苏格拉底》（1920）、《第七个秋天》（1922）、《血语》（1926）、《黑林村纪事》（1929）、《吉卜赛的圣经》（1933）等。杜维姆早期的诗歌表现了他对大自然和青春美的热爱和追求，充满乐观主义情调。在独立后的波兰，他的诗中常出现被残害或者精神失常的人的形象，象征一个病态的社会。二十年代末，杜维姆逐渐洞察现实中的贫富不均，阶级对立，穷人永远处于饥寒交迫，可是那些银行家和交易所的经纪人靠敲诈勒索，投机取巧却大发横财，诗人指出他们背叛了他们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革命民主精神，成了堕落的市侩。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诗歌中，他对那些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榨取人民血汗的战争狂人和不顾国贫民困，终日寻欢作乐、挥霍无度的统治者作了无情的讽刺。杜维姆的诗歌激情饱满，内涵深邃，他还善于运用丰富的民间语言，刻画鲜明的形象。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1895 - 1976）出身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诗集《十四行诗集》（1917）和《黑色的春天》（1918）中，描写了个

人生活中的痛苦经历，表现了他对旧世界的怀疑，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揭露了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在诗集《没有格子的窗》（1935）中，他深刻地指出，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在生产过剩时，为了维持商品的价格，他们把粮食和棉花烧掉，把咖啡抛入海中，可劳苦大众却只能活活地饿死。他还预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会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两次大战之间，斯沃尼姆斯基还写过剧本、小品和政论。他的喜剧《家庭》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歧视进行了讽刺，在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波兰期间，这出戏在华沙上演，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他的小品和政论文也表现了他为保卫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思想。

由革命诗人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1897-1962）、斯坦尼斯瓦夫·雷沙尔德·斯坦德（1897-1939）和维多尔德·万杜尔斯基（1891-1937）在1925年联合出版诗集《三声排炮》，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革命诗歌流派的产生。稍后参加这一流派的还有艾德瓦尔德·希曼斯基（1907-1943）、卢齐杨·辛瓦尔德（1909—1944）和布罗诺·雅显斯基（1901-1939）等。他们的诗歌继承了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创作的传统，其中以布罗涅夫斯基的成就最大。布罗涅夫斯基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校里的秘密爱国组织，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加入波兰共产党，他把诗歌创作当作武器，同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早在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风车》中，他就站在革命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强烈的反抗。五月政变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布罗涅夫斯基面对现实喊出了“我不向这个世界投降”，在诗集《城上的烟雾》（1927）中，他明确表示要使他的诗“成为战斗中飘扬的旗帜”“大风中举起的火炬”。在《革命者之死》一诗中，他为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进行悼念，把为了人类美好未来而战斗看作革命者的幸福和理想。在长诗《巴黎公社》（1929）中，诗人通过再现法国无产阶级流血斗争的光辉历史，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布罗涅夫斯基战前创作的这些诗歌生动地记载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和历史，反映了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的诗歌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工农革命运动，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十年代初，波兰诗坛上还出现了先锋派，也叫未来派。这个流派在创作上要求抛弃一切现实主义的诗歌形式和大众语言的语法形式，创作所谓新的诗歌，新词和新的句法。诗人们提出在作品中描写“机器的轰鸣”，说这是“先进的文化和文学”。这些作品的造句不合习惯的语法规则，但是它们歌颂了二十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诗人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创造一个正义美好的世界。属于先锋派的诗人有尤利杨·普日博希（1901-1970）、尤泽夫·切霍维奇（1903-1939）和斯坦尼斯瓦夫·卡达克（1909-1964）等。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戏剧创作中，以韦特凯维奇和贡布罗维奇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影响最大。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韦特凯维奇（1885—1939）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而且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他为他的荒诞派剧作构建的理论是：世界充满了罪恶和灾变，剧作家为使观众获得所谓“形而上的满足”，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自由地创造一个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既改变自己，他又被别人改变，被世界改变，因此他的荒诞剧的理论是以灾变论为基础的。在他的剧作《水鸭》（1922）和《小庄院里》（1923）中，写的都是

乱淫和仇杀的题材，展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母亲》中，他甚至塑造了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典型，主人公列昂既是一个骗子、吸血鬼，又是一个外国的间谍、刽子手。在这些剧中，韦特凯维奇构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情节，都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在《鞋匠们》这出戏中，韦特凯维奇还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主题。照他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外，革命也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把戏，既然这些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都失去了价值，这个世界就无法拯救了，它将走向灭亡。在《疯狂的火车头》中，韦特凯维奇写两个罪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驾驶一列火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直到把车头碰坏，谁没有死，就可得到这个女人，车祸发生后，死了许多旅客，这两个罪犯却没有死，结果一个被送进了疯人院，另一个自杀。在剧作者看来，文明世界正如这列火车，由于人们犯下的罪孽，使它遭到了毁灭。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 - 1969）的荒诞剧论述的也是人的生存和文明世界的主题。在《轻歌剧》这出戏中，他把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比做时装模特的展览，各种稀奇古怪的时装和模特们的疯狂的舞姿表现了这个世界处在极大的混乱之中。作者描写一个裸身姑娘藏在棺材里不仅多年没有死，而且永葆青春年少的荒诞情节，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尘世污染，有很大的讽刺意义。贡布罗维奇还写过荒诞小说，如《弗迪杜克》和《横渡大西洋》等，也很著名。不管是韦特凯维奇，还是贡布罗维奇，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力图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世界，通过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透视，深刻揭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黑暗，但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

1939 至 1944 年间，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烧毁波兰的城市和乡村，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使波兰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波兰爱国志士和进步作家面对敌人的暴行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国内除组织或参加人民近卫军、国家军打击敌人外，又秘密开办学校、地下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一批年轻的诗人这时发表诗篇和诗集，对法西斯分子的滔天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控诉，不少作品广泛地记载了爱国者和游击战士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打击和消灭了敌人。万达·杰伦奇克的《人民近卫军之歌》和埃米尔·杰齐茨的《游击队员之歌》表达了人民争取自由和消灭敌人的决心，在群众中流传很广。这些作品不仅鼓舞着人民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战斗，而且记载了波兰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

在德国法西斯侵占时期，许多老作家，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和诗人都长期流亡国外，布罗涅夫斯基流亡到巴勒斯坦，直到波兰解放后才回波兰，他在国外发表的诗集《刺刀上枪》（1943）和《失望之树》（1945）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表达了在法西斯奴役下的人民渴望自由的心声。杜维姆和斯沃尼姆斯基长期旅居欧美，杜维姆的长诗《波兰之花》表现了他对被奴役的祖国的无限怀念。斯沃尼姆斯基的诗篇《警报》（1940）写首都华沙在 1939 年 9 月被法西斯毁灭的悲惨情景，反映了诗人在祖国灭亡后悲痛心情。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944年波兰解放后，许多战时流亡国外的新老作家都回到了祖国，参加了波兰的文化建设。除回国的新老作家外，这时国内又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使战后波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波兰战后文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4年到1948年，这时期作家都热衷于写反映战争和法西斯侵略罪行的散文作品。纳乌科夫斯卡的报告文学集《颈饰》（1946）是根据她参加国际调查希特勒罪行委员会的见闻写的。沃伊切赫·茹克罗夫斯基（1916—）的短篇小说集《来自沉默的国度》（1946）主要反映波兰军队在祖国沦亡时期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斗争。塔杜施·波罗夫斯基（1922—1951）的《和玛丽娅告别》（1948）和《石头世界》（1948）揭示了占领时期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以上外，还出现了所谓“知识分子清算文学”，如耶·安杰耶夫斯基（1900—1983）的《夜》（1945）、卡齐米日·布兰迪斯（1916—）的《木马》（1946）、《战争之间》（1948—1951）、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1914—1978）的《波登湖》（1946）等，这些作品写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过坎坷的经历，战后在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有过转变。第三类小说侧重揭露战后初期的阶级斗争，如安杰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灰烬和钻石》（1948），写的是一些参加过反法西斯战斗的国家军分子，他们战后留在波兰，因不适应新的环境，便大肆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战后初期还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涉及题材广泛，如塔杜施·布列扎（1905—1970）的《耶赫雷的城墙》（1946）和《天和地》（1949）、纳乌科夫斯卡的《生活的交结点》（1948）等，反映了战前萨纳奇亚政府机构的内部斗争。卢齐杨·鲁德尼茨基（1882—1968）战前参加过波兰工人运动，他的自传体小说《旧的和新的》（1948）主要描写他的革命生涯，也真实地记载了十九世纪末至今的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

在战后初期的诗歌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罗涅夫斯基的《爱情之歌》、《五月的歌》、《波尼亚托夫斯基桥》，它们表现了诗人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的女子和战友的怀念，歌颂了波兰战后的建设。密齐斯瓦夫·雅斯特隆（1903—1983）的诗也充满了乐观精神，为祖国人民战胜法西斯，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而欢呼。康斯坦丁·高尔钦斯基（1905—1953）的诗歌主要讽刺波兰现实中的市侩和官僚主义。在戏剧创作中，克鲁奇科夫斯基这时发表的《德国人》影响很大。它以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第三帝国为背景，写一个生物学教授不关心政治，但他的研究成果却被法西斯当局用来屠杀人民。剧中生动刻画了包括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员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指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谁也脱离不了政治斗争。耶日·沙尼亚夫斯（1886—1970）的《两个剧院》（1946）的形式独特。剧作者企图通过对戏剧的两种不同理解，来说明它的社会作用：一种剧客观地反映现实，不加虚构，另一种剧表现一个想象的世界，富于哲理的内涵。

1949年1月，波兰作家协会在什切青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波兰作家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作家及时反映现实中的阶级矛盾，歌颂战后社会主义建设，担负起教育人民的使命。一些作家在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写了些反映国内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建设热潮，但也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表现是：它们写的都是工农业生产的过程，敌人搞破坏，工人农民与之斗争，

最后取得胜利，主题千篇一律。它们刻画的人物不是生产积极分子就是国际间谍和国内其他破坏分子，千人一面。这样，它们就成了对当前政策的图解，后被称为生产文学。在它们中也有写得好一点的，但是不多。除生产文学外，还有一些作家由于深入生活，研究历史，也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耶日·普特拉门特（1910—1986）的长篇小说《九月》（1952），它揭示了波兰1939年9月的失败是萨纳齐亚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茹克罗夫斯在小说《失败的日子》（1952）中，揭露了一些军官在战场上胆小无能。博格丹·切什科（1923—）的《人民近卫军》（1951）再现了人民近卫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阿多尔夫·鲁德尼茨基（1912—）的短篇小说集《活海和死海》（1952）描写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的悲惨命运。伊戈尔·内维尔利（1903—）的小说《一个人的道路》写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人的斗争生活。

1954年，由于波兰政局发生变化，在六月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上，有的作家重申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提出的解冻文学。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克鲁奇科夫斯基号召作家扩大创作题材。1955年，在一些报刊上，许多作家提出了创作自由的要求，指出对文艺中的各种流派不应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限制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一些观点新颖的作品，如斯坦尼斯瓦夫·斯塔文斯基（1921—）的《下水道》（1955），描写1944年爆发的反抗德国法西斯压迫的华沙起义，参加者有国家军、人民近卫军官兵和数以万计的华沙市民。起义失败后，他们从华沙老城的下水道中撤走，但最后全都落入在道口等着他们的法西斯匪徒之手。作者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同政治派别的波兰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御外敌。东布罗夫斯卡的中篇小说《乡村婚礼》以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波兰农村为背景，表现了农民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不同态度。

在诗歌创作中，这一时期仍以布罗涅夫斯基、杜维姆和康斯坦丁·高尔钦斯基和亚当·瓦日克（1905—1982）等最有成就。布罗涅夫斯基在《职工联盟》、《希望》和《我们的五月》等诗篇中，歌颂了波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祖国建设中的劳动热情和献身精神。高尔钦斯基的《结婚戒指》（1949）、《歌》（1953）、《纽贝》（1951）等告诉人们应当敬仰英雄、同情牺牲。杜维姆的诗集《玫瑰》指出了报刊上的官样文章空洞无物。瓦日克的《给成年人的长诗》（1955）讽刺了波兰社会中谎报事实的宣传和空洞的口号，指出这里的事情都得按教条办，工人劳累过度，可是没有人敢说话，这首诗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戏剧创作中，安娜·希维尔什钦斯卡（1909—）的《对着墙壁呼唤》（1951）描写波兰早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瓦林斯基在他被捕之后，工人运动如何加强了团结，坚持了罢工斗争。耶日·卢托夫斯基（1923—）的《急诊值班》（1955）刻画了一个为人正直、医术高超的医生因为在占领时期参加过国家军，战后投入监狱。这时有位党的领导人生了病，在让不让他治病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样又给医生在精神上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个剧和小说《下水道》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国家军军人和过去和现在。

1956年，在波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于十月召开第八届中央全会，制定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社会各界对波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十分关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文艺方面，人们首先接触的，是对欧美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如何评价，作家们一致肯定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审美和借鉴价值，指出波兰党前一阶

段的文化政策因为否定现代派文学，使波兰文坛和欧美现代文学长期隔绝，从而失去了同西方文化思想，创作经验交流的机会。此后一段时期，欧美二十世纪各种流派代表作家的许多作品在波兰相继得到了翻译出版。

在创作中，一些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如马列克·赫瓦斯科（1934—1969）、斯坦尼斯瓦夫·格罗霍维亚克（1934—1976），弗瓦迪斯瓦夫·泰尔列茨基（1933—）、艾乌盖纽什·卡巴茨（1930—）、伊列内乌什·伊列登斯基（1933—）等。他们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可是看到国家建设中的困难，就产生悲观，表示怨愤。他们的作品热衷于揭露 1956 年以前波兰社会中的阴暗面，后被称为“清算文学”。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末，除了政治性较强的清算文学外，当然不乏有声望的作家和杰作，但这些年出版的大部分反映现实的作品却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与群体的对立，说明个人必须摆脱群体的控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散文创作的体裁而论，除小说外，许多作家热衷于写随笔、报告文学、政论、特写、和回忆录等，因为这些形式便于直截了当地表达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看法，一作家甚至将随笔、报告文学、政论、特写、小说这些不同的创作形式拼凑在一部作品里，在这种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情节时，往往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他个人的人生哲理，而小说情节的本身，也十分零乱和有头无尾，这就是当时在波兰风行的所谓“反小说”。在戏剧创作中，除了传统模式的现实主义剧作外，这些年又出现了荒诞派戏剧。这时期的荒诞派戏剧的内容与形式和西方五十年代出现的荒诞派戏剧有相似之处，也继承了波兰两次大战之间荒诞派戏剧的艺术传统，但也表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此同时，文学中还出现了所谓“新浪潮”派。它在诗歌中的代表是斯坦尼斯瓦夫·巴兰哈克、雷沙尔德·克雷尼茨基、艾娃·利普斯卡等。这些青年诗人富于革新精神，表示要以不加修饰、简洁明快的语言揭露现实中所谓长期隐蔽的矛盾和不安，展示检查机关禁止公开的社会真情，实际上他们否定现实中的一切。这一派在小说中的代表是马列克·诺瓦科夫斯基、卡齐米日·奥尔沃希和弗沃齐米日·奥多耶夫斯基等。这些作家认为波兰文学至今所描写的社会是所谓“官方的”，不典型，只有那些罪犯，社会渣滓生活的世界才是最真实和最典型的。他们观照的是一个腐朽堕落的黑社会，流氓、小偷，醉鬼和妓女主宰的社会，这种小说当时被称为“黑色文学”。

此后，一些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国家书刊检查机关的干涉，得不到出版而表示不满，于是组织秘密出版，社会上的反对派对官方执行的各项政策进行猛烈的攻击。1980 年，又出现了团结工会掀起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许多作家都参加了团结工会，另一批作家因不满现实而奔走国外，作家协会和它在各地的分会也掌握在反对派手中，作家队伍因此分化和改组。后来，由于团结大会力量的继续扩大，终于在 1989 年在波兰议会的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开始掌握国家政权。

1956 年以后至今的几十年，除了清算文学、黑色文学和其他直接观照国内政局的文学外，还有许多新老作家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创作了大量作品，是波兰当代文学创作的丰收。在小说创作中，有成就的首推伊瓦什凯维奇。伊瓦什凯维奇早在三十年代就创作诗歌，战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集，题材广泛，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名望和光荣》（1956—1962）。这部小说通过原先生活在乌克兰的三个波兰家庭的三代人的遭遇，

从广阔的背景，再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1947 年间波兰的社会生活。作者以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展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揭示了在十月革命爆发时乌克兰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波兰独立后各阶层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小说在描写波兰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失败之后的状况时，也热情地歌颂了波兰士兵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因此它的种种人物的命运是和波兰民族历史的变迁紧密联在一起的。这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它在战后的波兰文学史中，被誉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罗曼·布拉特内（1921—）的小说《哥伦布们，即二十岁的一代》（1957）描写包括国家军军人在内的波兰青年和占领者的斗争以及他们在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不幸遭遇。

普特拉门特这时期出版了一系“政治小说”，如《不忠实的人们》（1967）以 1956 年以前波兰社会中的一些政治事件为题材，《年青的一代》（1963）写政府机关中的个人崇拜，以及年青一代和它进行的斗争。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是波兰战后科学幻想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告诉人们：人类在各种科学领域中，总是不断的探索，发现，努力认识自己以往不曾认识的东西，不可墨守陈规，也不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的小说《旅行家》（1858）企图说明一个道理，夙愿和它的不能实现之间可悲的矛盾，在一个人身上是永远存在的，每个实现个人夙愿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安杰耶夫斯基的《渣滓》（1981）展现了六十年代华沙文艺界的情况，官方要求艺术为它的利益服务，艺术家反对控制。塔杜施·诺瓦克（1930—）的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当代农民的思想感情，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及农村的风俗习惯。威廉·马赫（1917—1965）的《黑海滨的群山》（1961）被认为是波兰“反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人们之间的仇杀为主题，但作者在某些章节中，干脆脱离故事情节，以主人公或作者与小说中讲故事的人对话的方式，发表对当代文学、社会和人的看法。他们认为，由于二十世纪的战争灾祸和科技进步的影响，人类的生活变得纷纭复杂，因此作家需要探索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对小说中的时空观念应有新的理解，他们笔下人物的流动也可违背正常的逻辑，这种表面上看来的混乱和荒谬正是生活的真实。塔杜施·孔维茨基（1926—）的《当代圆梦书》（1971）写一群人在某个地方的巧遇，而这中间又穿插着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各种叙事交替出现，结构奇特。卡齐米日·布兰迪斯的《浪漫情调》（1960）、《生活方式》（1963）和《市场》（1968）也是对于小说形式的新的探索的一种表现。

这一时期写战争和占领时期的作品数量很多。塔杜施·霍乌伊（1916—）的《我们世界的末日》（1951）描写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和他们的反抗。《天堂》（1972）揭露希特勒匪徒的杀人实验。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1913—）的小说反映集中营囚徒的各种感受，揭露一些至今逍遥法外的希特勒刽子手的罪恶心理。切什科的《哀诗》描写在波兰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几个礼拜，人民军某部一段痛苦的行军的过程。茹克罗夫斯基的《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1961）写一群人民军战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后，和一伙成了武装土匪的国家军分子展开的一场激战。海伦娜·阿乌德尔斯卡的《鸟道》（1973）和《晴和的秋天》（1974）反映占领时期旅居苏联的波兰侨民对祖国的怀念和他们返回祖国旅途的艰辛。

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泰奥多尔·帕尔尼茨基（1908）甚为多产。他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的历史，但他有时凭主观想象再现

历史，和真实相去甚远。泰尔列茨基也是个多产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主要反映波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霍乌伊的《玫瑰和燃烧的森林》（1973）写革命领袖瓦林斯基在沙皇监狱中最后几天的生活，他想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他的同志和朋友。安杰伊·库希涅维奇（1904—1993）的历史小说《第三王国》（1975）颇为著名，它写的是战后德国的一场政治斗争，一个共产党员过去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战后却为德国战犯辩护，因而遭到年轻一代的谴责。

在1956年以后的诗歌中，最有成就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米沃什早在战前就写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华沙秘密编辑出版反法西斯诗歌，战后曾在波兰外交部供职，1951年留居国外，先在巴黎，1960年迁居美国。从五十年代起，他在国外发表了二十多部诗集和小说，主要的有《白昼之光》（1953）、《诗的论文》（1957）、《波别尔王和其它的诗》（1962）、《中了魔的古乔》（1964）、《没有名字的城市》（1969）、《日出日落之地》（1974）、《诗歌集》（1977）及长篇小说《权力的年龄攫取》（1955）和《伊斯塞谷》（1955）等。这些作品深入到了战后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诸方面的题材，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虚伪、空谈、浮华、欺骗、不求实际，吵吵闹闹的现象。他认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个人不能表现自己的真诚和坦荡，因而失去了自由，成为“历史和生物本能的看不见的力量和俘虏。”米沃什因为“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于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国内，许多诗人这时期都热衷于写农村题材，但风格各异。斯坦尼斯瓦夫·卡塔克这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写的是农村的生产劳动和自然风光，常将现实和梦幻连在一起，富于童话色彩。杨·波列斯瓦夫·奥若格（1913—）的诗也描绘农村的大自然，他把自己看成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欢乐，也给他带来痛苦。耶日·哈拉塞姆维奇（1933—）热衷于在诗中叙述优美的民间故事，描绘农村绚丽多姿的景色。米龙·比雅沃谢夫斯基（1922—1983）的诗大都反映城市郊区穷人的艰难处境。还有一些诗人涉猎题材较为广泛，如博格坦·德罗兹多夫斯基（1931—）的诗歌继承了布罗涅夫斯基革命诗歌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塔杜施·鲁热维奇（1921—）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上人情淡薄，他希望人们克服自私，增强团结。安娜·卡明斯卡（1920—）的诗以家庭生活为题材，她认为社会上充满了矛盾，只有在家庭里才能找到温馨和和谐。斯坦尼斯瓦夫·格罗霍维亚克的诗描绘了一个肮脏和下流的世界，有讽刺意味。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的诗反映了人在世界上的孤独。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因而不能达到相互理解，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也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可克服，他对他所处的不幸无力抵抗。兹比格涅夫·赫尔贝尔特（1924—）的诗揭露了现实社会的冷酷，表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

1956年以后的戏剧形式多样，影响较大的剧作家有斯瓦沃米尔·莫罗热克（1930—）。他是波兰战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剧作通过一些荒诞可笑的情节，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虚假、荒谬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有的剧作富于政治色彩，其中以《探戈舞》最著名。剧本写几代人都在为更新规矩礼性而努力，但最年轻的一代又认为这种努力已经够了，他们要求获得一个安稳的局面，结果他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只有

那些讲究实际利益的人才获得了成功。鲁热维奇除创作诗歌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卡片集》（1961）的形式独特，剧中主人公在他的亲属和朋友看来，既是个孩子，又是个成年人，既是歌剧院老板，又是企业家，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代表了一代人的经历。《见证人——我们的小稳定》（1962）写一些人由于追求物质享受，忘了别人的痛苦。《干净夫妻》（1975）意在揭示夫妻性爱的意义，可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却表现得十分怪异和荒诞。

（张振辉）

捷克文学

捷克是欧洲的一个内陆国家，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自公元九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文学起直至今日，她孕育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诗人、文化名人，像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浪漫派诗人马哈、女作家聂姆曹娃、戏剧家狄尔、诗人扬·聂鲁达以及历史小说家伊拉塞克等人的作品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作家和诗人，像沃尔凯尔、诺伊曼、玛耶罗娃、奥勃拉赫特等，是捷克第一共和国时期文坛上的主力军。特别是捷克表现主义戏剧的创始人恰佩克、《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和反法西斯的英雄伏契克等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塞弗尔特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昆德拉、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剧作家哈维尔等都是当今捷克著名的文人。他们中的有些作品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今天还继续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

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民族，他们的祖先生活在现今捷克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捷克国的形成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九世纪中叶出现的大摩拉维亚国，是最古老的捷克人的国家。

捷克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始于九世纪。大摩拉维亚国君主拉斯蒂斯拉夫从拜占庭请来了两位传教士康·基里尔和麦托迪两兄弟，他们创造了古斯拉夫文字，是捷克九至十一世纪的书面语言。此时，除这两位传教士翻译的《圣经》和一些祷文外，还出现了许多用古斯拉夫文写的传说故事和宗教赞美诗，如《主啊，怜悯我们吧！》

十世纪以后，捷克同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发生多次战争，在胜败无常的过程中，德意志封建主常常迫使捷克处于帝国藩属的地位，从而使西方拉丁文化随之渗入捷克境内，形成拉丁文化和古斯拉夫文化并存的局面。公元十一世纪，拉丁文化占统治地位。在拉丁文化中，除记述地方圣哲的传说故事外，还出现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拉丁文作品，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为科斯马斯的《捷克编年史》。该书叙述了自原始神话时代一直到作者（1045—1125）逝世那年为止的全部捷克历史。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叙述的历史形象生动，语言恢谐，是捷克古代较杰出的一部作品。

十二世纪以后，捷克文逐渐成为书面语言，开始出现用捷克文写的诗歌，如《圣瓦茨拉夫，捷克大公啊！》。这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颂歌，曾一度成为国歌。

十三世纪初，即普热米斯王朝统治末期，捷克社会进入封建主义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封建主大量向捷克移民，他们在捷克国内形成一个德国教俗封建主和城市贵族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同日益日耳曼化的普热米斯宫廷及上层贵族相勾结，剥削和压迫捷克人民，从而加深了捷克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时在文坛上则有一些下层贵族大力倡导用捷克文写作，热情讴歌贵族的骑士精神，以表达他们对德国教俗封建主的憎恨和对本民族的热爱。捷克骑士文学的代表作是《亚历山大大帝》和《达利米尔编年史》等。前者是捷克最古老的世俗叙事诗，以中世纪时期在欧、亚、非地区广为流传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为题材，歌颂他的骑士精神、显赫战功及其治国政见，想以此谏劝捷克王室振兴祖国。后者属于韵文体的编年史，记述从捷克始祖至十四世纪初的全部历史。

十四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卢森堡王朝约翰之子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346—1376），捷克经济与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查理一世（帝号为“查理四世”）实现了历代捷克国王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梦想。帝国朝廷所在地布拉格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是当时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查理皇帝于1347年在布拉格创办了查理大学，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十四世纪下半叶，捷克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接触更加频繁，邻近各国纷纷派学生来查理大学留学，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卢森堡王朝时代倾向于法国文化所致。

查理四世时期，捷克文坛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学开始描写普通世

俗人民的生活，并揭露封建社会的矛盾，这就促成捷克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一时期的捷克诗歌以下层人民创作的抒情诗和讽刺诗最为突出，如讽刺诗集《赫拉德茨手稿》反映了十四世纪捷克的市民生活，暴露了中世纪贵族、僧侣们的罪恶。这一时期出现了捷克世俗剧，其中较著名的是闹剧《卖油膏的人》，它对中世纪庸医的欺骗行为进行辛辣讽刺的同时，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败，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一时期的散文文学，以一些下层传教士写的哲学论著较为突出。其中杰出的代表是传教士什季特尼（1335—1400），他的《基督教日常问题六篇》论述了中世纪社会和伦理问题，批评了上层贵族的一些恶习。

查理四世时期，捷克封建社会虽然颇为繁荣昌盛，文学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查理四世本人及其整个王室的挥霍无度，上层贵族和僧侣的贪婪腐化，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深化，捷克进步文学面临新的社会考验。

2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中叶，捷克历史上爆发了波澜壮阔的“胡斯运动”。自十三世纪以来，德国封建主把持了捷克王国的一切大权，使其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但社会阶级对立日益加剧。由于教会权力的无所不在，更由于世俗和宗教的上层剥削阶级大多数为德国显贵，这就使社会压迫、宗教压迫和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了。因此，捷克人民反对社会压迫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性质。从十四世纪后期开始，捷克人民掀起了反对教会的运动。到十五世纪，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和爱国者扬·胡斯（1371—1415），他出身贫苦。青年时代，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进入查理大学攻读哲学，后留校任教，不久升任校长。他深受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没收教会的财产。1402年，胡斯在布拉格伯利恒教堂任传教士，宣传宗教改革，揭露教会上层和德国大贵族的罪恶，深得广大人民和捷克中产阶级的拥护，也引起教会上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禁止胡斯传教，并以开除教籍等手段来威胁他。1414年，皇帝齐格蒙德将胡斯骗去参加康斯坦茨会议，并强迫他放弃自己的学说，遭到胡斯拒绝。于是，教廷以异端的罪名对胡斯处以火刑。1415年7月6日，胡斯在康斯坦茨广场被活活烧死。

胡斯一生用拉丁文和捷克文写了许多论著，它们不仅是重要的政治论著，而且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在捷克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如《论教会》、《信仰、十诫和主祷文的释义》、《论神职的买卖》、《布道录》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宗教生活中正确的道德原则，深刻的批判了当时教会的罪恶，洋溢着他对捷克民族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胡斯用拉丁文写的《论捷克语正字法》一书中所阐述的新的正字法和基本原则今天仍在使用。

教廷处死胡斯之后，布拉格人民举行了多次集会表示抗议。1419年布拉格市民起义，全国各地的农民组织暴动。在胡斯改革的旗帜下，掀起了震撼全欧的“胡斯战争”。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人民大众创作了许多革命的诗歌，其中著名的诗集有：《伊斯特普尼采圣歌集》、《布丁辛纳手稿》和

《无上光荣的捷克皇冠之歌》等。

1434年5月30日，胡斯军左翼在利潘尼战役中遭到失败，胡斯战争至此结束。

胡斯革命运动在整个捷克社会生活中影响深远，成为捷克人民民主斗争的起点、人民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在黑暗的封建主义统治下，捷克人民一代又一代地继承胡斯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精神，采取各种斗争手段反对封建主义。当时在捷克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思想家和作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彼得·赫尔奇茨基（1390—1460），他用捷克文写的著作，尖锐地谴责了腐败的封建制度，反对把社会分为教士、骑士和农奴三个等级，主张废除等级制，反对劳役，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号召进行“心灵上的斗争”。他的代表作是《真诚信仰之网》。赫尔奇茨基的信徒们于1457年组织了一个“捷克兄弟会”。该组织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积极斗争，宣扬以精神上实现自我完善。

3

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初，捷克封建社会进入重新巩固时期。1471至1526年，波兰的雅盖隆王朝统治着捷克。1526年，由于捷克国王鲁德维克在土耳其战争中阵亡，捷克贵族选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斐迪南一世为国王。从这一年起至1918年近四个世纪内，捷克一直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

十七世纪初，捷克历史处于新的转折时期。1618年5月23日，捷克贵族利用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继承的危机，组织了临时政府，并在布拉格举行暴动。1620年11月8日布拉格附近的白山一战中，临时政府军被王朝军击败而投降。但这一战役，逾越捷克国境，导致了欧洲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捷克国家从此丧失独立而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份，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转入德国人手中，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哈布斯堡王朝立德语为国语，焚毁捷克书籍，强迫捷克居民改奉天主教，许多市民和作家由于不愿忍受外族侵略和压迫而逃亡国外，捷克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民族复兴。这长达一百多年的时期被称为捷克的“黑暗时代”。在这时期，捷克文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国内文学发展走向衰落，逃亡国外的文学家怀着远离祖国的痛苦，坚持继承祖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写下了许多怀念祖国和悲叹民族不幸的作品。其中最杰出的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杨·阿莫斯·考门斯基（或夸美纽斯）（1592—1670），他出身于“捷克兄弟会”成员之家。1627年流亡国外，先后在瑞典、东普鲁士和波兰等地居住和教书。晚年移居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逝世。他一生有二百五十多种著述。他的主要的文学著作是《世界的迷宫和心灵的天国》（1631）。书中深刻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黑暗的社会制度，看到了金钱的罪恶，也看到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但他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却乞求上帝，走向神权主义，这反映了他受兄弟会宗教思想的影响，该书译成了世界许多文字，在捷克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4

从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捷克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同德意志民族封建主义斗争，便利用广大人民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反抗，掀起了一场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争取民族解放和经济文化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波澜壮阔的捷克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个时期被称为“捷克民族复兴”时期。

在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争取使用捷克语言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努力提高捷克语言的社会地位方面的杰出人物是约·多布罗夫斯基和约·荣格曼。随着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深入开展，捷克诗歌、戏剧和小说也空前繁荣起来，新作家的新作品不断涌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反对外族奴役和压迫的斗争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主题。

诗歌：

在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初期，诗歌创作最为活跃，这一时期的捷克诗歌具有启蒙主义的特色，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竭力想证明捷克民族没有消亡，证明捷克历史的光荣悠久和捷克语言的优美。瓦·汤姆编辑的两卷集《韵律诗》以及安·雅·普赫马耶尔的《诗歌选集》为捷克新诗创作奠定了基础。瓦·汉卡和约·林达两位爱国诗人认为有必要弥补捷克文学史上英雄史诗的不足，便大胆伪造了诗集《王室手稿》和《绿山手稿》。

捷克诗歌的真正创造者是科拉尔、切拉科夫斯基、爱尔本；特别是积极浪漫派诗人马哈。

扬·科拉尔（1793—1852）出身于一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和神学。同时对斯拉夫民族语言和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他最早的诗作是《抒情诗集》。他的代表作《斯拉娃的女儿》（1832）共收入诗人的六百多首爱情诗和爱国诗。诗中号召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弗·拉·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他在深入研究民歌的基础上，刻苦创作，于1829和1839年分别出版了他的著名诗集《俄罗斯歌曲的回声》和《捷克歌曲的回声》。

卡·亚·爱尔本（1811—1870）出生于农村一个贫苦手艺人家庭。毕业于查理大学法律系，曾参加爱国活动。1848年革命失败后，埋头研究民间文学。他根据民间传说以歌谣形式写成的诗集《花束集》（1853）是描写捷克人民的习俗风尚，歌颂祖国的锦绣河山，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优美流畅的语言和富有音乐性的节奏，《花束集》成为捷克诗歌的典范。

卡·希·马哈（1810—1836）生于布拉格一小商之家。自幼喜读各种神话故事和漫游各地，马哈的作品大都充满浪漫主义激情，表现出对封建阶级的道德的反抗，对民族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求。他的代表作抒情叙事长诗《五月》（1836）由四组长诗和两组插曲组成。主人公威勒姆是个感情炽烈的人，被家庭逐出，成了一伙强盗的首领。他杀死了诱奸他所热恋的姑娘的人，后来发现这个被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天主教判他死罪。作者提出威勒姆成为强盗究竟是谁的罪过的问题。《五月》不仅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造诣也很高，他在描写五月之夜的自然景色时，充满哲理思想，以大自然美景反衬出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

马哈的诗歌语言通俗，富于音乐性，如：

那是五月初一，深沉的黄昏，
黄昏的五月——爱恋的时辰。

斑鸠加入了求爱的合唱，在那霉湿的松树丛林。

马哈的《五月》被誉为捷克“诗歌中的珍珠”。

戏剧：

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初期，捷克戏剧的任务旨在唤起民族觉悟，增强民族自豪感，为争取上演捷克戏剧而斗争。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瓦·克利茨佩拉（1792—1859）。他写了不少喜剧，其代表作是《奇异的帽子》。到了四十年代，戏剧则进一步反映当时捷克社会的阶级矛盾，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用斗争去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这一特点在狄尔的戏剧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捷克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约·卡·狄尔（1808—1856）出生于库特纳山城的一贫苦的乐师和裁缝之家，还在中学时就开始对戏剧和文学发生了兴趣。在查理大学学哲学。大学未毕业就参加了巡回演出剧团。狄尔所创作的二十多个剧本，可分三大类：历史剧、现实剧和童话剧。历史剧主要有《库特纳山的矿工》、《扬·胡斯》；现实生活剧有《菲德洛瓦奇卡》、《纵火犯的女儿》，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尖锐的阶级矛盾。狄尔的爱国童话剧有《伊日的幻梦》、《林中少女》和最著名的《斯特拉科尼采的风笛手》。《斯》剧是通过为了发财而远离祖国的年轻风笛手什万达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在捷克农村所引起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比，指出追逐金钱会使人们的道德败坏。该剧一直作为优秀的传统剧目在国内外广为上演。

小说：

从四十年代起，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聂姆曹娃。

鲍·聂姆曹娃（1820—1862）是捷克杰出的女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她生于维也纳。父亲是日耳曼人，在捷克一公爵庄园里当马夫。母亲是捷克人，是庄园的女管家。聂姆曹娃仅上过小学和缝纫训练班，完全靠自己刻苦自修，获得丰富的知识。她一生曾大量收集民间传说。写作童话、游记和小说，作品之多，达数十种。其中有《民族传奇和故事集》共七卷、《斯洛伐克童话和故事集》共十卷；中短篇小说集如《卡尔拉》、《庄园内外》、《野姑娘芭拉》等。她在创作上的最大成就是她在18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外祖母》。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外祖母这个普通捷克农村妇女的光辉形象，真实地描绘了捷克农村优美如画的风光，介绍了捷克民间传说、故事、歌谣以及风俗人情，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捷克“农村生活的画卷”。作者在刻画小说的中心人物外祖母时，并非想给曾经给自己母爱的外祖母写传记，更没有局限于真人真事的描写，而是用捷克人民艰苦的生活经历和聪颖的智慧丰富外祖母的形象，把她塑造成一位灵巧聪慧，勤劳正直，风趣乐观，爱自然、爱人民，同情被压迫者的具有劳动人民各种优良品德的光辉典型——一个人人都喜爱的善良的外婆。聂姆曹娃在艺术上的造诣也很高。她观察生活细微，又能高度概括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叙事和描写细腻逼真。她的《外祖母》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1848年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失败后，在奥地利建立了残酷的“巴哈专制政体”。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消灭捷克人民中的自由思想。尽管恢复了专

制制度，但它显然已经不能阻止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增长和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不满，致使巴哈专制统治于 1859 年垮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捷克资产阶级慑于日益高涨的工人斗争，逐渐投靠 1867 年新建立的“奥匈帝国”统治集团，致使捷克民族内部矛盾加深。1878 年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从此，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进步力量成为推动捷克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这一时期的捷克文学随着政治的经济的发展、变化而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现实主义文学日益发展。反映外族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与腐朽，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号召人民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是这时期捷克文学的重要思想内容。聂鲁达与哈列克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两个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

扬·聂鲁达（1834—1891）生于布拉格。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在布拉格小城区开杂货铺。聂鲁达的童年常因家境贫寒而受到纨绔子弟的嘲笑。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社会不平等的印象。1848 年欧洲革命所宣传的“人类平等”和“自由”的口号对他影响较大。1853 年，他经多方努力进入查理大学学哲学和法律。但因家境困难，不久又中途辍学。此后他一边当教师，一边任报刊编辑。长期的新闻工作扩大了他的眼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作品可分为杂文、诗歌和小说三大部分。杂文有两千多篇。这些内容丰富、笔调幽默风趣、别具一格的杂文对后世文学家有很大影响。

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歌，主要都收在六本诗集中，即《墓地之花》、《诗册》、《宇宙之歌》、《故事诗与浪漫曲》和《平凡的主题》以及《礼拜五之歌》。这些诗作题材广泛，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礼拜五之歌》政治性较强。这部诗集中的一些名诗如《爱》、《再前进》等，在捷克人民反对黑暗统治的长期斗争中经常被引用和朗诵。

聂鲁达还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1878）。内容都是反映布拉格小城区的生活。作者一方面对小市民的狭隘、愚昧、庸俗、顽固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同时对贫苦劳动人民寄予深沉的同情和爱。

维·哈列克（1835—1874）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作家。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在乡村度过。他在查理大学学哲学时，曾广泛阅读捷克及世界名著。并给学生杂志写稿。他的主要诗集有《黄昏曲》、《大自然中》、《民间故事诗和浪漫曲》以及《我们村里的童话》。他除写诗外，还写了一些反映阶级分化问题的短篇小说，如《退休老人》和《荒山下》。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民族解放的乐观主义情绪，紧密地联系着时代的进步思想，因此受到人民的热爱。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宰了八十至九十代的文坛，诗歌界的代表是捷赫、斯拉德克和伏尔赫利茨基；小说界则首推伊拉塞克。

斯·捷赫（1846—1908）是诗人。六十年代，捷赫在查理大学攻读法律时，就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创作有诗歌和小说。其诗歌大体可分为历史题材：《波罗的海边上的胡斯信徒们》、《日什卡》、《西蒙山上的罗哈奇》以及《米哈洛维茨的瓦茨拉夫》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莱塞金斯基的铁匠》、《收割者》等诗集。他的代表作是抒情叙事诗集《奴隶之歌》（1894），长诗采用寓言的形式，借东方奴隶主拿

着鞭子驱赶一群奴隶在古老森林中艰苦服劳役的情景，讽喻和控诉反动统治者残酷压迫捷克人民的罪行。他的诗作文笔清新，幽默风趣，犀利辛辣，洋溢着强烈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捷克社会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

约·瓦·斯拉德克（1845—1912）一生写了许多表现捷克民族勇敢精神的诗作。最早的诗集《诗书》、《海上的火花》，记录了他在美国的见闻和作者的心情，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在《光明的足迹》、《在天堂门口》、《来自生活》和《太阳与阴影》等诗集中，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坚信它所创造的新社会定能给捷克民族带来幸福和光明。他的儿童诗集《金色的五月》、《云雀之歌》以及《钟与小铃铛》等，这些语言生动形象，富有音乐性的儿童诗，为许多小读者所喜爱。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三十二部剧作。

雅·伏尔赫利茨基（1853—1912）一生写了八十多部作品，包括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文艺评论以及译著，主要诗集有《史诗片断》和《农民叙事诗》。他的喜剧《查理城堡之夜》（1884）一直作为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

阿·伊拉塞克（1851—1930）捷克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面包师家庭。他在查理大学学历史。他选择了捷克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时期：“胡斯革命运动”、“黑暗时代”和“民族复兴运动”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

关于胡斯运动，他写了小说三部曲：《在激流中》、《抗击众敌》、《兄弟军》和未完成的《胡斯派国王》；戏剧三部曲《扬·胡斯》、《扬·日什卡》和《扬·罗哈奇》。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揭示了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的初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

关于黑暗时代，他写了长篇历史小说《黑暗时代》、《峭壁》、《狗头军》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十七世纪捷克人民在“白山战役”以后处在哈布斯堡王朝残酷统治下的苦难生活。

关于民族复兴运动，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弗·勒·维克》（五卷）和《在我们这里》（四卷）。它们展现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整个过程。

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描写1848年革命年代的中篇小说《哲学生纪事》以及根据古老的编年史和民间传说写的一部诗意盎然的小小说《捷克古代传说》。他还写有剧本《伏依娜尔卡》、《父亲》以及神话剧《灯笼》等。

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经济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的时期。捷克资产阶级投靠维也纳政府已成为一种反动势力、它压迫工人阶级、引起人民的不满、在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斗争日趋复杂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从最初的激进主义者变成了机会主义者，以致最后堕落为奥匈帝国的帮凶。在此情况下，一些作家，如诺伊曼、哈谢克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文学中各种流派纷纷出现。不过这些流派在捷克文学中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也非当时的文坛的主流，而被称为“被奴役人民的歌手”的贝兹鲁奇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捷克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卡·马·恰佩克——霍特（1860—1927）。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受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涡轮机》（1916）。作品描写了社会地位十分悬殊的两个家庭的变迁。作者在作品中片面强调生活中的消极面，强调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一面，因而有些描写显得庸俗、琐屑。

捷克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布热齐纳和索瓦两位诗人。这一流派的主要特征是无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文学艺术离开社会职责。

奥·布热齐纳（1868—1929）幼年失去双亲，性情孤僻，一直抱独身主义，在农村教书多年。他十分推崇法国的波德莱尔。他在《神秘的远方》、《西方的黎明》、《从两极吹来的风》、《神殿的建筑师们》以及《双手》等五部艺术性较强的诗集中，表达了他从最初的忧郁的情况发展到拥抱整个人类的博爱主义。他的诗形式完美，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但过多的象征符号和“意象”也使他的诗歌晦涩难懂。

安·索瓦（1864—1928）出身于教师家庭。曾任过图书馆员，后任馆长。他少言寡语。在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常有一种受压抑、受人践踏的感觉，因而他反抗那个可憎的社会。最初的诗集《我的家乡》、《故乡之歌》，写得很抒情，很成功，描绘了典型的捷克南部风光，表达了诗人诚挚的爱国主义热情。诗集《同情与反抗》、《被蹂碎的心灵》以及《暴怒后的哀愁》中，诗人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强调人的尊严。他的诗艺术造诣较高，表现力丰富，但神秘、抽象，其语言也和布热齐纳的一样，较为晦涩难懂。

捷克颓废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卡·赫拉瓦切克（1874—1898）。他深受法国颓废派文学的影响。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在一个典型的工人区长大，。由于生活极端困难，还不到二十四岁就离开了人间。他的几部诗集，如《迟到的早晨》以及《复仇的歌》，表现出诗人的一种追求。但这种渴望却无明确的内容，多是些个人彷徨、苦闷情绪的反映。从艺术形式看，他的诗旋律优美音乐性强。

还有几位诗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如马哈尔、迪克、托曼以及什拉麦克，他们都是二十世纪初捷克诗坛上的活跃人物。

约·斯·马哈尔（1864—1942）深受德国尼采的影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主要的诗集有《信仰》、《来自维也纳的哀歌》、《各各他》、《这儿可能盛开玫瑰花》和《抹大拉的女人》等。他最成功的作品是大型组诗《世纪的良心》。诗中描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他描绘的历史

画面有许多都是不真实和不典型的。诗作中还流露出一种颓废没落的情绪。

维·迪克（1877—1931）是位记者和诗人。主要诗集有《轻快的和沉重的步履》、《或许》、《窗子》、《最后的一年》等。他的《祖国之声》一诗，是捷克爱国主义诗歌中最美、最赤诚的一篇。诗中指出一个人的命运是与他的故乡、他的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祖国对他说：

你若离开我——我不会死亡，

你若离开我——你将死去。

卡·托曼（1877—1946）是位抒情诗人。他早期的诗作大多抒发个人的情感和对女人、对家乡的爱。他的诗集《月历》是捷克最佳抒情诗集之一。诗人的忧虑、信念、痛苦，是与他祖国人民的痛苦、希望息息相通的。

弗·什拉麦克（1877—1952）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早期诗集《生活虽苦，但我毕竟热爱它呀》、《蓝的和红的》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反抗旧社会，矛头直指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的。他的诗集《堰堤》（1916）则响起了对生活、女性，大自然的一种赞美之声。他在法西斯占领时期写下的诗集《伤痕、玫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献给青年一代的抒情诗体的小说《银风》（1910）以及剧本《夏天》、《河上 明月》，已成为捷克宝贵的文学遗产。

彼得·贝兹鲁奇（1867—1958），生于西里西亚地区是奥帕瓦城。父亲是当地的中学教员、著名的爱国者。1885年贝兹鲁奇进查理大学语言系学习，为生活所迫，停学回布尔诺任邮政员，直到1928年退休。他的诗为数不多，但内容丰富，革命性强，有力地反映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社会压迫的革命精神，从而在捷克现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唯一的、也是使他闻名于世的诗集《西里西亚之歌》（1909）描写了奥斯特拉瓦矿工和贝斯基迪山区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苦难生活。他为矿工和农民们的悲惨生活鸣不平，写出了这些世代被压迫、受剥削的人对地主老爷们的强烈憎恨，喊出要反抗、要清算的声音。因此他被称为“捷克革命诗歌的先驱。”诗集中的《玛丽奇卡·马格冬诺娃》、《矿工》等诗，在捷克是家喻户晓、经常被朗读的名诗。在艺术上，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易懂。其风格与上述那些流派迥然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称第一共和国）于1918年10月28日宣告成立。可是在新诞生的国家里政权依然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逐渐高涨。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1921年至1923、1929至1934年间出现的两次经济危机，使捷克遭受损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矛盾重重。从1934年起，国内政治开始走向法西斯化，资产阶级法西斯政党一个个相继诞生，集中力量以对付共产党。捷共此时为了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领导一切进步力量，对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不同形式的坚决斗争。

在这时期，西欧哲学思想和各种文学流派，如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对捷克文坛有很大影响，一部分资产阶级作家鼓吹文学脱离政治，不参与国家大事，他们的创作热衷于抒发个人孤独的感受，局限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描写中，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一部分革命作家，却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像奥勃拉赫特、萨波托茨基等都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如诗人诺伊曼、沃尔凯尔、霍拉等，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了革命

的美好前景；玛耶罗娃、万丘拉等党员作家塑造了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而尼耶德利、沃尔凯尔的文艺批评在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各种文艺现象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旋覆花社”为代表的捷克现代派诗歌开始兴起。现实主义作家哈谢克、万丘拉的散文和恰佩克表现主义的戏剧都从各个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反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有这一切，使二十年代的捷克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三十年代，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捷克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得到加强。这时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瓦茨拉维克、伏契克等在文艺批评中坚持了党性和阶级性的原则。玛耶罗娃、普伊曼诺娃等作家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奈兹瓦尔、哈拉斯、霍拉等诗人抛弃了脱离现实生活、内容空虚、追求奇特形式的现代派的创作方法，真实而典型地再现了生活。恰佩克等作家坚决走上了反法西斯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学在团结现实主义作家的基础上，扩大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1939年至1945年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1938年10月，德、意、英、法四国签订了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第二年春天，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在这里成立斯洛伐克国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面对祖国灭亡、人民备受德国法西斯的奴役的局面，人民奋起反抗。

苏德战争爆发后，捷克由于发生怠工事件，激怒了占领者，他们派来了亨德里希，名为保护捷克，实际上在这里实行白色恐怖。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派人暗杀了亨德里希后，占领者进行报复，将离布拉格不远的利季泽村的男人和少年全部杀害，将妇女和小孩送进了集中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利季泽事件”。这次事件使捷共地下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许多作家如伏契克、万丘拉和瓦茨拉维克等惨遭杀害。解放前夕，由于个别法西斯的顽固堡垒拒不缴械，布拉格人民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扬·德尔达在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中歌颂了这一光辉的战斗。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并于5月9日成立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诗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诗人，如诺伊曼、沃尔凯尔、霍拉、奈兹瓦尔等，他们早期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西欧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但在进入二十、三十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的创作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尼耶德利所说：“通过现代派艺术的荆棘丛而奋力前进，向着十分有价值的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前进。”捷克无产阶级诗歌从此诞生。

斯·科·诺伊曼（1875—1947）是捷克无产阶级诗歌的主要代表。他生于布拉格一律师、议员的家庭。他曾因积极参加反对当局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曾一度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征入伍。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加入了共产党，创作了大量的革命诗歌。

他早期的诗作常以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个人的反抗情绪，这在诗集《青春与反抗集》、《捷克之歌》中有突出的表现。《森林、河流、山坡集》（1914），是诗人世界观、艺术观转变的标志。他歌颂大自然，对宇宙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

《新歌集》（1918）给捷克诗歌带来了创新的精神，它歌颂现代物质文明，第一次把物质文明看作美的形象。

十月革命使诺伊曼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艺术上更接近无产阶级诗歌的要求。这在《生活万岁》、《红色之歌》等书中有明显的表现。

伊·沃尔凯尔（1900—1924）1919年进查理大学学法律，1921年入党，并成为当时青年一代诗人中的核心人物。他是“宾至如归”、“旋覆花社”这两个最大的文学团体的成员，后因观点不同退出。接着便在他的教师尼耶德利文艺学教授主办的《沸点》杂志上发表了《无产阶级的艺术》、《日常的艺术或是节日的艺术》以及《自由的捍卫者们》等论文，提出了创造新的革命文艺的纲领。

他早期的诗歌带有伤感情调，但其主题思想是健康的。在《宾至如归》中表现了作者从农村来到布拉格，以一个年轻人的纯洁和天真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他要施爱于全世界，在爱中寻求欢乐，爱可以拯救人类的良知。

《分娩》则是诗人同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作痛苦的、然而却是勇敢的斗争的见证。他对自己人人皆兄弟的博爱思想作了无情的批判。

他的诗歌开拓了新的主题，在艺术上也别具一格，丰富了捷克叙事诗的艺术形式。

约·霍拉（1891—1945）出身贫苦家庭。他在最初发表的《工作日》、《心与世界的呐喊》以及《暴风雨的春天》等诗集中，真实地描绘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喊出了要革命、要斗争的充满时代的精神的口号。由于资产阶级暂时的强大，霍拉的革命信念曾发生动摇，这在《意大利》、《风之弦》等诗集中有明显的表现。这些作品不仅情绪低沉、悲观，语言也晦涩难懂，可是当德国法西斯威胁他的祖国时，他又立即投入战斗。

维·奈兹瓦尔（1900—1958）出身于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在中学时就写作诗歌，并能歌善画才华出众。1920年他去查理大学学哲学，同时积极参加首都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很快就成了“旋覆花社”的主要成员和年轻一代诗人的领袖人物。1924年入党。他早期的诗集《令人叫绝的魔法师》和《哑剧》曾受兰波和阿波利奈尔的影响。诗人认为“幻觉和暧昧的主观世界构成的诗‘真实’”。由于他当时被认为表达了现代人的感情，引起了诗坛极大的注意，从而成了捷克“唯美主义”的代表。三十年代，他成了捷克超现实主义诗歌小组的领导人。可是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实践又使他写出了一此反映时代面貌的优秀诗歌，如《爱迪生》、反映了三十年代严重经济危机的诗集《玻璃大衣》、《回程票》、描写捷克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希望的母亲》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又发表了长诗《斯大林》和《和平歌》等。这些作品正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拉·什托尔（1902—1981）所说，“是健康的，原因是他的创作渊源于历史的乐观主义，渊源于对人民、对祖国、对苏联的爱和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正确理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捷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进步作家对探讨社会问题普遍发生了兴趣，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是讽刺倾向的加强。这种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哈谢克。哈谢克继承了捷克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以讽刺的笔调，无情地揭露了奥匈帝国统治下捷克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质，同时塑造了帅克这个著名的文学典型，使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期另一位重要作家是恰佩克。恰佩克运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充分反映了“现代人的困惑”，有力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深刻地揭露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他是当时在艺术上别具一格的小说家、剧作家。

雅·哈谢克（1883—1923）出身在布拉格一个穷苦教员的家庭。童年生活十分痛苦，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同母亲和弟妹靠亲友接济过活。他曾参加反抗当局的游行示威，因而屡遭拘留和逮捕。商专毕业后在银行任职，他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被派赴俄国作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期，哈谢克毅然同捷克军团决裂投身到革命方面来，参加了红军，不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红军中从事宣传工作。1920年他返回布拉格，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死于黎普尼采镇。

哈谢克一生写了一千多篇短篇小说、政论和小品文，还写了剧本和三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主要是揭露社会的腐朽黑暗，这在他优秀的短篇小说，如，《女仆安娜的纪念日》、《得救》、《猪崽克萨威尔外传》等中都有所表现。

他在创作上的最大成就，是他在1921—1923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在世界大战中的遭遇》中译为《好兵帅克》，小说虽仅以它的主人公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其主要情节，却反映了这一时期许多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如奥匈帝国统治者的残暴专横，教会的贪婪腐朽，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等。作者对帅克这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普通捷克士兵的典型形象的刻画是很成功的。帅克不是英雄，但在他的身上生动地表现了捷克人民的智慧及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和自发的反抗。他常利用民间的谚语、笑话，接过上司的口号，一遇可乘之机就巧妙地和统治者作斗争。

由于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伏契克曾指出：“《好兵帅克》将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历史教师可以用它来说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最后支柱——资产阶级军队的腐朽情况。”这部讽刺作品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学，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卡·恰佩克（1890—1938），生于捷克北部马莱·斯瓦托略夫策城。父亲是位乡村医生，母亲是个有文化素养的人，哥哥约瑟夫是位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的画家兼作家，后被德国法西斯杀害。恰佩克曾在查理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任新闻记者，后从事文学创作。最早他同哥哥一起进入文坛，合写过一些散文，如《明亮的深潭》、《克拉科诺什的花园》和剧本《昆虫生活》（1921）等。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有力地抨击了社会时弊。

二十年代初，欧洲革命风起云涌。恰佩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耳闻目睹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平，他十分不满，可是他的世界观中的相对主义哲学思想，以及他和捷克上层社会政客们的繁频交往，使他对现存制度抱有幻想，害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他这时期发表的作品，如科学幻想剧本《R、U、R》（即《罗素姆万能机器人》1920，中译为《万能机器人》）、《长生诀》和科幻小说《专制工厂》、《炸药》（中译为《原子狂想》）等，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另一方面却又基调低沉，反映了他找不到出

路的苦闷心情。在《万能机器人》中，就流露出作者的悲观思想。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整个人类世界的毁灭。

由于这批科学幻想作品的连续发表，恰佩克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赞赏。他所创造的“机器人”（“Robot”从捷克文“Robota”演变而来，此词原意为“劳役”、“苦工”）一词，也被欧洲各国语言吸收，成了一个世界通用的名词。恰佩克关于人类掌握原子能的预言和制造机器人的幻想，今天已成现实，这证明他的作品的构思虽富幻想的性质，却是有科学根据的。

三十年代，由于德国法西斯日益猖獗，他的祖国的安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恰佩克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从此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这时期他写了四部作品：长篇小说《鲛鱼之乱》、《第一救生队》，剧本《白色病》、《母亲》。除《第一救生队》是歌颂工人阶级临危不惧、团结友爱、拯救矿工伤员生命的英雄行为之外，其他作品都是贯穿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精神。《鲛鱼之乱》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幻想小说。描写资本家企图利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机灵的鲛鱼（蝶螈）来为他们谋取利润，并借此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可是鲛鱼被武装起来后，却调过头来反对人类，要消灭人类。《白色病》则形象地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和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有效工具，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源。在《母亲》中，作者号召人们以实际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小说主人公母亲在祖国临危时，毅然把枪交给了自己仅存的小儿子，勉励他勇敢杀敌。

在创作手法上，恰佩克善于通过虚构各种富有戏剧性、引人入胜的情节，形象而深刻地揭露现实矛盾。

恰佩克如伏契克所高度评价的，是“捷克文学中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作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许多党员作家如奥勃拉赫特、玛耶罗娃的创作，除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外，还对捷克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伊万·奥勃拉赫特（1882—1952）生长在捷克的工业城市基米莱。父亲是律师和作家。奥勃拉赫特长期从事共产党的报刊编辑工作。他在查理大学学哲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他早期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集《邪恶的愤世嫉俗者》和长篇小说《最黑暗的牢狱》、《叶塞尼奕演员的奇怪友谊》等，多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人感爱，对造成主人公的不幸命运的社会原因很少触及。

1920年，他去苏联参观访问，参加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多次聆听列宁的教导，回国后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这些经历给他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素材，使他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期主要作品有《今日俄罗斯印象》、《奥地利及共和国趣事九则》等。他的代表作《无产者安娜》（1928）是捷克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描写一个贫苦出身的农村姑娘安娜的觉醒与成长。小说充分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捷克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真实刻画了社会各阶层、各党派一系列代表人物的形象。这部作品由于开拓了新的、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被认为是捷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之一。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小说《被遮蔽的镜子》，报告文学集《无名之地》和中短篇小说集《山谷中的戈列特》等。作家根据民间流传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写成的小说《侠盗尼占拉·舒海》，一直受到国内外好评。

玛·玛耶罗娃（1882—1967）出身工人家庭。三岁时丧父，后随母在一个矿工的继父家过活。小学毕业后，她去布达佩斯一亲戚家当佣人，靠刻苦自学和上夜校获得知识。二十年代，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成为捷克最早的党员之一。她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报刊的记者，还曾多次去过苏联，游历和访问过英、美、法、中国和非洲等地，后来她将她的旅途见闻写在许多游记里，深受读者欢迎。

玛耶罗娃对捷克文学的贡献是她反映了新的主题：描写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这在小说《贞洁》、《红花集》中有所反映。在《共和国广场》中，她抨击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在《最美丽的世界》中，她还进一步给捷克文学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女革命者的形象。

小说《汽笛》（1935）是她的代表作，是捷克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艺术表现。它围绕着矿工胡德茨一家祖孙三代的遭遇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克拉德诺矿工和冶金工人从个人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大罢工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捷克工人运动是怎样从萌芽状态发展起来的。长篇小说《矿工之歌》在情节上与《汽笛》相衔接，写的是一对矿工夫妇颠沛流离、备受苦难、最后沦为乞丐的悲惨命运。

玛耶罗娃的创作风格朴实，描写生动。她常运用口语、民间谚语以及俗语，赋予作品以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地方色彩。

4

尤·伏契克（1903—1943）出生在布拉格一个有艺术素养的工人家庭里。父亲是车工、业余歌唱家，叔父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1913年，他全家迁到比尔森，父亲在什科达工厂做工，因此伏契克在少年时代就同产业工人有了接触。他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参加了革命，刚满十八岁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1929年间，他进入查理大学文学系旁听尼耶德利教授的文艺课。长期从事党的报刊的编辑工作。他曾多次去苏联，写有《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和《在亲爱的国家里》等书，热情歌颂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积极参加1932年春捷克北部矿工的大罢工。1932年，伏契克应征入伍。1933年9月，他退役后，继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因揭露资产阶级政府的卖国政策遭逮捕。出狱后，便转入地下斗争，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1936年以后，在他祖国面临危亡的前夕，伏契克用笔作刀枪，无情地揭露国内外叛徒出卖捷克的行径。他的那些文章、传单、宣言，告人民书等，后来收在《我们爱自己的人民》一书中。1939年3月15日，捷克被德国占领，伏契克所任编辑的各种报刊杂志均被查封，他只好离开布拉格，来到农村，埋头于捷克民族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他的评论文章格调高昂，情思激越，有独特的风格，在捷克文学批评中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文学创作的先例。

由于叛徒出卖，伏契克于1942年4月24日不幸被捕。他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监禁了四百一十一天，面对种种酷刑，他却毫不畏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在牢房里，尽管他连遭刑讯，处境危难，时刻有可能被拉上绞刑架，他却得到了一个看守的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下了他最后的一部不朽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这部长篇艺术特写共分

八章，有的部分描述作者不幸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章节描述他濒临死亡痛苦，难友们如何救护；但更多的是写捷克共产党人以及爱国志士忠于革命、忠于祖国，不怕牺牲的高尚行为。该书处处都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作者对于人们的谆谆嘱咐：“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已经成为千百万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永远铭记的警言。

伏契克虽于1943年9月8日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但是，他那光辉的形象以及他的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九十多种文字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将与世长存。

在德国法西斯侵占时期，除伏契克外，曾经热衷于各种现代派的奈兹瓦尔、霍拉、塞弗尔特以及哈拉斯等诗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恰佩克的反法西斯的小说《鲑鱼之乱》、剧本《白色病》和《母亲》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奈兹瓦尔的诗集《希望的母亲》、《城外五分钟》，霍拉的诗集《故乡》和塞弗尔特的诗集《别了，春天》、《石桥》和哈拉斯的《洞开》、《希望的报废》等，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精神。无产阶级革命诗人诺伊曼不仅写诗号召人们起来斗争，而且亲自参加了地下工作。他在诗集《无底的年代》和《有毒的年代》中，提出了反对怯懦、反对消极、不投降、要斗争的口号。

这时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作家还有万丘拉、普伊曼诺娃、德尔达等。

弗·万丘拉（1891—1942）于二十年代登上文坛。他属于进步作家的行列，德国法西斯侵占时期，他因积极参加地下斗争而惨遭杀害。

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反对剥削制度，反对非正义战争。主要作品有小说《面包师扬·马尔胡尔》、《耕地与战场》、《最后审判》、《三条河》等。“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万丘拉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写了《捷克历史图画》（3卷），这是一部根据捷克历史上一些神话故事、传说、著名的历史事件写成的长篇小说。它的出版对正在与德国法西斯搏斗的捷克人民鼓舞很大。

玛·普伊曼诺娃（1893—1958）出身于布拉格一个法学教授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她早期的小说《翼下》，散文集《市郊公园里的故事》，小说《黑格尔大夫的女病人》等，大都描写她童年时代田园诗一般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二十年代初，在伏契克的影响下，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32年，曾随工人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这些活动使她的世界观有所转变，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7年，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十字路口的人们》问世，标志着她在政治和艺术上的成熟。随后她又发表第二部《玩火》（1946）和第三部《生与死的搏斗》（1952）。这三部作品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他们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斗争的情况。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普伊曼诺娃还写了几部诗集，如《小歌集》、《母亲的诗》、《拉斐尔及其附庸》、《欢乐与悲伤》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她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扬·德尔达（1915—1970）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在查理大学攻读哲学、斯拉夫古代文学和戏剧。任过记者和编辑。他一生勤于创作，著有长篇和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童话以及游记等。主要作品有小说《掌上的城》、

《彼得·谢德米哈斯旅行记》等。其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1946）和《美丽的托尔季查》（1952）。前者收入二一篇短篇小说，大都反映捷克人们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反对侵略者斗争的英雄事迹，其中如《更高原则》写得尤为出色。它描写一个普通的教员，平日表现得软弱无能，但面对法西斯恶魔却临危不惧；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持“更高原则”。

德尔达还参加过在纽伦堡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他写的《纽伦堡来信》（1946）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945年5月9日，捷克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通过布拉格人民起义获得了解放。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共产党随同红军，从莫斯科来到本国领土。这时，在英国的捷克流亡政府也迁回布拉格。由所有未背叛民族、未与纳粹分子合作的政党代表参加的政府，宣布了“科西采纲领”。这纲领的原则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银行和大工厂国有化。1948年2月，政府工作中出现了危机。于是共产党和革命工会集中全部力量夺了权。从而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权力，加速了社会主义的行程。1953年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相继逝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使捷克的政局不稳，最后演变成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干涉。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大批作家、诗人，如塞弗尔特、哈维尔、昆德拉、柯胡特等）遭镇压、关监狱、流亡国外。1989年冬天，布拉格发生了“天鹅绒革命”，以剧作家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派”夺取了共产党执政了四十年的政权。哈维尔当上了总统。1990年3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更国名为捷克共和国。

捷克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变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都得到了反映。

I

自1948年共产党掌权以来所出版的作品，可说大多使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许多作者继承了捷克民族文学伟大前辈的传统，特别是那些与工人阶级有着良好关系的老一辈作家的传统。此外，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从苏联作家那儿获得教益。当时绝大多数知名作家、诗人都站在新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边，又努力用自己的作品来巩固这一制度。他们竭力创造新的典型人物，并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新人物的性格特点。

但由于有些作家的贫乏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整个社会发展理解不深，使作品中的有些人物没有说服力，公式化、概念比、简单化比比皆是，未能正确反映出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此外，在捷克官方文学中也表现了所谓个人崇拜，过分强调个别人物的意义。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如作家雷扎奇、库普卡；特别是日哈、科扎克以及诗人斯卡拉、陶费尔等人的作品，对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仍然有很大影响。

博·日哈（1907—1987）出生于一庄园马车夫的家庭。1925年毕业于一师资培训所。在农村辗转各地教书。解放后任教育部在农村中的督学、作协书记、儿童文学出版社社长，大型儿童文学杂志《金色的五月》的主编等职。由于他对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曾多次获国家奖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主要作品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儿童文学，主要有《洪扎的旅行》、《儿童百科全书》等，由于这方面的成就，他曾获1980年度安徒生文学奖。第二类是农村小说，主要有小说《地面敞开了》、《两个春天》以及上下两卷的《老乡》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捷克农村生活以及不同类型的

农村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观点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有评论指出他的一些作品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其它还有历史小说三部曲：《跪在我的面前》、《等候国王》以及《仅仅剩下一把剑》。

扬·科扎克（1921～）是一个钳工的儿子。中央党校毕业后，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他是捷共中委。60年代初进入文坛，不久便成了文艺界的政治领导人。1972—1989 年为全国作协主席。

六十年代初，许多作家在写农村生活大唱赞歌时，柯扎克写的中篇《玛琳娜·拉德沃科娃》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当时起到了某种突破作用。接着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粗壮的手》、《圣米哈尔》（1971，获国家奖金）以及《鹤巢》（1976，获国家奖金）。它们都是捷克农村社会主义历程的真实记录，是农村曲折历史的艺术剖析。

六十年代后期，他曾多次去靠近贝加尔湖一带的原始森林体验生活。七十年代连续发表了以西伯利亚为题材的散文集《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狩猎》、中篇小说《白牡马》以及长篇小说《虎区的秋天》等。在这些作品里，柯扎克以原始森林为背景，通过一些极为平凡的生活故事，展示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长篇小说《亚当和夏娃》（1982）是他对自己故乡、对人类劳动，对妇女美的赞扬。

伊·斯卡拉（1922—）是位诗人，父亲是钳工。斯卡拉商学院毕业后任会计和采购员。1942 年被抓去柏林做苦工，受尽折磨，几次逃跑未遂，直到1945 年2月底才逃回祖国。解放后任党报刊的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作协书记等职。是捷共中委、议员。他主要的诗集有《火镰》（1946）、《跨过门槛》、《祖国的五月》《到处摆了战场》、《早晨希望的列车》等。六十年代后期，当诗人的祖国发生政治危机时，斯卡拉在诗集《步行的信差》、《四首死亡的诗和一棵大树》中嘲笑那些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蛊惑人心的肇事者，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游击战士、战斗的传统和崇高的友谊。《我在路上带些什么》（1975）、《火焰疾速》（1979）除继续抨击那些叛变者外，还嘲笑、讽刺社会中滋生出一批市侩。他把自己一生的创作佳品搜集成册出版，取名《赫斐斯塔司的铁工厂》。《百慕大三角洲》（1982）更加敏捷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评论界认为，“斯卡拉是位时代的歌手，执著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热爱党和世界和平的忠实缠绵的痴情者。”他多次获 国家奖金。

伊·陶费尔（1911—）曾在莫斯科电台工作。曾任捷驻南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报刊，出版社的领导人。战前的诗集有《将死了，欧罗巴！》、《再见吧！》等，战后发表了《英雄的史诗》、《年鉴》、《谁遮住了我们的蓝天》以及近几年写的《下次再继续》和《印第安的史诗》等。他总是将个人感情同时代的脉搏、人民的感情融汇一起，使人们从诗里得到抚慰和鼓舞。他曾因翻译和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全部诗作而获1951 年度的国家奖金。

捷克的非官方文学一向强大、它是由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所组成。它拥有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文艺理论家。如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塞弗尔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昆德拉、现任捷总统的哈维尔以及被称为卡夫卡式的“喻意”作家瓦楚利克等。

当 1948 年共产党组成了工人阶级政党实行一党掌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与此相适应的变化，那就是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宣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确的、一切文学艺术家所必须遵循的文学创作方法；作家要以马列主义为世界观，努力改变主客观世界。自此，凡与社会主义文学原则相悖的文学流派以及流派的代表人物均在打击、批判之列：他们是塞弗尔特、什克沃雷茨基、昆德拉、瓦楚利克、哈维尔、科胡特等几十位诗人、作家。他们都受到过全国范围内的批判，作品遭禁，有的身陷囹圄或驱逐国外，许多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创作或在他国出版自己的作品。

雅·塞弗尔特（1901—1986）生在布拉格一工人家庭。他的生活经历和艺术道路都十分坎坷曲折。童年生活十分凄苦，未念完中学就踏入社会，在报界任职并从事文学创作。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后又退了党。解放后他任过作协主席，但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最初是以无产阶级诗人步入诗坛，发表了诗集《泪城》。二十年代中期他又是捷克“纯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品是《全是爱》。三十年代初，他发表了一批描写爱情、赞颂世间一切真、善、美的诗歌，如诗集《裙兜里的苹果》、《维纳斯的手臂》等。1936 年以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慕尼黑协定出卖了诗人的祖国。这时塞弗尔特彻底从“自我”走向了沸腾的斗争生活。他心中燃起了“爱国、爱民、爱乡之情”。他的几部著名诗集都在这一时期写成，如《别了，春天》、《披上白昼的光》、《石桥》等。

解放后，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泥盔》、《穷画家到世间》是他爱国主义抒情诗集中最好的两部。他的代表作《母亲》获 1954 年度的国家奖。1950 年，他开始遭到了“围攻、批判”，原因是他的一组叙事—抒情的爱情诗《维克托尔卡之歌》被认为是“它是同‘二月事件’胜利后的革命文学背道而驰。……这是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聂姆曹娃在她的《外祖母》一书中，通过维克托尔卡的悲惨命运，向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的强有力的控诉。而今的社会，再也不会产生第二个维克托尔卡了。而塞弗尔特在此时此刻发表这样的诗作，至少可说是社会现实意义不大，缺乏强烈的时代感的表现……”可诗人拒绝接受那些“大批判”。

苏共二十大后，捷克文坛出现了新的局面。塞弗尔特在捷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带头批判了党的文艺政策和个人崇拜等问题，受到公开讨伐。之后，也由于身体健康不佳而停止创作十年。十年后他重返文坛。发表了诗集《孤岛上的音乐会》、《哈雷慧星》、《铸钟》。1967 年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又竭力支持一批作家“造反”，接着又因受到批判而搁笔十二年。之后发表了诗集《皮卡迪利之伞》、《避疫柱》、《身为诗人》等。

塞弗尔特由于“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全面发展的自由形象”获 1984 年诺贝尔文学奖。

约·什克沃雷茨基（1924～）生于一银行职员家庭。1945 年进查理大学先学医后改修哲学。致力于英美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1959 年被撤职。1968 年事件后流亡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任英语教授至今。1971 年他在多伦多创办“68 出版社”，用捷克文出版捷克流亡作家和国内遭禁作家的作品。

他的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往往以同一人物为主人公，反映不同的历史事件。作品政治意识较明显，针对性强。他一直将海明威的一句话：“作家的职责是讲真话”作为座右铭，持所谓“写真实”的创作态度，故在捷克屡遭查禁却又多次获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新坎特伯雷故事》（1948）获查理大学文学竞赛一等奖，但不久即被查禁。长篇小说《尼龙时代的结束》1956年写成，未能出版，在地下传阅，但1967年却获作协颁发的最佳小说奖。长篇小说《懦夫们》是他的代表作，于1958年出版后，引起全国性的大批判，被查禁。因为它是被苏联红军解放了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里头一本将一个“阿飞”式的人物当作作品的主人公来塑造，从而与当时风靡整个文坛以描写战争中的英雄、生产中的劳模、政权中的革命老干部的高、大、全的人物大相径庭。可1964年平反后再版印数高达十万册。他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坦克部队》、《雄狮俱乐部》、《奇迹》等。这些作品大多写于1968年事件后，在国外出版的。

米·昆德拉（1929—）出生于布尔诺一钢琴教授之家。1948年进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停时续，未能毕业。1958年毕业于艺术学院电影专业，之后留校任教。1970年起失业。1975年成为雷恩法国大学客座教授。1979年11月被取消其捷克国籍，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执教和创作至今。主要作品有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最后的五月》、《独白》，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小说《玩笑》。到巴黎后，发表了小说《可笑的爱情》、《为了告别的聚会》、《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生活不在这里》以及《不朽》等。关于昆德拉、关于他的作品；特别是《玩笑》（1967），历来就有争议。五十年代初，昆德拉就被当局视为喜欢“标新立异、突出自我的诗人，不守本分的党员。”《玩笑》一书被禁是因为它描写了查理大学的一名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他在乡下劳动锻炼时给一年级的一名女生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乐观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托洛茨基万岁！”他想开个玩笑，显示几分幽默。可他在大学里的党领导、党员同志们却不认为是个玩笑，于是给他上纲上线彻底批判，最后开除出党，勒令其退学，并发落到各矿区劳动大军里服劳役。舆论认为，昆德拉在给党的劳动改造政策、社会主义抹黑。

鲁·瓦楚利克（1926—）的作品充满卡夫卡式的“喻”意”。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斧子》、《豚鼠》和《实验室的老鼠》等。他是著名的政治宣言《两千字》和为争取人权的《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由于他坚决反对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因此被开除出党，新、旧作品均遭查禁，故在地下或他国出版。

瓦·哈韦尔（1936—）是捷克剧作家、政治活动家。出身于布拉格一富有的建筑企业主家庭。因所谓出身不好，故无权进文科大学，仅获得中级夜校文凭。曾在军队服役两年，退役后成为布拉格“ABC”剧院和“栏杆剧院”的一名管理舞台布景的技术员。从二十岁起，他就开始在文学、戏剧杂志上发表评论，研究文章。1963年出版的剧本《花园盛会》引起剧坛激荡，使他成了有棱有角的青年一代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曾三次被捕入狱，关押达五年之久，但他仍继续创作，其作品只好在地下或他国出版。主要剧作有《乞丐的歌剧》、《谒见》、《展览会的开幕典礼》、《抗议》、《过失》、《凄凉的广板》、《诱惑》以及闻名于世的给他妻子奥尔佳的《狱中书简》和三部随笔。

哈韦尔以其自己作品和民权活动家的身份而多次获各种国际奖和诺贝尔

和平奖提名。1989年12月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至今。

巴·科胡特（1928—）捷著名剧作家、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68年被开除出党。1979年离开捷克，同时被取消国籍，流亡维也纳。1990年返回布拉格。他的作品大多涉及当代青年的道德问题，大胆暴露、抨击现实，从而引起争论、异议和非议。他主要的作品有诗剧《好听的歌儿》，戏剧《九月的夜晚》、《不幸的凶手》、《冒险的游戏》等。他的代表作《如此爱情》（1958）在布拉格公演后，立即引起轰动。剧本描写一女大学生丽达举行婚礼前夕，偶遇初恋时的情人——已婚的彼得，当两人早晨醒来后意识到世界还大得很。彼得强调面对现实，丽达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只有死亡一条路可行。

对作者的评价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科胡特是一位有良知的党员作家，他能勇敢地站出来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另一派则认为，他这是在污蔑现实，给自己的党抹黑。后来当局出面干涉，六十年代初起，该剧便从捷克舞台上消声匿迹了。剧本也被禁止再版再演。但该剧却在德国等十八个国家的舞台上继续演出。

还有一大批作家，他们并非持不同政见者，但他们的艺术个性则十分鲜明，他们的作品丰富了战后的捷克文学，他们是被称为“哈谢克式”的幽默讽刺大师“天才的民间说书人”博·赫拉巴尔（1914—）。他在1965年出版的描写捷克一青年炸毁德国军火列车的英雄行为的中篇小说《严密的监视下的列车》曾轰动文坛。七十年代地下传抄了他的三部小说《我曾为英国国王效劳》、《时间禁止了的城市》和《过于喧嚣中的孤寂》。这三部小说被捷克非官方文学派的作家们誉为“捷克现代文学中的杰作和‘高峰’”。

以揭露现代社会生活中市侩们的种种恶习为特色的、被称为“野兽派”的弗·帕拉尔（1903—）的主要作品是小说《情人和凶手》、《青年人和鳄鱼》、《总奇迹》、《幻想带来的痛苦》以及《诱惑—A到ZZ》（1982）等。用现代派手法描写现实社会主义日常生活及其腐化虚弱的本质的伊·什维达（1949—）的主要作品有《事故》、《两千个光年》、《火灾和火场》等。

还有一批老作家，如扬·奥青纳谢克（1924—1979）的以现实社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公民布里赫》和取材于反法西的中篇小说《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和另一位老诗人弗·赫鲁宾（1910—1970）的一些刻画了广泛的时代、理想、人生等的诗作为战后的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蒋承俊）

斯洛伐克文学

在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斯拉夫部落定居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第一个共同的国家是从公元 830—906 年的大摩拉维亚国。1018 年，斯洛伐克曾一度脱离捷克，并属于匈牙利国，1918 年，奥匈帝国崩溃，诞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69 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90 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 年 1 月 1 日起，斯洛伐克与捷克分离，成立了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在布拉迪斯拉发。人口为五百零七万人。

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

1

斯洛伐克的古代文学，和捷克文学一样，始于九世纪而结束于十八世纪末。十一世纪以前，它同斯拉夫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摩拉维亚—巴龙尼传说》是它最早的文献之一。自十一世纪初起，斯洛伐克成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匈牙利封建主来到斯洛伐克，并与斯洛伐克贵族混杂在一起，于是后者逐渐丧失了民族性。这种情况使斯洛伐克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不能像在捷克地区那样得到有利的发展，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传统几乎中断；书面文学也多受匈牙利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同捷克在文化上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派遣学生去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捷克的胡斯运动在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胡斯、赫尔奇茨基以及夸美纽斯等人的著作就曾在斯洛伐克得到广泛的传播。

十四和十四世纪是斯洛伐克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但比起捷克来仍缓慢得多；文化生活的发 展也不及捷克，经过几个世纪，斯洛伐克语言才成为文学语言。由于拉丁文化在匈牙利盛行，在造型艺术方面，罗马风格在斯洛伐克一直维持到大约十四世纪。

从十五世纪起，除拉丁文外，捷克文也被用作斯洛伐克的书面语言，这对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最古老的斯洛伐克文学手稿出现于1479年。1467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创办了一所大学。

中世纪的斯洛伐克文学受到封建意识的制约，服务于封建特权阶级，宗教文学占统治地位。作家用拉丁文或捷克文撰写了一些宗教作品，特别是赞美诗，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宣扬上帝的万能。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世俗的主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因素开始渗透到文学中来。斯洛伐克民间文学包括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话、歌谣、山歌等，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十九世纪捷克著名女作家聂姆曹娃就曾搜集、整理、出版了十卷斯洛伐克童话和故事。在斯洛伐克民间文学中，民歌尤其发达，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它主要反映了民间生活。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民歌占了一定的比重，其中绝大多数适合女性歌唱，例如：

我有一个心上人，
三天两头拌嘴儿，
上帝可知我的心：
死也跟我小爱人。

十七世纪，斯洛伐克盛行一种描绘农民艰苦生活的民歌或山歌。它描绘了被奴役者受君王、官吏、贵族压迫和掠夺的痛苦生活，反映了绿林好汉和起义者们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这在歌颂斯洛伐克传奇式人物、著名的绿林好汉——扬诺希克的民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以扬诺希克为首领的绿林好汉们同群众生死与共，血肉相连。人们用动人的歌来赞颂他的业绩：

扬诺希克，扬诺希克，

你的名字在树梢上兴起，
扩大开去，
响彻整个山岭，
直上青云。

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的发展，逐渐成为斯洛伐克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成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来许多作家创作的源泉。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斯洛伐克才开始有书面文学，它继承了民间文学的革命传统和艺术风格，并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

2

在斯洛伐克，与捷克地区相比，资本主义发展要迟缓得多。斯洛伐克还保存着和古代奴隶制区别不大的农奴制。1785年，匈牙利废除农奴制，因未取得贵族方面的支持，结果形同具文。斯洛伐克的落后，与这一情况有一定的关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人民的处境虽然比捷克人民更加恶劣，但反抗这种残酷统治的民族意识也随之日益增强。到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斯洛伐克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民族运动中，最有觉悟的活动家是知识分子、传教士和来自民间的教师。他们竭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提高斯洛伐克人民的地位。使祖国语言经过规范化而成为书面语言，这是斯洛伐克民族复兴初期最重要的文化活动。首先尝试这项工作的是安·伯尔诺拉克（1762—1813），他于1790年根据斯洛伐克西部方言写成了文法书。最早用这种文字写诗的是扬·霍利（1785—1849）。他是一位传教士，其诗作大多歌颂斯拉夫人的勇敢精神，这对增强民族自豪感，激起民众的民族意识都是有意义的。斯洛伐克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是约·伊·巴伊扎（1755—1836）和尤·方德利（1750—1811）。巴伊扎在两卷集的小说《一个青年人的遭遇》里，真实地描绘出贫民饥寒交迫的惨状和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德利在小说《僧侣与魔鬼之间的忠实契约里》，使用僧侣同魔鬼对话的形式，宣传启蒙主义思想，遭到教会查禁。另一位著名诗人扬·科拉尔（1793—1852）搜集出版的民间诗歌，对斯洛伐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爱国主义戏剧得到发展。最著名的剧作家扬·哈卢普卡（1791—1871）的讽刺喜剧《落后者》，嘲笑小市民的阶级偏见和贪得无厌，在人民中很有影响。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斯洛伐克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什图尔为首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为民族运动的主力军。他们的纲领不仅包括文化问题，也涉及社会的、民族的政治问题。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于1843年制定了一种新的标准文字。这是在斯洛伐克中部的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制定的新的书面语言，至今仍被使用。由于文字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什图尔这辈人的创作得以保存下来。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是，文学工作者在优秀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开始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卢·什图尔（1815—1856）是当时斯洛伐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代表人物，民族运动的组织者。他在布拉迪斯拉发读书时就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1847年他成了匈牙利国会议员，在国会里积极为取消农奴制和为斯洛伐克人开办学校而斗争。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受到警察监视，在此期间便转向文学

创作。他的第一部诗集《夜歌》，控诉了人世间的和平，呼唤人们行动起来，为自由而战。他最著名的情诗《离别》，是描写他为了全力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事业而同自己爱人告别的情景。什图尔的代表作是 1853 年出版的诗集《诗与歌》。斯洛伐克民族美好的往昔、风俗人情以及自然景色等都成为该诗集中的新颖题材。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影响斯洛伐克文学、新一代向浪漫主义文学过渡，并且在《关于民歌以及斯拉夫种族的传说》（1853）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文学、艺术、民族等的观点，对同代人影响较深。

什图尔派最重要的几位诗人是哈卢普卡、斯拉德科维奇和克拉尔。

萨·哈卢普卡（1812—1883）深受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的影响，诗作多取材于斯洛伐克古代历史传说或自己家乡的轶事。在所写的抒情诗、颂诗、情诗以及战歌中，大都讴歌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自由而战的勇士们。

安·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出生于教师家庭。他的代表作是抒情叙事大型组诗《玛琳娜》（1846）和《杰特万》（1853）。作者歌唱美和青春，倾吐自己对玛琳娜的真挚爱情。诗中的玛琳娜是诗人心目中的一切美的体现，对玛琳娜的爱即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他的诗抒情优美，语言朴实，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斯洛伐克民歌的优良传统。

扬·克拉尔（1822—1876）是斯洛伐克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他在布拉迪斯拉发读书时就开始写诗，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从法律系毕业后，去布达佩斯任律师。曾积极参加 1848 年的革命起义，并被逮捕入狱。出狱后任小职员，直至去世。他的生活创作道路都很坎坷崎岖。激进是他政治生活和创作活动中的显著特征。他体察民情，关注现实生活。他特别注意收集、整理斯洛伐克民间英雄扬诺希克的事迹，把它写成诗歌、童话和传说。他的代表作《被妖魔控制在瓦赫河中的少女和奇怪的扬科》是诗人自我写照。诗人看到了世界上的贫穷、不义，便从这个丑恶、虚伪的世界逃走，到人民中去寻找慰藉。他在《春之歌》一诗中，直接号召斯洛伐克人民起来投入战斗。克拉尔的诗歌的形式和语言都非常近于民歌。

什图尔派的散文家扬·卡林恰克（1822—1871）生于小贵族家庭。大学毕业后任教授、校长等职务。他最初写诗，办杂志，后来着重写散文。他的代表作是小说《复辟》（1860），描写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小贵族阶级在社会活动中的种种没落的表现，说明他们已不再能起到进步作用。卡林恰克的散文词汇丰富，喜用民间谚语。他在斯洛伐克文学史上有语言大师之称。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奥匈帝国对斯洛伐克民族压迫日益加重。斯洛伐克文化因受到匈牙利化政策的多方压制，发展十分困难。1848 年以后开办的三所斯洛伐克学校全被封闭，直到 1918 年还没有斯洛伐克人自己办的学校。而在匈牙利的大学中，斯洛伐克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斯洛伐克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力求保持斯洛伐克语言和文化的生命。1848 年革命失败后，什图尔派许多著名作家、诗人遭到迫害，文学界一度出现沉寂的局面。在这些黑暗年代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把视线转向了自己的捷克兄弟，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可是有些作家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背叛了民族、已经匈牙利化了的小贵族身上，这遭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赫维兹多斯拉夫、库库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

们的作品不仅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也表达了他们对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了解。

帕·奥·赫维兹多斯拉夫（1849—1921）是斯洛伐克著名诗人。他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斯洛伐克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他不仅是人民痛苦生活的表达者，而且也是一位为民族自由、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战士。

他出身在一个较穷的小贵族家庭，从小目睹农民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他学过匈牙利文，曾用它来写诗，深受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影响。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奥拉瓦城当律师。

他的主要抒情诗集《嫩枝》（1885 - 1895）是诗人的一部日记。它记录了诗人生活中快乐和悲伤的各种时刻，倾吐了他丰富的内心感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斯洛伐克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他们诚挚的爱。另一部组诗《春夏漫步和思念》，表达了诗人对人民、对青年一代的赤诚而热情的歌颂。

他的叙事诗同他的抒情诗一样获得好评。中心主题大多围绕着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主要叙事诗集有《守林人的妻子》和《埃诺·伏尔柯林斯基和加博尔·伏尔柯林斯基》。前者描写一位年轻的守林人米哈尔和自己的妻子汉卡在林中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而这种美好的生活却遭到当地一个贵族少爷的破坏。汉卡被少爷纠缠不休，逼得她出于自卫将少爷杀死。米哈尔出自对汉卡的爱而让自己承担杀人的罪名，于是下了监牢。神经错乱了汉卡去法庭自首。法庭释放了米哈尔。时间医治好了汉卡的心灵的创伤。林中重又归于平静。后者描写贵族同农民间的阶级矛盾。贵族代表腐朽，而未来属于人民。他的诗作感情真挚，内容深刻，形式优美，词汇丰富且形象，多来自民间语言，深为读者所喜爱。

马·库库（1860—1928），是斯洛伐克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医学院毕业后，他去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行医多年，那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并在此创作了不少作品。后来他同一大批穷人去南美，从事文化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

他以描写农村生活著称。作品主人公大多是农村里的牧鹅人、鞋匠、泥瓦匠等。这在中篇《没有觉醒的人》、短篇小说集《火红色的小牝牛》等中有所反映。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斜坡上的房子》（1903—1904）取材于克罗地亚人的生活，通过一个地主儿子与农家姑娘的恋爱悲剧说明了两个阶级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多用生动的群众语言。

鲍·斯·基姆拉娃（1867—1951）生长在农村。她的整个一生都在自己家乡度过。她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主要靠自学获得知识。但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将所见之物如实描写出来。因此她的作品被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斯洛伐克农村生活的艺术文献。”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停滞不前的人们》（1914）和《英雄》（1918）。前者揭示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在斯洛伐克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描绘了一幅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的斯洛伐克农村图画。后者表明作者反对战争、反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的思想，批判那种口头爱国派的种种虚假行为。

基姆拉娃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她的语言通俗；大众化，民间口语较多，故事情节生动上。

约·格·塔约夫斯基（1874—1940）是著名的散文家和戏剧家。他出身于手工业家庭。他当过教员、银行职员。他的作品大多反映普通人的艰苦生

活。他写寡妇、佣人，对她们深表同情。他著名的短篇小说《波士特科娃老妈妈》描写一辈子同贫困、疾病作斗争的女佣人的高尚情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斯洛伐克劳动妇女的形象。

他的戏剧代表作是《妇女的法典》。他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乡下屠夫们的生活，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好坏程度。作者在这个闹剧里对人民中的缺点给予了批评，但相信他们的未来是美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灭亡，斯洛伐克同捷克两个民族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1918年10月28日重新合并一起，产生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人民虽然从长期遭受的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可是由于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和捷克人民一样，依然遭受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时期，在斯洛伐克文艺界，同样存在各种社团、流派，作家的政治观点也各不相同。属于资产阶级右翼的是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派，此外，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派也已形成。他们由于对国内政治、经济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不同，为此常在《斯洛伐克展望》（1846年创刊）、《年轻的斯洛伐克》、《人群》、《篝火》等杂志上展开激烈的争论。可是斯洛伐克进步文学仍因国内经济落后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残酷统治而得不到迅速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转向描写过去，如子耶（1866—1944）的长篇小说《斯瓦托普卢克》和耶森斯基的《民主主义者》在当时都较有影响。库库钦从南美归来后，也开始写历史小说，指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应当紧密团结。基姆拉娃还写了一些反对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描写斯洛伐克战后社会生活的中篇小说。

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什·克奇麦里（1892—1955）主编的《斯洛伐克展望》杂志，团结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使其能在这个杂志上就许多社会文艺问题进行争论和探讨。

还有一些作家，如马·拉祖什（1888—1937）和米·乌尔班（1904—1982）等。他们早期的作品虽能真实地反映独立后的农村生活，可是他们后来在政治上堕入了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坑；他们后期的作品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思想内容上却趋向保守甚至反动。

因为斯洛伐克大部分作家出身农村，所以农村题材的文学颇为发达。这些作家大都反映农民、山区老百姓的生活，歌颂他们勇敢、勤劳、朴实、百折不挠的性格。如卢·翁德列约夫（1901—1962），他的两部小说《绿林好汉的青春》、《耶尔库什·拉宾》，都描写了一个生长在山区的青年，后来受到资产阶级市侩习气的侵袭，但仍然保持着山区人民淳朴、憨厚的美德。

在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诗人中，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创作献给人民，如共产党员作家伊伦姆尼茨基、克拉尔，他们以《人群》杂志为阵地，为斯洛伐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战斗。诗人杨·波尼昌（1902—1978）、拉·诺沃麦茨基等人的作品也表现了时代精神，他们是进步文学的领导力量。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还有少数作家投靠了德国法西斯，但大多数作家仍然忠于祖国和人民。有的党员作家转入地下，许多作家还直接参加了1944年下半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歌颂了这场英勇的战斗。

扬科·耶森斯基（1874—1945）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

第一共和国时期，他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副总统。早期的作品，如诗

集《新歌集》、《捕捉》以及中篇小说《小城的交谈》、《拉斐科娃太太》等，对那些虚伪、自私，一心想往上爬、极力贪图荣华富贵的小市民和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民主主义者》（1934—1937），是第一共和国时期上层社会的一幅生动的讽刺画。他嘲笑这个社会里的选举制度。作者通过对一个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医生从农村来到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见闻的描写，把反动政界的种种丑闻揭露无遗。这部作品无疑是对三十年代斯洛伐克上层社会的最为深刻的解剖。

彼得·伊伦姆尼茨基（1901—1949）是斯洛伐克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他原籍捷克，出生在一个火车司机的家庭，后长期在莫斯科从事教育工作。1922年入党，1926年去苏联支援建设。第二年9月，开始就读于莫斯科新闻专科学校。1928年回国后，在党的机关报任编辑。

他早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胜利的挫折》、《处女地》，短篇小说集《响亮的脚步声》、《归来》和《穿堂风》等，都是反映城乡社会生活。小说《一块糖》（1934）是伊伦姆尼茨基的代表作，它深刻反映了第二次大战前斯洛伐克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书中描写种植甜菜的农民和制糖厂的工人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他们种甜菜，制糖却吃不到一块糖。后来制糖工人逐渐懂得，要从剥削者手中去夺回他们的劳动果实，就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伊伦姆尼茨基不仅继承了斯洛伐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而且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主题，他的作品在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文学中，具有典范的意义。

弗·克拉尔（1903—1955）也是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他出世之前，他的父母亲曾从斯洛伐克移居美国，因此他出生在俄亥俄洲。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随母返回了祖国。克拉尔童年是在斯洛伐克农村度过的，他当过牧童，学过木匠，还做过小买卖。后来，他毕业于教育学院，当过教师。他一生始终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保持密切联系。参加共产党后，曾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克拉尔早期写诗。第一部诗集《调色板上的黑颜色》抨击了社会的弊病，表现了诗人要为斯洛伐克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决心。第二部诗集《从黑夜到黎明》不仅揭露了法西斯镇压人民的残酷暴行，也歌颂了斯洛伐克人民1944年下半年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展现了他们迎接解放、欢呼自由的热烈场面。

克拉尔在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被切断的道路》（1934）。这部作品展示了一幅1929年经济危机后斯洛伐克农村的广阔图景：一方面是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在失业、饥饿、贫困的威胁下阶级觉悟日益增强，终于起来战斗。

另一部小说《相遇》取材于斯洛伐克南部人民的生活。书中一位青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要得到提高，必须参加社会实践。

克拉尔在他的青年读物《苏珊娜·钦科娃的孩子们》和《扬诺》中，生动地描写了占领时期斯洛伐克广大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深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945 年解放之后，特别是 1948 年“二月事件”之后，共产党和革命工会集中全部力量摧毁了反对派力图扭转局势的进攻，从而巩固了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这一形势下，斯洛伐克大部分作家和诗人都表示拥护工人阶级的纲领，拥护共产党的思想方针，宣称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力求在作品里反映社会的变化、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和现代人的精神面貌。

1

在 1945 年的几年里，因民族解放而产生的欢乐情绪，在斯洛伐克文学中立刻以大量的向苏联红军致敬、欢呼解放、赞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诗歌表现出来的，其代表作是米·拉伊恰克（1926—）的《我的同志是祖国的》。

解放后的斯洛伐克诗歌，经历了从神秘主义诗歌转向社会主义抒情诗；从描写现实时的公式化，在有限的题材范围内反复兜圈子转向一种充满革新精神，题材广泛，从不同角度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诗歌。在许多诗人中，以老一代的诺沃麦斯基、普拉弗卡以及中年一代的米哈利克、瓦列克等最为著名。

拉·诺沃麦斯基（1904—1976）是斯洛伐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生活、艺术经历都十分坎坷曲折。他生于布达佩斯。1925 年入党，后任中委，是“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950 年被控告犯有民族主义罪行而进了监狱、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963 年恢复名誉重新回到党内，再次进入政界、文化界担任较高的职务。

二十、三十年代他是各种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诗歌派、先锋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斯洛伐克文学团体“人群”的重要成员。他早期的诗集如《星期四》、《长菱形》、《敞开的窗户》等都是充满诗人的主观感受和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美的追求。《西班牙的天空》以及《在村后的圣像》等诗集中，充满反法西斯的激情。《三十分钟到城里》这部诗是诗人艺术思想和艺术形式的总结，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共产主义信念。

安·普拉弗卡（1907—1982）是诗人，也是小说家。毕业于查理大学法学系。参加过“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加入共产党。解放后在党政及文化机关有各种重要职务。曾任作协主席。主要诗集有讴歌祖国锦绣河山的《夜与晨曦》、《利普托夫的芦笛》；取材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有《遍山的火焰》以及《他不会死在马上》。在《别了，我的爱情》（1967）、《遗训》（1972）中充满了生活的哲理以及对现实作纵深的思考和探索。她最初以写社会心理小说著称，其代表作是《巴维尔的对立面》。具有回忆录特色的两卷集小说《渴求的情人》（1971）博得文坛好评。

沃·米哈利克（1926—）是一位从神秘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抒情诗的诗人。主要诗集有《歌唱着的心》、《军人的爱》、《最后的初恋》等。他的诗富于旋律性，优雅悦耳，画面动人。

米·瓦列克（1927—）毕业于商学院。曾任各种文学杂志的编辑、作协主席、党中央委员、议员、文化部长等职。十五岁开始写诗，十九岁时出了一部《诗选》，其中看得出颇受捷克诗人沃尔凯尔以及叶赛宁、阿波利奈尔

等人的影响，有些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痕迹。经过十三年的风风雨雨，在《接触》、《吸引力》、《激动不安》等诗集中，却完全变了样，人们在他的歌唱中感到了时代的脉搏。长诗《千言万语》（1976）是瓦列克的代表作。有评论家认为他以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的激情和表达方式，猛烈地抨击当今世界的种种丑恶；嘲笑斯洛伐克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小市民习气和冷漠无情的庸人。由于他在该诗中歌颂与暴露的分寸感掌握较准，艺术表达方式独特而新颖，已被公认为是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诗歌的优秀典范。之后发表的诗集《水》、《森林之歌》以及为孩子们创作的五部诗集都获得了好评。

2

解放后的文学有意识地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先锋伊伦姆尼茨基和克拉尔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艺术的传统。与变化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新题材进入了文学，这首先是指关于民族起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国有化等题材。斯洛伐克的小说用艺术手法描绘了当前的实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人的道德转变。最有成就的是小说家米纳奇、姆尼亚奇科、希库拉以及剧作家索洛维奇等。

弗·米纳奇（1922—）出生在手工业家庭。1944年毕业于布拉迪斯拉发哲学院。积极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曾被关进达豪集中营。解放后任各种文学杂志编辑、主编；是斯共中委、国会议员，任作协书记、主席等职。曾获1955、1962年度的哥特瓦尔德国家奖。1975年被共和国总统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他的创作大多取材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处女作小说《死神在山冈上徘徊》就是描写起义者的社会道德和感情心理。小说《昨天与明天》则是反映从解放到1948年2月的斯洛伐克的农村生活。多卷本的历史小说《一代人》仍取材于民族起义，第一卷《久等》描写起义者各种戏剧性的经历。《生者与死者》是艺术上最成功的一卷。起义者的英雄行为可歌可泣，而怯战悲观者也令人痛心。第三卷《钟声》是1945—1948年“二月事件”这一时期斯洛伐克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于事件和情节的叙述交代上，而成功地刻画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精神。

拉·姆尼亚奇科（1919—）以写报告文学为主，其特点是揭露、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腐朽的一面。主要有《遥远的沃汉姆坡》、《何处是尘土飞扬之道的尽头》。代表作是1963年在斯洛伐克出版，后于1964年译成捷克文在布拉格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迟写的报道》，引起文坛、政界的轰动，销售达三十万册。长篇小说《权力的滋味多么美》（在捷遭禁后，于1967年在西方出版）。上述两书，具有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

1968年事件后，姆尼亚奇科移居德国，写了《第七夜》，记载了他耳闻目睹的苏联出兵时的情况。

温·希库拉（1936—）出生于一个林业工人家庭。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自幼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完全靠勤工俭学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1964年，他以两部短篇小说集《没有掌声的音乐会》、《我有可能为自己搭起窝棚》步入文坛。在这些作品里，他以清丽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回忆青少年时期那段有着友谊和爱情的诗一般的生活。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他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起义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木匠师傅们》（1976）、

《玫瑰香葡萄》（1977）、《维尔玛》（1979）。希库拉笔下很少出现法西斯刽子手们兽性发作的场面，而更多的是描写一些普通农民在一种非常的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他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

扬·索洛维奇（1934—）是剧作家。他出身于铁路员工家庭。1958年毕业于布拉迪斯拉发艺术学院戏剧理论和剧作法系。曾任广播电台的编剧论艺术指导、作协书记和主席。十九岁开始发表广播剧《卓越的天才》，再现歌白尼的生平和事业。他发表第一部活剧《最后的雷声》时还是个一年级的大学学生，到大学毕业时已是写有四部话剧的剧作家了。他主要的创作有《再过五分钟就是午夜》、《挂号信》、《渐暗的太阳》。代表作是《子午钱》、《银色的美洲豹》和《金雨》。之后，他将这三部剧合成一集，命名为《公民三部曲》于1978年出版。这是些反映斯洛伐克当前现实生活的剧作，接触的社会和矛盾和问题，具有鲜明的面对现实的特点。八十年代出版的《犯错误的权利》也属于上述的社会问题剧。

索洛维奇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发现题材、提炼主题，从而创作出一批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剧作。

他多次获国家奖金；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蒋承俊）

罗马尼亚文学

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

1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欧洲东南部的罗马尼亚就像一束金色的玫瑰插在蔚蓝的黑海上。这一美丽的国度有着同她一样美丽的文学殿堂。推开这座殿堂的第一扇窗，五彩缤纷的民间文学便会立即吸引住我们的目光。

罗马尼亚民族是在极为艰难险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罗马尼亚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资料表明第一批用罗马尼亚语书写的文本直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尼亚文学则出现得更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文学成了罗马尼亚人民丰富生活、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罗马尼亚民间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极为丰富多采。它包括：童话、传说、寓言、故事、多依娜（抒情歌谣）、神话、谚语、谜语等等。民间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初级阶段，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天赋的最鲜明的体现。罗马尼亚民间文学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罗马尼亚民族诸多本质性的方面。

民间文学与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紧密相联。新年、圣诞节、播种、收获、婚丧礼仪等等往往是民间文学创作者反复吟唱的永恒主题。大量的民歌、叙事曲便由此而生。这些民歌和叙事曲语言生动，节奏明快，既能丰富带动人民的生活，又能反映民间许多习俗，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民间文学又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人们种种微妙细致的情感。在此方面，多依娜显得尤为突出。罗马尼亚评论界认为多依娜无疑是罗马尼亚民间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表现力最强的艺术形式。甚至可以说，一个罗马尼亚人在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旅程中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所产生的所有情感都在多依娜中反映了出来。根据不同题材，多依娜可分为爱情多依娜、牧羊人多依娜、命运多依娜、自然多依娜、士兵多依娜、绿林好汉多依娜等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难怪有人说多依娜是罗马尼亚人灵魂的一部浓缩的历史。

让我们来看看几首不同题材的多依娜：

树林啊，树林，
展开你的小径，
运走我的忧伤

这首树林多依娜表达了人们从自然中寻求精神寄托的意愿。

绿绿的扬树叶啊，
森林的中心
便是思恋的小桥。

这首思念多依娜用茂密的森林来象征浓浓的思念之情。

山啊，美丽的山，
低下你的头吧，
让我登上你的峰顶，
让我看看我的村庄，
让我望见我的娇妻，
她正清扫着我的院子。

牧羊远离亲人放牧时，孤独之情不言而喻。这首牧羊人多依娜充满了深深的孤寂和深深的思念。

亲爱的，我可看得出
你并未正正经经将我爱。
既然如此，就离我远点，
好让我去爱我喜欢的人。
天下男人并非一个模样，
别的小伙子会把我看中。
这世界辽阔而又伟大，
总有人愿选我当新娘。

这首多依娜起源于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一位纯朴的姑娘因为得不到自己情人真心实意的爱而深感痛苦。于是，她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倘若不能真心爱她，就索性分手，因为她要去寻找理想的人。姑娘相信天下男人并不都是一个模样，总有人会注重感情，总有人会与她真诚相爱的。在这首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多依娜中，姑娘的爱与怨、失望和希望、忧伤和自尊等种种微妙的情绪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类似的多依娜在罗马尼亚民间文学中实在是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多依娜不仅对罗马尼亚诗歌而且对罗马尼亚音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既被当作抒情诗传诵，也常被当作民歌吟唱。从罗马尼亚当代杰出的音乐家乔·埃内斯库的作品中就可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

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会有一些古老而又美丽的神话在人民中间代代相传。这些神话之所以能保持着长久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它们往往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在罗马尼亚民间文学中，《能工巧匠玛诺莱》和《羔羊》便属于这样的神话。

《能工巧匠玛诺莱》以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凄婉而动人的故事。瓦匠玛诺莱奉命为君主建造一座世上独一无二、辉煌无比的庙宇。这座庙宇将屹立于阿尔杰什河上游一片美丽的草地上。玛诺莱率领九位工匠开始了庙宇的建设。他们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白天建造的墙壁，到了晚上就坍塌了。如此不断反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付诸东流，玛诺莱和工匠们痛苦不堪，却又束手无策。一天晚上，玛诺莱在梦中得到一个神示：唯有将一个生物砌进墙壁才能确保墙壁不倒。玛诺莱叫醒了工匠们，将这个神示告诉了他们。他们对墙发誓要将第二天早晨遇见的第一个生物埋进墙壁。殊不知，第二天早晨第一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便是前来送饭的玛诺

莱的妻子安娜。为了信守诺言，也为了庙宇的建成，玛诺莱忍痛将自己的爱妻活活埋进了墙壁。不久之后，一座世上最为辉煌的庙宇终于建成了。

这则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残酷的神话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崇高的牺牲精神。理想的实现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罗马尼亚人民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在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罗马尼亚人民一直在同侵略者、同奴役者、同自然灾害抗争，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而搏斗，因而这则以牺牲为主题的神话对他们便构成了特殊的意味。后来的许多大诗人，如爱明内斯库、布拉加、斯特内斯库等都曾从这则神话中汲取灵感，创作了无数优美的诗篇。

《羔羊》讲述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有只羔羊连续三天三夜一棵青草地也没下口。摩尔多瓦牧羊人感到纳闷，便问羔羊为何不吃青草。于是，羔羊便向牧羊人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另外两位牧羊人看中了摩尔多瓦人的羊群和财产，正密谋要杀他。牧人听后毫不畏惧。他镇定自若地说倘若命中注定死路一条，那就请那两位密谋者在他死后将他埋在羊圈旁，这样他就能同自己的羊群朝夕相处，再在他身边放上一只风笛，这样他就不能时刻听到甜美的乐曲……

《羔羊》涉及到了生与死、人与自然的关系。热爱生活的牧羊人一旦面临死亡，毫不畏惧。他觉得死完全可以变得同生一样美丽。他要通过死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之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便能极为坦然地迎接死亡。年青牧人对待自己的死简直就像对待一场婚礼。他邀请风、雨、草地、森林、河流乃至整个宇宙都来参加这场特殊的“婚礼”。这则神话曾给予灾难深重的罗马尼亚人民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2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罗马尼亚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被分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这三个公国既各自独立，又始终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当文艺复兴运动给西欧许多国家的文化注入勃勃生机的时候，罗马尼亚人却不得在顽强地抵抗着异族奴役者的文化侵略。直到19世纪，罗马尼亚文学才初露端倪。各类编年史的出版，大量西欧和东方文学名著的翻译和改《写构成了十七世纪罗马尼亚文学的主要内容。

编年史作家中，“佼佼者”的美称当属格里高莱·乌雷凯和米隆·谷斯丁。

乌雷凯（约1590—1647）是第一位用罗马尼亚语撰写编年史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摩尔多瓦公国纪事》以生动、客观而又简练的文笔叙述了斯特凡大公领导人民英勇抗击入侵者的事迹。纪事中不乏精彩的片断。有一段这样写道：

这位斯特凡大公身材并不魁梧，性情却极为火爆。动怒时，随时都会让人流出一些无辜的血：他常常在筵席上稍稍审判便一眼不眨地将人处死。

可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品格优良的君主，勤勤勉勉，毫不懈怠，总是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各类事务，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想到。说到战事，他可是位大师。一旦需要，他便会身先士卒。沙场上只要出现他的身影，士兵们就没有一个敢后退一步。这也是他几

乎百战百胜的缘由。

战败时，他从不气馁。知道自己跌倒后，他总会千方百计地重新站起，再一次战胜敌方。

这位斯特凡大公下葬在他亲手建造的普特那寺庙时，举国上下，一片悲痛。

人们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哀悼他，就像哀悼自己的父母，因为人人皆知斯特凡大公是自己的救星，他一生都在为人民谋利益。

斯特凡大公逝世前，那年的冬天，冰冻三尺，真是前所未有。那年的夏天，大雨倾盆，洪水泛滥，万物均被淹没。

乌雷凯的《纪事》具有历史、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的价值，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

另一位编年史家米隆·谷斯丁（1632—1691）紧接着乌雷凯的《纪事》写出了《自阿隆大公登基以后的摩尔多瓦公国纪呈》。此书记述了1595至1661年间摩尔多瓦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谷斯丁的《纪事》具有回忆录性质。作者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发掘戏剧性情节，将原本枯燥的历史化为一则则娓娓动听的小故事，从而使读者捧起此书便爱不释手。

这一时期，欧洲和东方文学中的许多名著，如《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特洛伊的故事》等相继被译成了罗马尼亚文。一些译者还别出心裁，将某些外国作品改编成富有罗马尼亚特色的作品。在罗马尼亚文学尚处萌芽状态时，外国文学作品像一场场及时的春雨滋润着读者和作家的心田。

3

十八世纪，罗马尼亚文学在缺乏自由，常遭异族统治干涉的艰难情形下缓慢地发展着。

世纪初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迪米特里·康特米尔（1673—1723）是位曾受到伏尔泰称赞的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他在历史、数学、音乐、哲学、地理和文学方面均有建树，而且还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土耳其语、法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等十多种语言。他的文学代表作《象形文字史》（1705）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小说特征的作品。作者用寓言的表达手法，揭露了两个公国贵族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他用狮子王朝和老鹰王朝来分别影射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统治阶级。书中还有代表作者本人的独角兽以及暗指罗马尼亚国君主的乌鸦等动物。《象形文字史》的问世标志着罗马尼亚文学的一大进步。

十八世纪，罗马尼亚文化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那就是阿尔迪亚尔学派的兴起。阿尔迪亚尔学派（又称“特兰西瓦尼亚学派”）是十八世纪末由特兰西瓦尼亚一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思想文化运动。该学派的成员大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深入而广泛地探讨了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拉丁起源、统一性和连续性问题。他们兴办教育，广泛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开展各类学科（包括文学）的讨论，并著书立述以反映时代的潮流。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为萨米尔·米库—克莱因（1754—1806）、格奥尔基·欣开伊（1754—1816）、彼德·马约尔（1761—1821），而文学方面的杰出代表则是依昂·布达依—德列亚努（1760—1820）。德列亚努曾在维也纳攻读过哲学和神学，并先后担任过教堂歌手、

译员、文书、法院参事等职。他在历史和语言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英雄史诗《茨冈人之歌》被公认为他的文学代表作。史诗由十二章组成，主要描述十五世纪罗马尼亚国君主弗拉德·采佩什保家卫国的事迹。作者以极为真实的笔调既讴歌了君主发动人民英勇抗敌的无畏精神，又揭露了封建贵族贪得无厌、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既赞颂了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坚强意志，又批判了大众身上所存在的懒散、自私和妄自尊大等弊病。史诗的语言生动活泼，韵律富于变化，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有血有肉，不愧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

对于罗马尼亚文化而言，阿尔迪亚尔学派就如同“狂飙运动”之于德国文化，“百科全书派”之于法国文化，“启蒙运动”之于英国文化。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本国文学的基础尚未完全巩固之前，许多外来影响显而易见。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大量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作。吟风弄月、谈情说爱一时成为诗人们追求的时髦。但很快一批真正有艺术感的诗人登上了诗坛。他们大都出身于豪门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谙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富有献身诗歌的精神。在这些诗人中，伏克雷斯库一家显得尤为突出。

伏克雷斯库一家三代都是诗人。耶纳基泽·伏克雷斯库（1740—1797）从一开始就希望伏克雷斯库的子孙们“发展罗马尼亚语言/对祖国赤胆忠心”。在他创作的大量爱国诗和抒情诗中，短诗《花园中》常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一座花园中，
在一棵树干旁
我看见一朵花儿——恰似绚烂的光芒。

摘下它，它会枯萎！
留下它，我又惟恐
别人会将它采走。

这首诗据说是作者读了歌德的诗后，有感而发写的。诗人用象征的手法将一位热恋者错综复杂的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

耶纳基泽的孙子杨库（1791—1863）是伏克雷斯库家族中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路子很宽，抒情诗、叙事诗、田园诗、哀歌、颂歌等都写得十分出色。他是罗马尼亚古典主义诗歌的开拓者。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1

十九世纪上半叶，民族意识在欧洲的觉醒也直接影响了罗马尼亚历史和文学的进程。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实现祖国统一、摆脱异族统治的呼声日益增高。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顺应历史的潮流于 1848 年发动了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革命因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而遭失败，但它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却波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学者格尔奥基·拉泽尔(1779—1823)和格尔奥基·阿萨奇(1788—1869)充分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费尽周折，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创建了罗马尼亚语学校，从而为罗马尼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刊的出现无疑是罗马尼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829 年，著名作家依昂·海列亚德·勒杜列斯库(1802—1872)在布加勒斯特创办了《罗马尼亚信使报》。这是第一份罗马尼亚文报刊。海列亚德大力宣扬民族意识，积极译介优秀的外国作品，真诚培植后起之秀，成为十九世纪罗马尼亚文化界杰出人物之一。继海列亚德之后，历史学家米哈依尔·科格尔恰努于 1840 年创办了《达契亚文学》。当时的许多文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都在这份刊物上得到了广泛的介绍。之后，又有《罗马尼亚蜜蜂》、《思想、心灵和文化》等报刊问世。这些报刊为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园地。

从这一时期起，罗马尼亚文学开始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像一朵朵争奇斗艳的花卉，装点着文学世界。

2

十九世纪上半叶，罗马尼亚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以各自独特的光辉照耀着缪斯的空间。其中有一颗格外地引人注目，那就是被诗人爱明内斯库尊为“诗歌之王”的瓦西里·阿列克桑德里(1821—1890)。

阿列克桑德里生于巴格乌城一个开明官僚的家庭。童年在秀美如画的乡间度过。他从小就迷恋民间诗歌和神话故事。由于家境富裕，他先后在国内和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极希望他将来成为医生或律师，可他在巴黎留学时，却一时难以对枯燥乏味的医学和法律产生兴趣，几次努力，均未获得学位。最后他几乎放弃了专业的学习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文学阅读和创作上。他的处女诗作便是在巴黎写成的。回国后，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文学事业之中：为《达契亚文学》出谋划策，参加国家剧院的领导工作，创办文学刊物，很快便名声大振，跻身于当时最著名的作家的行列。在以下几行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当时他心中的激情：

我看到太阳
降落到深深的海底，
它那燃烧的峰顶
犹如火山般升起。

当 1848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罗马尼亚大地时，阿列克桑德里以诗人的敏感意识到这场革命的积极意义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他真诚地为民主和自由而欢呼：“自由已点燃一轮骄傲的太阳”。革命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重新踏上祖国大地时，他壮志未减，又为祖国的统一而英勇奋斗。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罗马尼亚的觉醒》一诗中，诗人大声疾呼：

你们为何沉睡不醒，毫无动静？
睡梦中你们可曾听到
胜利的欢呼声
从觉醒的世界传出……

1855 年，他亲手创办的《罗马尼亚文学报》刚一出版便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这份文学报刊之后一直是罗马尼亚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收集整理而成的两卷本《罗马尼亚民间诗歌》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罗马尼亚第一部民间诗歌汇编，在文学界反响很大，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对民间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53 他的第一部诗集《多依娜和铃兰》问世。他创作的诗歌《统一霍拉舞》被谱成了歌曲，成为广泛传唱的战歌。1860 至 1880 年间，诗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的丰收。《田园诗》（1868—1869）、《传说》（1872—1876）、《我们的战士》（1878）等诗集丰富着罗马尼亚诗歌园地。海内外一致公认他为罗马尼亚最大的诗人。评论界索性将 1840—1880 年称为“阿列克桑德里时代”。

除诗歌创作外，阿列克桑德里在散文和戏剧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散文集《一个金币和小钱的经历》以新颖的手法、幽默的口吻、自然的笔调描绘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摩尔多瓦社会生活的全貌。讽刺喜剧《吉利查太太在雅西》、《吉利查太太在外省》是罗马尼亚戏剧史上最早的剧作。

作为诗人，阿列克桑德里最大的贡献便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给罗马尼亚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巧妙地从小民间诗歌和神话故事中吸取养分，创作出了真正富有罗马尼亚特色的诗歌。

在整整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阿列克桑德里发表了四卷诗歌、六卷戏剧、一卷散文，还有无数计的随笔、杂文等，为罗马尼亚文学献上了一份美丽的礼物。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诗人中，除阿列克桑德里外，重要的还有亚历山德雷斯库、博林迪尼亚努、鲁索，他们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片灿烂的星空。

格里戈雷·亚历山德雷斯库（1810—1888）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一改早年阴沉灰暗的诗风，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力的诗篇。其中脍炙人口的有歌颂老米尔恰大公抗击侵略者的《米尔恰的影子》。

迪米特里耶·博林迪尼亚努（1819—1872）在 25 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二十倍诗集。他的代表诗作有《斯特凡大公的母亲》、《米哈依大公的最后一夜》等。

阿列库·鲁索（1819—1859）在诗歌、评论和语言学方面均有建树。叙

事诗《歌唱罗马尼亚》(1850)是其代表作。诗人在诗中盼望着有朝一日“在田野和山坡上,朵朵鲜花为苦难的人民盛开”。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1848年民主革命前后诗坛的主要流派。但这两种流派之间有时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共同辉映着诗的天地。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同时受到这两种流派的熏陶。

3

罗马尼亚小说史始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时,一批献身文学的作家们在大量译介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古典名著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开始探索小说艺术的奥妙。作为初学者和拓荒者,他们的小说虽然情节还过于简单,人物尚不够饱满,但毕竟为罗马尼亚文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在这些拓荒者中,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以下几个名字:内格鲁兹、菲利蒙和奥多贝斯库。

科斯塔凯·内格鲁兹(1808—1868)出生于雅西地区一个富裕地主的家庭。其父爱好文学并有丰富的藏书。内格鲁兹很小就开始博览群书,文学、历史、地理样样都读。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他十岁左右就初步掌握了希腊文、法文和俄文。十四岁时,他在基什勒乌与流亡中的俄国大诗人普希金邂逅相遇。两人很快便成为好友。普希金同这位小弟弟谈诗、谈小说、谈民歌,一种对文学艺术的迷恋之情在年幼的心灵中油然而生。随后,内格鲁兹便开始翻译伏尔泰的作品。二十三岁时,登上文坛,从此各种文学报刊上便会常常出现他的名字。内格鲁兹什么都写,但他的主要成就依然在小说方面。他早期发表了两部小说《佐埃》(1837)和《赛马》(1840)讲述了两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内格鲁兹的扛鼎之作无疑是历史小说《亚力山德鲁·拉普什尼亚努》。这部小说取材于乌雷凯的编年史《摩尔多瓦公国纪事》,叙述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君主的故事。小说结构紧凑,气势恢宏,语言生动,被誉为罗马尼亚第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小说。而内格鲁兹的名字在文学史上往往同这部小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顺便一提的是内格鲁兹还被公认为罗马尼亚书简体裁文学的创始人。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书简达十五年之久。他的书信集《白纸黑字》和《致友人书》内容丰富,文笔优美,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和美学素养。

尼古拉·菲利蒙(1819—1865)出生于布加勒斯特一个牧师家庭。因其父不幸早逝,菲利蒙十岁时便迫于生计,外出挣钱。他先后从事过教堂歌手、文书等职业。菲利蒙对音乐的爱好似乎与生俱来。可以说,正是对音乐的痴恋使他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刚开始,他写音乐报道、音乐评论、音乐剧,尔后才逐步对小说发生了兴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新老土豪们》讲述了一个投机钻营者的故事。纨绔子弟迪努通过后门谋得了一份美差。由于他工于心计,巧于钻营,很快便青云直上,登上了御膳大臣的宝座。他整日花天酒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然而好景不长。最后他终因抢劫他人财产而锒铛入狱。总的来看,《新老土豪们》是一部具有一定水平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意通过这部作品来宣传一个朴素的真理:恶有恶报。作者最大的成功之处便在于成功地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极富地方色彩的特殊氛围。读了这部小说,每个罗马尼亚人都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罗马尼亚小说。

亚历山德鲁·奥多贝斯库(1834—1895),小说家和杂记家。他曾写过两部历史小说《暴君米赫尼亚》和《吉亚日娜夫人》。但这两部小说由于情

节简单，人物单薄，描写粗糙，并未在文化坛引起什么反响。使他名声大振的却是他为作家康斯坦丁·科尔内斯库的《猎人手册》所写的序言——《伪猎人日记》。这篇被称为“艺术万花筒”的奇妙文章涉及面极广，诗歌、民间文学、雕刻、建筑、绘画、音乐等无所不谈，作者深厚的知识功底显而易见。奥多贝斯库在《伪猎人日记》的开头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唯一的一次“狩猎史”。那次“狩猎”的结果是打死了许多小小的麻雀。紧接着，他将笔锋转向了辽阔的巴尔干平原、兴旺的乡村酒店、丰富的民间习俗、奔放的山洞壁画。尔后，他又在文中穿插介绍了拉马丁、拜伦、席勒、缪塞、果戈理、屠格涅夫等外国大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文中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将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伪猎人日记》开创了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史。因一篇序言而一举成名，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奥多贝斯库却成了这样的“幸运者”。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戏剧史拉开了帷幕。著名作家和教育家海列亚德和阿萨奇不畏艰难，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组织演出。最初上演的大多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伏尔泰、莫里哀和拉辛等人的剧作。

阿列克桑德里、科格尔尼恰努和内格鲁兹于1840年共同领导雅西国家剧院后，更注重戏剧的艺术性和民族性。阿列克桑德里曾反复强调“戏剧不是玩偶，而是艺术”。他们除了上演法国优秀剧目外，还亲自命笔，撰写剧本。阿列克桑德里创作的讽刺喜剧《吉利查太太在雅西》（1850）和《吉利查太太在外省》（1852）上演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剧院的保留节目。多才多艺的著名作家哈西德乌（1838—1907）也写了《勒兹万和维德拉》（1867）等富有新意的剧本。卡拉迦列·米洛等一批专业演员和戏剧家的涌现更使罗马尼亚戏剧锦上添花。

科斯塔凯·卡拉迦列（1813—1877）是罗马尼亚大戏剧家依昂·卢卡·卡拉迦列的叔叔。他曾上过表演学校，当过演员，后又长期担任过雅西国家剧院的导演。184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剧本《愤怒者》。之后又有《莱奥尼尔》（1841）、《摩尔多瓦的一次排练》（1844）等剧本问世。其中《摩尔多瓦的一次排练》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作者有意识地在剧中摆脱法国戏剧的影响，增加了许多民族色彩，使观众观看时感到亲切和清新。评论界认为这部剧作对了解罗马尼亚戏剧的起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马太依·米洛（1814—1896）从小便酷爱表演艺术。十岁左右开始演员生涯。1840年到法国研究戏剧艺术，结识了许多享有盛誉的法国演员。回国后，担任过剧院经理。他积极组织演出，不断丰富剧目，努力培养演员。他成功地组织上演了阿列克桑德里的剧本并因在剧中反串女主角吉利查太太而成为戏剧史上一段佳话。米洛在翻译、改编法国喜剧的同时，开始了剧本的创作。他的最出色的剧本《巫婆赫尔卡》（1848）是罗马尼亚第一部轻歌剧。该剧熔音乐、民歌、舞蹈、婚礼习俗为一炉，展示了一幅生动活泼的罗马尼亚乡村生活的画面，被誉为“具有神奇魔力的轻歌剧”。米洛的一生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演出许多戏，译过许多戏，写过许多戏，戏剧艺术成为他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因其在罗马尼亚戏剧史上所起的先锋作用，米洛享有“罗马尼亚的莫里哀”的美称。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文学中，文学团体“青年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青年社”于1863年在文化名城雅西成立。举办文学和哲学讲座、组织文学朗诵会、开展文化讨论、编辑文学报刊是该社的主要活动内容。“青年社”于1867年创办的《文学漫谈》杂志很快便成为最负盛名的文学刊物之一。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作家都为它撰过稿。“青年社”积极探寻真理，努力发掘生活中一切美的东西，重视民间文学的精华，反对在文学中使用晦涩难解或学究气十足的语言，主张文学语言的纯朴化。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

谈到“青年社”，总会不由得使人想起马约雷斯库这个名字。文学评论家、美学家和政治家蒂图·马约雷斯库（1840—1917）一直是“青年社”的核心人物。他曾先后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上完中学和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和校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曾一度将他推上内阁大臣和首相的高位。

马约雷斯库主持“青年社”的工作后，遂以《1867年以来的罗马尼亚诗歌探讨》、《罗马尼亚诗歌和散文的新方向》、《卡拉迦列先生的喜剧》、《爱明内斯库及其诗作》、《自相矛盾》等论文奠定了“青年社”的文化、文学和美学思想基础。这些论文在文学界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轰动。马约雷斯库和“青年社”的声望也与日俱增。马约雷斯库是罗马尼亚第一位将艺术同科学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论论家。他认为艺术不同于科学、伦理学、历史和政治。科学通过抽象概念反映自然的本质，探寻客观规律。艺术则表现人们对自然的主观理解。艺术不能和概念同日而语，艺术意味着热情和感觉，而这些都是永恒的。美是艺术的基础。在谈到文学作品和读者的关系问题时，马约雷斯库指出，文学作品能把读者带入“理想的境界”，使读者摆脱私欲，忘却自我，从而间接地对读者产生深刻的伦理影响。马约雷斯库还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是根本所在。他的文艺观为他赢得无以数计的知音，同时也给他树起相当一批的论敌。文学理论家盖理亚就同马约雷斯库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论争，指责他宣扬“为艺术而艺术”。

马约雷斯库对罗马尼亚文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发现并培植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家：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克莱昂格、斯拉维奇、科什布克等、他们以辉煌的天才为罗马尼亚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文学史家们索性将这一时期称作“经典作家时期”。

2

他常常独自站在菩提树下，翘首凝望遥远的星空。从他那略带忧伤的表情中流泻出的美丽的孤独打动了星星，打动了湖水，打动了摇曳的树林。于是，一缕飘忽的箫声为他传来了缪斯的问候；于是他顺手拿起一根树枝，在大地上写下了一行行浪漫的诗句……

他就是米哈依·爱明内斯库。

爱明内斯库 1850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博托夏尼一个小业主家

庭。由于家中藏书丰富，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伏尔泰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人们常常看到他手捧一本书，或倚着白杨树，或坐在山泉旁，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如诗如画的乡村景色吸引着一颗幼小的心灵。他在树林间、草地上，池塘旁、田野中编织过多少梦幻！在他童年岁月留下美丽的印痕的还有无数古老而神奇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甚至有一段时间，听老人们讲故事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他性格中自由奔放的一面在中学期间表现了出来。当时他实在忍受不了学校里呆板的纪律和单调的生活，曾逃离学校，随一剧团周游全国。1866年，十六岁的爱明内斯库在《家庭》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爱情诗《假如我有……》，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869年，在经历了6年的流浪生活后，爱明内斯库遵从家父的意见，前往奥地利深造。他在维也纳攻读了哲学、历史、法学、政治经济学和解剖学。维也纳使他拥有许多美妙的瞬间。他写过不少诗，反映这段难忘的经历。1872年又来到柏林继续学习。在此期间，有机会欣赏到歌德、席勒、海涅等德国名作家的杰作。1874年，爱明内斯库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雅西，他先后担任过图书馆长、学校督导、杂志编辑职务。尔后，来到布加勒斯特，任《时代报》杂志编辑。1883年，诗人不幸患上精神病，从此再也没有痊愈。该年年底，他生前唯一的一本诗集，由于马约雷斯库编辑出版了。这给予他莫大的慰藉。1889年6月15日，年仅三十九年的爱明内斯库永远地睡着了。三天后，友人们冒着蒙蒙细雨将他安葬在贝鲁公墓，墓地的两则一棵菩提和一棵松柏静静地陪伴着诗人。

爱明内斯库在短促的、不幸的一生中，凭着辉煌的天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诗歌。他首先是一位爱情的歌手。他创作的《蓝色的小湖》、《愿望》、《当回忆》等优美动人的爱情诗一直被广为传诵。他的爱情诗往往散发着来自宇宙的神秘气息，从而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深邃含义。《星星》一诗便充分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通向刚刚升起的星星
是条漫长漫长的道路，
经过千万年的时间
星光才闪现在我们眼前。

也许星星早已熄灭
在那湛蓝湛蓝的远空，
但它美丽的光芒
此时才照亮我们的视野。

死去的星星的形象
缓缓地显示于高空。
当它存在时，我们看不见，
如今见到它，而它早已陨灭。

同样当我们的思恋
消失在深夜的时候，
熄灭的爱的光芒

依然会追随我们的心灵。

自然也是诗人反复吟唱的永恒主题。山谷、田野、星星、小溪、湖水、树林是他诗中出现得很多的词汇。美丽的自然常常是诗人灵感的源泉；神奇的自然一直是诗人向往的归宿。融入自然对于诗人而言便意味着进入永恒，于是，诗人只有一个愿望：

我还有个唯一的愿望：
在夜的静谧中
让我悄然死去，
头枕辽阔的大海，
让我缓缓入梦，
躺在树林的旁边，
在无垠的海面上
让我拥有晴朗的天空。
我不需飘扬的旗帜，
也不要豪华的棺木，
但愿你们用嫩绿的树枝
为我织一张温馨的小床。

爱明内斯库对自己的祖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在异国他乡留学时，随着距离的拉开，这种情感便变得更为浓烈。在《我对你有什么愿望呢，亲爱的罗马尼亚》一诗中，诗人沉得祖国美丽得像“年青的新娘”，慈祥得象“自己的母亲”。正因为爱得深切，他才真诚地希望祖国“永保罗马尼亚的精神，手握强有力的武器”并且永远“英勇、豪迈而又壮丽”。

哲理长诗《金星》是爱明内斯库的代表诗作。这首长诗讲述了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从前有位出身高贵的姑娘，名叫克特琳娜，犹如月亮一般美丽无比。她时常独倚窗旁，眺望着远空的名叫许彼里昂的金星。金星从海上升起，在波涛翻滚的航道上，用自己的光芒为帆船指引航向。姑娘望着金星，金星也看到了姑娘。在相互长久的凝望中，爱情在悄悄地萌发。姑娘柔声细语地说：“温柔的金星，乘着一线光芒，降临人世吧！”金星颤栗着，立即回答了她的召唤：“抛弃你那个尘世，愿你做我的新娘。”他们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地互相呼唤着。姑娘无法踏上金星开辟的路径，因为她觉得天空固然美丽，但却缺乏生气。于是，金星决定飞向上帝，请求放弃永生，回到尘世。就在这时，狡猾的侍童克特林却在打着姑娘的主意。一次，当克特琳娜来到他面前时，她一把搂住姑娘，说尽了甜言密语，向她表达爱情。克特琳娜既想拒绝，又想放任自己。金星飞到上帝面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而上帝让他转过身去，望一望等待他的是什么。金星许彼里昂从空中转过身来，惊讶地看到克特琳娜正和一个少年在柔和的月光下卿卿我我。姑娘沉醉于爱恋之中，她抬起头来，看见了金星。渐渐地，她的心里又充满了对金星的柔情。但失望至极的金星再也没有降临。他闪着苍白的光芒，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们生活在狭隘的尘世/任凭命运的摆弄，/而我在我的天宫中，/感到永生不灭但又凄凉无比。”

诗人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创作出这首杰出的长篇哲理诗，使他的诗歌创

作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诗人从民间传说中吸取灵感，富有创造性地把天空中的金星拟人化，并赋予他一个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神一模一样的名字——许彼里昂。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长诗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它旨在表现天才的命定的孤独。天才的情感无法为凡人所接受，天才的理想难以在尘世实现，天才时刻不停地闪耀着光芒，照亮了茫茫黑夜，而自己却难免凄凉无比的命运。了解一下爱明内斯库的生平，我们可以注意到金星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自身境遇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怀才不遇，尽管创作了无以计数的辉煌诗作，但却知音难觅，很少得到别人的赏识，唯有一本诗集在生前出版。在情感上，他也有着和金星一样的遭遇。他曾经真诚地爱过一位女诗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恋了。爱明内斯库的才华恰恰表现在从自身的经历及社会现实中发掘出了永恒的主题，并用艺术语言和手法出色地表达了出来。正因如此，爱明内斯库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享有“诗坛金星”的美称。

爱明内斯库继承并极大地丰富了罗马尼亚诗歌传统，他的诗作无论在韵律、节奏、意象和语言表现力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湛程度，成为“罗马尼亚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许多已被谱成歌曲或收入各种课本和读物，在罗马尼亚广为流传。

罗马尼亚当代诗人马林·索雷斯库用诗的语言这样赞美爱明内斯库：

爱明内斯库并未存在。

只有存在一个美丽的国度，
紧靠着无垠的大海，
那里，波涛织出白丝
就象国王未经梳理的苍髯。
只存在一片湖水，恰似流淌的树林，
月亮在水中筑有旋转的巢巢。
还存在几棵菩提
和两个恋人，
他们懂得怎样将整朵鲜花
揉进一个亲吻。

还有一些鸟和云，
它们在空中自由流浪，
宛如长长的流动的平原。

所有这一切
都必须拥有一个名字，
唯一的一个名字，
人们就叫它们
爱明内斯库。

的确，爱明内斯库已融进了大海、湖水，已变成了菩提、白云，已成为宇宙中一切美的象征。因此，爱明内斯库已不仅仅作为个体存在，他是诗，

他是美，他是永恒。

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依昂·克莱昂格（1839—1889）的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故事和童话。这位出身贫寒的作家似乎应该感谢他的位于摩尔多瓦的家乡，那是个景色宜人的山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话和故事以及丰富多采的民间习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讲故事的才华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同罗马尼亚大多数作家相比，克莱昂格并没有高深的学历。他幼时由于家境贫寒而迟迟不能上学，后来，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但中学未毕业便当上了教师。教师工作对于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他一下子拥有了讲坛，拥有了那么多的听众。克莱昂格很不喜欢当时那些深奥难啃、脱离实际的教科书。他干脆自己动手，现编了一套教材，结果竟大受学生们的欢迎。诗人爱明内斯库当学督时认识了克莱昂格。发现他的特殊文学天赋后，爱明内斯库立即鼓励他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并介绍他加入“青年社”。评论家马约雷斯库也极为欣赏克莱昂格的才华。他在自己主持的《文学漫谈》杂志上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克莱昂格的故事、童话和小说。于是，文坛上又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

克莱昂格的作品幽默、机智而又不失简朴。而这种令人赞赏的简朴实际上基于对生活深刻的了解。克莱昂格熟悉季节的每一丝微妙的变化，熟悉丰富多采的民间传统和习俗，熟悉农民和手艺人使用的每一件工具。因此，他总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切。他还知道狗熊藏在哪儿，小鸟何时起飞，国王的女儿为何要躲到月亮里。因而他的童话总能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的世界。最为重要的是他太了解普通百姓了，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品质，他懂得如何展示这些普通人的精神生活。

回忆录《童年的记忆》代表了他的创作高峰。该书共分四部分，前三部分于1880—1881年间出版，最后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才得到发表。从作者颇为动情的笔调中，我们不难看出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最难忘的时光”。家乡的山坡，简朴的学校，温馨的小院，茂密的森林在克莱昂格的笔下都成为一幅幅意境隽永的水彩画。他还写到了亲人，写到了乡邻，写到了许许多多朴实无华的农人。他精心塑造的母亲斯玛兰达纯朴、刚毅、勤劳、善良的形象往往会让读者感动不已。《童年的记忆》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情节，有的只是通俗生动的民间口语，有的只是富有人情味的讲述。正是这种纯朴和自然使它成为罗马尼亚文学中一部熠熠生辉的经典之作。

克莱昂格于1881年出版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童话集》已成为一代又一代罗马尼亚人百读不厌的佳作。在一则则生动有趣的童话中，作者塑造了许许多多变幻莫测而又真实可信的神奇人物和动物形象，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但又极具特色的自然景色，讲述了一段段扣人心弦但又不乏寓意的故事。作者还巧妙地民间流传的五花八门的谚语、轶事、传奇和歌谣揉进了这些童话中，从而使它们更具民族特色和乡村色彩。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他们最长的童话《真假太子》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断：

小太子明白自己已无路可走，无计可施，只好答应事事顺从光脸，听天由命。于是，光脸便将小太子的信、钱和武器统统夺了过来，占为己有，然后放小太子出了井。接着，

他命令小太子吻一下剑，逼迫他遵守刚刚发过的誓言。“从今往后，我就叫你白奴哈拉普，你已没有第二个名子了。”光脸对小太子狠狠地说。

随后，他们各自骑上马，光脸当主仆，走在前头，哈拉普为侍从，跟在后面。

他们向着遥远的王国走去。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小太子。

他要走的道路还很长很长，

您要听的故事还很长很长。

他们走啊走，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程，渡过九片海洋，路过九个国家，越过九条大河。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了那个王国。

克莱昂格因其出色的作品而被誉为同爱明内斯库和卡拉迦列齐名的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

4

1885年，当卡拉迦列将最后一部喜剧《狂欢节》呈现给读者时，他才刚满三十三岁，但已然在文学生涯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成为当时声望极高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依昂·卢卡·卡拉迦列（1852—1912）生于普洛耶什蒂附近一个乡村。他的家庭似乎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律师的父亲青年时代曾一度迷恋戏剧。两位叔叔科斯塔凯和约尔古都是有名望的演员和戏剧家。这种家庭氛围显然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卡拉迦列只上过四年学，后因家庭陷入困境而被迫辍学谋生。他的阅历太丰富了，早年当过舞台提词员、家庭教师、校对，后来又任过编辑、剧院经理等。曲折的生活经历反而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素材。

卡拉迦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戏剧方面。他创作了《暴风雨之夜》（1879）、《列奥尼达先生面对反动派》（1880）、《一封丢失的信》（1884）等在罗马尼亚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讽刺喜剧。其中《一封丢失的信》无论在艺术性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不愧为一部难得的佳作。

该剧剧情如下：某县城即将举行“民主选举”。县长与保守党地方组织头目特拉哈纳凯相互勾结。他们有权有势，自以为稳操胜券。不料，选举前夕，特拉哈纳凯的妻子将县长写给她的情书弄丢了。这封信落入了自由党头目卡察温库斯的手中。他以公布信件相威胁，逼迫县长和特拉哈纳凯支持他当候选人。正在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卡察温库斯掌握的那封信却又不翼而飞了。于是，形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他们尔虞我诈争权夺势之际，中央指定的候选人到达了。原来这个不学无术、老态龙钟的候选人也是由于掌握某要人的隐私，依靠要挟当上候选人的。最后，两派只得互相妥协，共同“支持”中央派来的候选人。一场所谓的“民主选举”便鸣锣收场了。作者在这部剧中以辛辣尖锐的笔锋、曲折多变的情节、妙趣横生的语言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他的其他几部剧作也大都充满了无情的讽刺和深刻的内涵。从他的剧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积累、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湛的艺术功底。

卡拉迦列同时还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讽刺作家。他的小品和小说短小精悍，构思巧妙，充满了犀利的讽刺和苦涩的幽默，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有许多相同之处。短篇小说《酷热》中有这么一段讽刺味十足的对

白：

绅士：主人在家吗？

仆人：在家，不过他吩咐过我，一旦有人来访，
就说他到乡下去了。

绅士：去禀报一声，我来了。

仆人：这可不行，先生。

绅士：为什么？

仆人：他锁上房门了。

绅士：你去敲一下门，他会开的。

仆人：哦，他出门时把钥匙带走了。

绅士：那么说，他的确出门了？

仆人：不，先生，他没有出门。

绅士：我说朋友，你简直象个……白痴！

仆人：我可不是，先生。

绅士：你刚刚说了，他不在家。

仆人：他在家，先生。

绅士：你不是说他出门了吗？

仆人：不，他没有出门。

绅士：那么，他在家。

仆人：不，他不在家，但他并没有去乡下，他只是出去溜溜达达。

绅士：去哪儿呢？

仆人：进城了。

绅士：哪儿？！

仆人：就在布加勒斯特。

绅士：那就告诉他，我来过了。

仆人：请问尊姓大名，先生。

绅士：这同你有何相干？

仆人：好向他禀报呀！

绅士：禀报什么？既然我没有将向他传达的内容告诉你，你能禀报什么呀？先等我告诉你吧，不要着急……他回来时，你就对他说有人找过他了……

仆人：谁找过他？

绅士：我。

仆人：您的大名，先生？

绅士：不必了。他认识我……我们是朋友……

资产阶级贵族和市侩的愚蠢、琐碎和无聊在这段对白中被揭露得淋漓尽致，真令人拍案叫绝。

卡拉迦列的矛头一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和当时的反动政府，这给他招来了种种非难和打击。1904年，他被迫离开祖国，客居柏林，最后竟死在异国他乡。然而反动政府对他的迫害反而增加了他的声望。人们普遍称他是“一只眼睛笑，另一只眼睛哭的文学大师。”

二十世纪的文学

1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罗马尼亚文学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不断地与世界文学相碰撞、相融合。作家们都努力用一种现代化的语言和手法来反映历史、反映社会，反映人在各个时期的特殊心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直在罗马尼亚文学领域独占鳌头。从雷布列亚努，到萨多维亚努，再到普列达，罗马尼亚小说基本上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的。当然，在现实主义的主流中，也时常出现一些反传统的现代派倾向。杜·拉·波佩斯库的作品便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世纪罗马尼亚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尤为发达。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尼亚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具有深刻的了解。几位重要小说家的成名作几乎都是农村题材的作品。

小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样反映在戏剧领域。两次大战间最著名的剧作家塞巴斯蒂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罗马尼亚戏剧前进了一步。到了五、六十年代，戏剧像其它文学领域一样受到了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只是在最近 20 年中，罗马尼亚戏剧才逐步摆脱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单调模式，开始朝着符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方向前进。倘若说奥雷尔·巴朗格等剧作家只是在没有彻底背离现实主义的前提下革新了戏剧语言，那么，马林·索雷斯库和杜·拉·波佩斯库则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结构引入了戏剧，使戏剧语言来了个彻底的现代化。他们的剧作常常显得荒诞不经，充满了寓言、象征和朦胧色彩。每一部剧作都似一个斯芬克思之谜，需要读者运用智慧、阅历和知识去猜、去想、去绞尽脑汁。

多种流派并驾齐驱，多种风格争相辉映形成了本世纪罗马尼亚诗歌的主要特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文艺理论家、诗人亚历山德鲁·马切东斯基倡导的象征主义于 1908 年进入繁荣时期，主要代表诗人为乔治·巴科维亚。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文学中出现了抒情诗的繁荣阶段。图道尔·阿尔盖济、卢奇安·布拉加等诗人在形式、意境、语言诸方面均有创新，写出了许多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诗作。五十年代，教条主义曾在文坛横行。当时，阿尔盖济、布拉加等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被彻底否定。唯有革命诗才被算作诗的正宗。那一阶段，诗歌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罗马尼亚诗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恢复了抒情诗的传统。一批后起之秀登上了诗坛。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将诗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水准。于是，六十年代后期，“抒情诗的爆炸”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尼基塔·斯特内斯库、马林·索雷斯库、安娜·勃朗迪亚娜代表着罗马尼亚当代诗坛的主要方向。

2

在二十世纪罗马尼亚小说中，雷布列亚努、萨多维亚努和普列达无疑是众多小说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们分别代表了罗马尼亚小说的几个辉煌的时刻。

利维乌·雷布列亚努（1885—1944）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个教师家庭。特殊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掌握了德语和匈牙利语。中学毕业后曾被派往布达佩斯军事学校学习。1905年，雷布列亚努在军中服役，然而爱好文学的他与军队生活始终格格不入。几年后，他坚决辞去军职，回到故乡，从事写作。1909年，他跨越喀尔巴阡山，来到布加勒斯特，进一步开拓文学事业。

雷布列亚努先写短篇，后作长篇。但他在罗马尼亚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奠定的。他实际上是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的创始人。第一部长篇《依昂》（1920）中的主人公依昂没有土地，贫困潦倒，为了占有土地，他决心不择一切手段。他抛弃自己的恋人，投入到富农女儿的怀抱中并因此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土地。缺乏爱情的婚姻很快令他生厌了。他百般虐待妻子，致使她自尽身亡。一旦拥有土地，爱的呼声便又一次在他心中响起。他重新去追求昔日情人，结果却被情敌杀死。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揭示了农民与土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本世纪初罗马尼亚农村生活的生动画面。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起义》（1932）是罗马尼亚第一部反映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宏篇巨制。这部小说背景广阔，人物众多，结构精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

总的来说，雷布列亚努的小说朴实自然，毫无雕琢，散发着浓浓的土地的气息。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安·高加（1881—1938）这样写道：“我看到自己站在一片无垠无际的新耕的田地里。大片黑油油的，因深耕而翻起的泥土正凝望着我。那就是雷布列亚努的小说。土地在诉说。”

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1880—1961）在两次大战间的罗马尼亚文学中一直独领风骚。他出生于摩尔多瓦地区一个律师家庭。自幼酷爱文学。听故事、读小说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两大乐事。中学毕业后，入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法律。后因服兵役而辍学。服役满期后，干过杂志编辑，当过剧院经理。1929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萨多维亚努1897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人民贫困的境况。1904年对于他说真是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他一连推出了《故事》、《肖依姆》、《难忍的痛楚》、《布列库老汉的酒馆》四部小说集。评论家约尔加索性称1904年为“萨多维亚努年”。

之后，他的创作激情始终未减，差不多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问世。《泥棚户》（1912）、《漂来的磨坊》（1915）、《安吉察客栈》（1928）、《斧头》等优秀小说的出版更使他声名大振。《斧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维多丽娅是位纯朴而又刚强的农村妇女。他丈夫外出购羊，但却迟迟不归。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她的心头。她决定不顾一切，沿途寻找。经过千难万险，维多丽娅终于在荒山野沟发现了丈夫的遗骸。她确定有人为了谋财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凭着智慧，凭着山民的相助，维多丽娅最后查到了凶手，为丈夫报了仇。作者从神话《羔羊》中汲取灵感，写出了这部优美动人的中篇小说。作者并不仅仅想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现罗马尼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如诗如画的罗马尼亚景色和五彩缤纷的罗马尼亚民间习俗。

萨多维亚努的作品题材极广，古与今、现实与梦幻、乡村与城镇、自然与社会无一不成为他描写的对象。他极善于根据不同的题材而变换手法和语言。他的作品有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有自然主义、有象征主义。他的高

明之处便在于巧妙地将这些揉为一体。他在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所写下的百余部作品组合在一起便是一首宏伟的罗马尼亚民族史诗。萨多维亚努的名字在罗马尼亚文学中是不朽的。

马林·普列达（1922—1980），出生于特列奥尔曼县一个农民家庭。上完中学后，担任过校对和秘书。1952年起，任《罗马尼亚生活》杂志编辑。后升任副主编。1968年，当选为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副主席。1980年5月猝然去世。

普列达1942年登上文坛。194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四方来相会》问世。集子中的八篇短篇均以乡村生活为题材，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农民形象。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作者今后的长篇写作奠定了基础。真正确立普列达在罗马尼亚文坛重要地位的是长篇小说《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1955；第二卷，1967），这部宏篇巨制生动地展现了一幅罗马尼亚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被评论界誉为罗马尼亚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普列达也因此跻身于当代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小说家的行列。之后，他又创作了涉及工业领域的《不速之客》（1968）、描写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重性格的《伟大的孤独者》（1972）、探讨历史问题的《呓语》（1975）等长篇小说。其中《呓语》因受到前苏联《文学报》的猛烈抨击而更使作者声名大振。1980年春，普列达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三卷本巨著《世上最亲爱的人》为他的小说创作划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世上最亲爱的人》讲述了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维克多·佩特里尼在某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他结识了诗人尼古拉乌的妻子玛蒂尔达。维克多不禁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深深地打动了。玛蒂尔达同尼古拉乌早已同床异梦。在维克多身上，她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理想。黄昏后的相会，田野间的漫步，公园里的长谈使得维克多和玛蒂尔达双双坠入爱河。经过两年多的周折，他们终于正式结为夫妻。可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生活便出现了危机。维克多悲哀地意识到玛蒂尔达并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种理想的伴侣，而是一个情绪不定、自私自利、追求虚荣的女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为了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年轻的助教开始埋头于哲学研究。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卢齐安·布拉加的哲学思想以及处世态度使他深受启发。他在一篇题为《卑鄙者时代》的文章中指出人可以通过不断增强自己的悟性而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他的文章在大学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与玛蒂尔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的女儿茜尔维娅的出世也未能弥合两人的感情裂痕。一天，警察突然闯入他家，逮捕了维克多，原因是他被控参与了反革命匪帮“黑衫党”的阴谋。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维克多稀里糊涂地开始了铁窗生涯。他时常坐在阴暗的牢房里，追忆逝去的年华，剖析自己的灵魂，思索人生的真谤……经过三年多极为艰苦的劳改生活后，他刑满释放，回到家中。为了糊口，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然而却屡屡碰壁，因为他身上已永远地打上了刑满释放犯的烙印。出于无奈，他到灭鼠队当上了小工。玛蒂尔达抛弃了他，投入了一名要人的怀抱。几经磨难后，维克多在一家企业当上了会计。他同出纳员苏齐相爱了。苏齐是旧时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因受父母牵连而被开除出大学。相似的坎坷经历使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在一次外出滑雪时，维克多出乎意外地撞见了苏齐从未提及的丈夫彭恰。维克多受到攻击，被迫同彭恰格斗，彭恰从电缆车上摔进了山谷。维克多重又踏进监狱的大门。爱情又一次破灭了。等

待他的是无境无止的漫漫长夜……

《世上最亲爱的人》于1980年出版后，立即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人们争相购买传阅，报刊纷纷介绍评论。一时间，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世上最亲爱的人》。虽然小说引起了某些争论和非议，但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肯定和好评。不幸的是，小说出版后仅仅几个月，作者竟出乎意料地猝然死去，年仅五十八岁。普烈达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更加突出了《世上最亲爱的人》的影响。巨大的容量、深刻的哲理性、丰满的人物形象无疑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几大要素。整部作品就像一座庞大的立交桥，各种阶层的人物，各种社会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此交会通过。尽管小说的主线是维克多的几次爱情悲剧，但这条主线又引伸出无数条支线，涉及到教育、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因而敏感的读者并不把它仅仅看作一部爱情小说，而是称它为“无所不包的”广角式作品。在这部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小说中，作者的笔自由驰骋，成功地描绘了一幅“苦难的十年”（指五十年代，普列达语）中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全景。以文学的形式，如此全面地反思那个不正常的时代，普列达在这里实际上承担起了历史学家的重任。读着这部作品，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被介入一场对人生、爱情、理想、真理等的全面思考，小说中时有大段大段的人物独白和哲理性议论。由于作者很善于变幻叙述手法，回忆，倒叙、对话、内心独白都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这些大段大段的独白和哲理性议论并不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反而调动起读者的参与意识，让读者同主人公一起思索。小说主人公维克多是个有血有肉，有善有恶的立体人物。尽管他有种种弱点、弊病甚至卑劣面，但他身上散发出了强烈的精神力量。他始终坦然地用微笑迎接二连三的打击。“你可以消灭他，但你并不能使他屈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海明威所推崇的精神。作者意在通过描写特定时期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来揭示整个民族的悲剧，因为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世上最亲爱的人》已被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公认为“描写动荡时期由爱而生发的欢乐和灾难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使罗马尼亚小说前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初，罗马尼亚戏剧同小说和诗歌相比，发展得比较缓慢。戏剧舞台依然由十九世纪的一些剧作家的剧本占领者。直到三十年代，戏剧才出现了相对的繁荣。一批新人新作给戏剧舞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两次大战间最引人注目的剧作家当推米哈依尔·塞巴斯蒂安（1907—1945）。进入五十年代后，戏剧同政治联在一起，因而优秀剧作寥若晨星。当代戏剧的迅猛发展始于七十年代。一些有深度的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戏剧舞台。奥雷尔·巴朗格（1913—1979）、霍里亚·洛维内斯库（1917—）、马林·索雷斯库（1936—）、杜·拉·波佩斯库（1935）等作家都为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介绍一下杜·拉·波佩斯库，因为他的剧作在某种意义上还比较能代表当代戏剧的发展趋势。

杜·拉·波佩斯库（1935—）是当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生于比霍尔县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到克罗日城攻读医学。1956年又转入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曾在《星》月刊当过校对和编辑。1970年起担任《论坛》杂志主编。八十年代，曾长期担任过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主席。

波佩斯库以诗歌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后又致力于小说创作。1958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逃亡》出版。翌年，又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周》。这部小说讲述了星期一到星期天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背景广阔，人

物心理刻画细腻，充满喜剧色彩。从六十年代起，波佩斯库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F》（1969）、《过时的雨》（1973）等长篇引起广泛注意。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或手法上都突破了罗马尼亚文学传统的框架，描写的大多是转变时期各种错综的社会矛盾和内心冲突。手法上，他侧重心理描写，用近乎荒诞的结构来揭示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对立。这些倾向同样反映在了他的剧作中。他的主要剧作有《无望的爱之夏》（1966）、《这些悲哀的天使》（1969）、《除夕夜之猫》（1970）、《飞鸟莎士比亚》（1973）等。他的剧作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让我们来看一看《除夕夜之猫》。

该剧剧情是这样的：除夕之夜，奥雷尔家中的酒宴正在热闹地进行。奥雷尔手拿餐叉，站在椅子上指挥着大家齐唱《茶花女》。在场的人中有疯人院院长普拉东，奥雷尔的胞弟、精神病患者维克多，奥雷尔的放荡不羁的妹妹齐尔达，他们的母亲以及舅舅埃利泽乌等。正在他们欢度除夕时，奥雷尔的父亲图道尔却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二十年前，图道尔被控犯有反革命判国罪而锒铛入狱。如今他已刑满释放，还带着一个哑巴朋友回到家中。图道尔的归来使埃利泽乌胆战心惊，当着众人的面，图道尔揭露了埃利泽乌当年诬告陷害他的卑劣行径。一直厌恶舅舅的齐尔达也鼓起勇气讲出了她甘于坠落的原因。正是埃利泽乌使她走上这一步的。出于羞愧和恐惧，埃利泽乌走进厕所上吊自杀了。对于父亲的出现，奥雷尔也很不高兴。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的罪名，他受尽了种种的歧视。如今他好不容易混进上层社会，父亲又出现了。于是，他首先拒绝承认自己的父亲，将他赶出家门，然后竟心狠手毒地将他压死了……

波佩斯库的剧作被称为后易卜生戏剧，不受舞台空间限制，大多采用荒诞和象征的表现手法。《除夕夜之猫》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剧尽管时间跨度极小，仅在除夕之夜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展开，但容量却极大。它实际上展现了罗马尼亚整个民族极权时期所遭受的灾难。这出家庭悲剧无疑深深地刻着时代的烙印。剧中人奥雷尔绝望地说：“我们都是一串肉泥肠！时间绞碎了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还有人格的话，时间把我们混合在一起，加上佐料，经过熏制，成为被人吞食的佳肴！”

4

对于罗马尼亚文学而言，二十世纪显然更是诗的时代。尤其在近几十年，当小说和戏剧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诗歌却一直如暗流般悄然奔突，激起了一朵又一朵美丽的浪花。走进二十世纪罗马尼亚诗苑，我们看见了沉思的布拉加，看见了飞翔的斯特内斯库，看见了衣著随便的索雷斯库，看见了多愁善感的勃朗迪亚娜，还看见了许许多多光彩熠熠的诗人。

卢齐安·布拉加（1895—1960），罗马尼亚文化史罕见的集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杂文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出生于阿尔巴县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童年在美丽的乡村中度过。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和哲学的好奇心。中学毕业后，考入西比乌神学院。后又到维也纳攻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到罗马尼亚克罗日市定居。1926年起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外交生涯，先后到过许多国家。1936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布拉加在哲学、美学、戏剧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但他在诗歌方面成就

最大。出版了《光明诗篇》（1919）、《先知的脚步》（1921）、《睡梦颂歌》（1929）、《分水岭》（1933）等十余部诗集。

当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危险：他的诗作很容易成为某种图解，很容易充满说教。而布拉加却巧妙地将诗和哲学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哲学思想的“诗化”。他认为宇宙充满了神秘。哲学的任务是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而诗歌的使命则是不断地扩大神秘的范围。于是，在《我不践踏世界的神奇花冠》中，诗人决心：

我要用我的光明扩展世界的神秘——
一如月亮用它的光华
颤悠悠地增加，而不是缩小，
夜的奥妙。

布拉加坚信，万物均具有某种意味，均为某种征兆。在他的笔下，“光明”象征生命，“花冠”象征存在，“风”代表摧毁者或预言者，“雨”则是忧郁和悲伤的源泉，而当“雨”变成“泪一般的水滴”时，就已然成为忧郁本身了。请看《忧郁》一诗：

流浪的风擦着窗上
冷冰冰的泪。雨在飘落。
莫名的惆怅阵阵袭来
但所有的痛苦，
所有我感到的痛苦
不在心田，
不在胸膛，
而在那流淌不息的雨滴里。

作为哲学家—诗人，布拉加的目光敏锐而深邃。他很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然后又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短诗《三种面孔》形象地道出了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特质。

儿童欢笑：
“我的智慧和爱是游戏！”
青年歌唱：
“我的游戏和智慧是爱！”
老人沉默：
“我的爱和游戏是智慧！”

布拉加一生都在诗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他在追求美，而美是需要代价的，诗人深深地懂得这一点：

不容易的还有那歌声。
昼与夜——世上的一切都不容易：
露是通宵歌唱的夜莺

因病劳而流下的汗。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1933—1983），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出生于普洛耶什蒂。1957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担任过编辑、记者和副主编。196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爱的意义》。之后，又有《感情的幻觉》（1964）、《时间的权利》（1965）、《非语词》（1969）、《严寒》（1972）、《绳结和符号》（1982）等十几部诗集先后问世。

斯特内斯库非常注重意境的提炼。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诗人承认他始终在思考着如何让意象更加完美地映照出自己的生命状态。他极力倡导诗人用视觉来想象。在他的笔下，科学概念、哲学思想，甚至连枯燥的数字都能插上有形的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任意翱翔。《追忆》一诗便具有典型意义：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
象婴儿的皮肤，
象新砸开的石头，
象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

她没有重量，恰似呼吸。
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硕大的泪
使她咸得宛若异族人宴席上
备受颂扬的盐巴。

她美丽的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追忆本身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思维活动。但在诗人的描绘下，追忆竟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诗人用奇特的意象调动起了读者所有感觉，让读者去凝视，去抚摸，去倾听，去品尝。于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便在读者心中油然而生。

因了他那不朽的诗，诗人便也“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马林·索雷斯库（1936—），罗马尼亚当代诗坛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生于多尔日县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1955—1960年，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1978年起担任《枝丛》杂志主编。索雷斯库从1964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至今，已出版了《时种之死》（1966）、《万能的灵魂》（1976）等十几部诗集。

有人说他是位讽刺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常常带有明显的讽刺色彩。有人称他为哲理诗人，因为他善于在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叙述中突然挖掘出一个深刻的哲理。有人干脆笼统地把他划入现代派诗人的行列，因为无论是语言的选择还是手法的运用，他都一反传统。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索雷斯库”。

他特别喜欢以自由的形式，用通俗的语言来叙述某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或某些普通事情。然而他的不拘一格的简单叙述不知不觉中就会引出一个深刻的象征。在《一切》这首诗中，诗人写道：

一切都在迅速进行：
土地即兴长出几棵草，
树即兴生出几片叶，
一只鸟——我来不及看它叫什么——
即兴唱了首歌，
一个女人即兴唱了首永恒的歌……
而我即兴微笑了一下
为了拍张人生的照片。

人生的短暂，光阴的迅速，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形象而又深刻的反映。他的另一首诗《奇想》猛一看似乎令人不可捉摸：

每天晚上，
我都将领居家的空椅，
集中在一起，
为它们念诗。

倘若排列得当，
椅子对诗，
会非常敏感。

我因而
激动不已，
一连几个小时
给它们讲述
我的灵魂在白天
死得多么美丽。

我们的聚会
总是恰到好处，
绝没有多余的
激情。

不管怎样，
这意味着
人人责任已尽，
可以继续
向前了。

只要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便可悟出这实际上是一首有关孤独的诗。人在孤独的时候，连椅子都能成为他交谈的对象，都能成为他诗歌的听众。不管怎样，同椅子的交流也是一种宣泄，也能排泄孤独，也能使人继续朝前走。

如此看来，索雷斯库完全有可能用诗来和整个宇宙交流。

安娜·勃朗迪亚娜（1942—）、罗马尼亚当代诗坛最活跃的女诗人之一。生于蒂米什瓦拉市。曾就读于克罗日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先后当过编辑、图书馆员。十七岁步入诗坛，至今已出版《脆弱的足跟》（1967）、《第三种秘密》（1970）、《蟋蟀的眼睛》等十余部诗集。

勃朗迪亚娜具有女诗人所特有柔美和细腻。但她的柔美和细腻是以一定的思想内涵为基础的。她所选择的都是些永恒的主题，比如爱情、纯洁、生与死、人生与自然等等。这都是些十分古老的主题了，因而更需要诗人具备非凡的艺术敏感以及独特的艺术视角。

抒情诗《十月》很能体现女诗人的特色：

温馨的泪
滴落在我的额头，
又款款地
顺着睫毛
流淌，
仿佛源自
那双紧闭的眼。
谁在我的上方哭泣，
让甜甜的泪
变成我的？
是父亲呢，
还是位以此方式
收养我的陌生人？

这首谜一般的优美短诗纯真但又决非简单，细腻但又不乏启迪。女诗人并不想明确地歌颂什么事物或表达什么思想。她仅仅勾勒出一幅朦胧的画面，描绘出一缕微妙的感觉，然后让读者去尽情地想象，尽情地体味。

对于女诗人来说，诗的天赋实在是一种命定的痛苦。她甚至都决定要“走出我的声音/就象走出早已被上帝遗弃的教堂。”然而诗已然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离开了诗，她便难以呼吸，难以生存。因此，痛苦的女诗人甘愿为诗而奉献牺牲：我/ 犹如/漏刻里的/细沙/唯有在/坠落中/才成为/时间。

（高兴）

